夜经济不是全城亮灯 P46 | 广州知识城蓄势待发 P42 | 考试季三大“法宝” P56

瞭望东方周刊

No. 14
ORIENTAL OUTLOOK
2020.07.09
总第 807 期

菜市场，升级吧！

定价：RMB 12 元 bkw
中国邮政发行报刊 BEST SELLER 9 771672 588035 14
邮发代号：4-757 国外代号：W1826 国内统一刊号：CN11-5115/Z

广告

瞭望东方 ORIENTAL OUTLOOK 周刊

触摸城市 经略未来

《瞭望东方周刊》全媒体 带您赏览新时代的中国风采

杂志订阅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新华社客户端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瞭望东方周刊》杂志、官方微信、官方微博、新华社客户端瞭望东方频道

《瞭望东方周刊》，逢双周周四出版，全年出版26期，出版页数为64P／期，订阅价格为312元／年，订阅单价及零售价均为12元／本

新闻热线：（010）88052821　订阅电话：（010）88052829

既是严管，更是厚爱

本刊评论员　编辑顾佳赟

政务处分法必将进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著制度优势转化为出色治理效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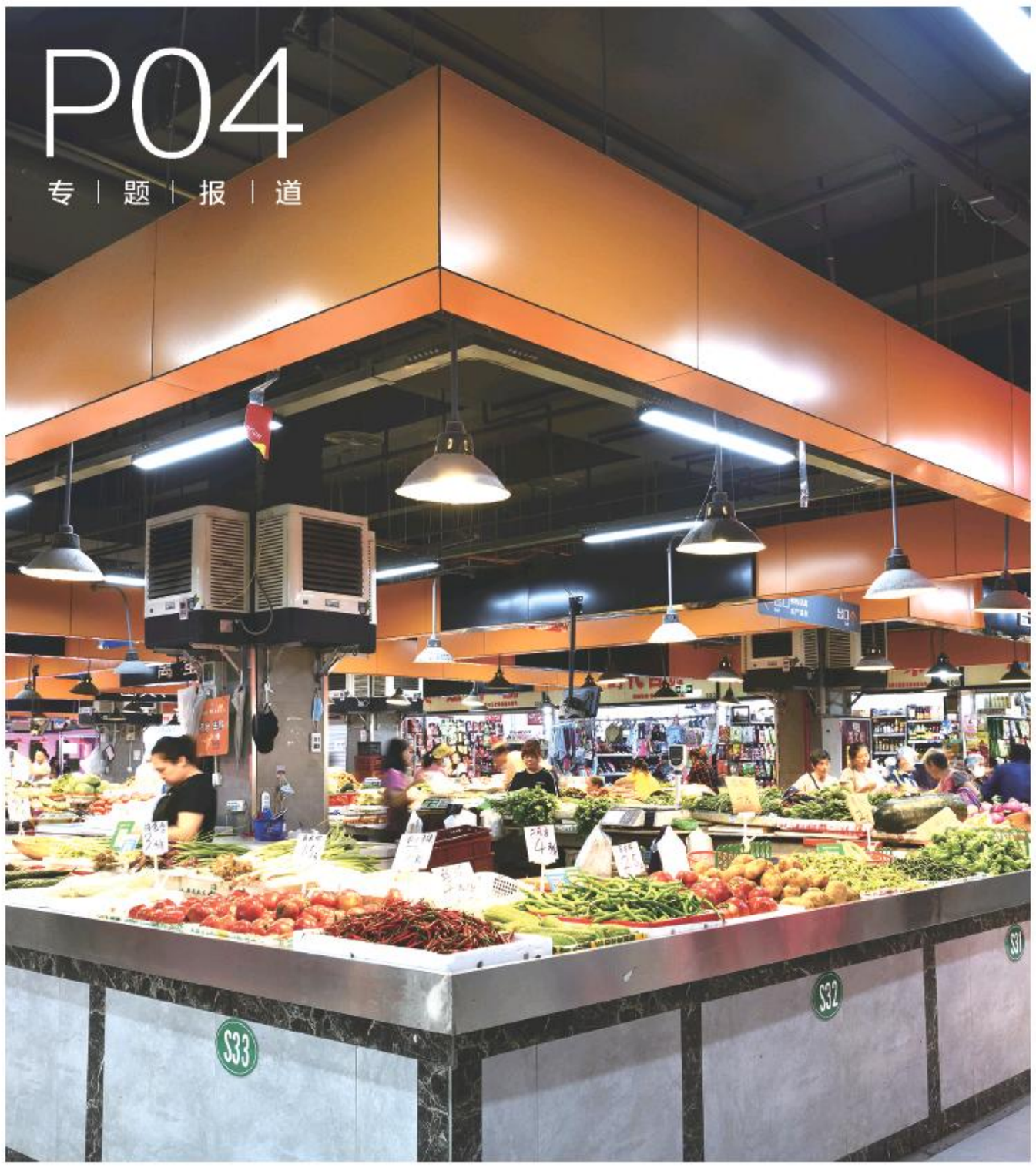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20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法参照现行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以及党纪的有关规定，总结实际经验，全面系统地规范了政务处分制度，为监察机关实施政务处分提供法律依据，进一步完善了公务员、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等的处分制度。可以说，政务处分法作为一部规范监察机关的政务处分活动、完善国家监察制度的重要法律，是继监察法之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制度成果，将成为完善党和国家监督监察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党纪与法律的衔接，发挥党纪和法律的协同作用，是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保障。

“法者，治之端也”。全面依法治国首先必须全面依法治政。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事关全局的重大改革，是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国家监察法出台后，对政务处分制度作了原则规定，但仍没有对应当给予政务处分的违法行为以及政务处分的适用规则、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这一情况制约了处分工作的规范开展。有鉴于此，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应运而生。该法的制定和实施改变了政务处分标准不统一的局面，极大地提升了政务处分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提高了监察工作的法治水平，顺应了不断强化对公职人员监督的需要和监察全覆盖对政务处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政务处分法的出台，是不断总结实践经验、解决具体问题，精准立法的结果。该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着眼于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着力解决对各类公职人员科学、统一地设置处分的法定事由问题，注重实现党纪和国法贯通、法律和法规衔接以及共性与特性的有机统一。比如，在明确监察机关和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各自职责的同时，统一设置处分的法定事由和适用规则，保证处分适用上的统一规范。对公职人员的管理监督薄弱、处分程序不规范、处分决定畸轻畸重、对国有企业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的公职人员处分缺乏法律依据等突出问题，政务处分法坚持问题导向，将散见于不同法律法规中的处分依据统一起来的同时，结合现有公务员、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处分制度等规定，充实完善了应当给予政务处分的违法情形、处分幅度、适用规则和程序，补齐了制度短板。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此次实施的政务处分法内容来看，该法更加精准地体现了宽严相济的立法准则，对广大公职人员既是严管、更是厚爱。公职人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特殊重要位置。制定政务处分法，有利于强化对公职人员的依法全面监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治吏，扎牢国家监察体系的法治篱笆；有利于实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有担当的公职人员队伍；更有利于严格规范政务处分法律程序与惩戒适用，确保权力规范运行，依法保护公职人员切身利益。作为首部全面系统规范公职人员惩戒制度的国家法律，政务处分法必将进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著制度优势转化为出色治理效能。■

目录



菜市场，升级吧！

菜市场何处去？ P06
菜市场从哪来？ P14
菜市场应有“大智慧” P20
生鲜平台：菜市场取代者？ P24
上海菜场变身记 P29
东京菜市场这么管 P34
治理菜市场须打通政策梗阻 P37

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各方期待菜市场升级改造从量变走向质变，农产品流通方式能实现重塑优化。

社评
01 既是严管，更是厚爱

高端访谈
42 广州知识城蓄势待发
——专访广州市委常委、黄埔区委书记周亚伟

治略
46 夜经济不是全城亮灯

城论
49 谁是资本活力最强城市？

文脉
52 黄冈有诗

史迹
54 水城开封

专栏
56 考试季三大“法宝”
57 说塔

西行录
58 疫情让西方人爱上播客

东游记
59 读懂“中国式收入”

健康
60 母亲怀孕让父亲变了

诗和远方
62 水石清华朱家角

味道
64 杨梅“夏”苏南

版权

主管　新华通讯社
主办　瞭望周刊社
编辑　瞭望东方周刊
出品　瞭望东方传媒有限公司

瞭望东方

瞭望周刊社
总编辑　冯瑛冰
副总编辑　陈良杰　苏会志
　　刘明　史湘洲
总编辑助理　杨桃元

瞭望东方周刊
总编辑　冯瑛冰
执行总编辑　陈良杰
副总编辑　夏宇　王啟广
编委　顾佳赟

责任编辑　黄琳　戴闻名　金明大　覃柳笛
　　陈融雪　高雪梅
资深记者　杨天　刘佳璇
记者　骆晓昀　张静　万宏蕾
　　李璇　王剑英

美术编辑　刘章丰　周开艳
图片编辑　纪元
文字编辑　赵秀红
流程编辑　周传丽　陈玥

新媒体编辑　郭赛玲

瞭望东方传媒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张栋
财务经理　蒋震芳

广告中心
常务副总经理　邢静
华北区　010-88052826
销售总监　戚健
高级经理　曹仲莹　赵新社
华东区　021-64721107
销售副总监　王楚伟 韩薪茜

融合发展中心
总监　张栋（兼）
副总监　邢静（兼）
策划　王雅思

发行中心
副总监　徐正
高级经理　王文林　李黎
印务　刘小乐

行政与人力资源中心
总监　徐勇
副总监　白薇　刘柳

编辑部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97 号甲
新华社发行楼 6 层西侧
电话：（010）88052828
邮编：1000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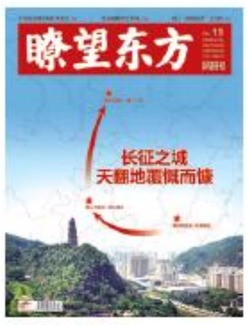
瞭望东方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 808 号 A8 楼 509-511 室
电话：（021）64721131
邮编：200030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石工商广字第 0036 号
广告总代理：
上海瞭望东方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广告热线：
北京（010）88052826
上海（021）64721107
订阅热线：
北京（010）88052829
上海（021）64728110

订阅零售：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发行：上海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4-757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海外定价：$3.5
（北京 399 信箱）国外代号：W1826
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2-5883
国内标准刊号：CN11-5115/Z
京石市监广登字 20170008 号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瞭望周刊社系列刊物

2020.06.29



2020.06.25

2020.06.10

中国国航航空公司
头等舱、商务舱阅读刊物

本刊图片合作方：中国全球图片总汇 / 东方 IC / 视觉中国 CFP / CNSPHOTO / FOTOE

声明：本刊刊发部分图片无法联系到作者，请作者看到后与我们联系，我们将支付相应稿酬

本刊声明：《瞭望东方周刊》所有内容，未经许可，禁止以任何方式复制、改编、摘编、转载和传播

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
网址：www.yuecheng.com
电话：010-84417799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新华社客户端　杂志订阅

2020 年 5 月 14 日，市民正在干净、整洁、敞亮的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沁园农贸市场购物

菜市场，升级吧！

文 | 覃柳笛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两度成为病毒传播中心。包括各类农批市场、农贸市场在内的菜市场业态及管理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问题之一，粗放管理下基础设施简陋、“脏乱差”现象普遍，在质量安全监测、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等方面投入不足。

问题之二，数字化信息体系建设总体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农产品流通与信息追溯体系建设不健全。

问题之三，配套服务功能不足，大多数农批农贸市场仍未具备商品分级整理、加工包装、质量验证、结算服务、委托购销、代理储运、信息提供、代办保险等全面配套功能。

以上短板，反映的是农产品流通标准化体系的不健全：从生产、加工、仓储、运输到销售，亟待建立一套高效、畅通、安全、有序的管理标准，推动各环节向标准化、绿色化、智慧化的方向提升。

作为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重要末梢，菜市场是保障亿万群众餐桌安全的基础设施，也是城市文明形象的直观窗口，更是防范城市公共卫生风险的关键环节。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产品流通体系的畅通对推动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村商户市民化有着重要意义。

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各方期待菜市场升级改造从量变走向质变，农产品流通方式能实现重塑优化。这需要从城市规划层面上做好菜市场整体布局，将菜市场定位为一种城市公共服务产品，凸显菜市场的公益属性，从而实现菜市场的环境、经营、供应链和业态的全面改造。各地、各级、各类“菜市场”要抓住提质升级的“窗口期”，完善管理和品质，让家庭满意，让人民放心。■

菜市场何处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佳璇、特约撰稿尹希宁　编辑覃柳笛

“传统菜篮”升级改造的问题核心，实际上是农产品流通体系的优化重塑。

“你们的菜是从新发地进的吗？”北京益民购物中心青年路店的蔬菜摊主们，近期免不了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一位摊主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北京东边的菜市场一般都去通州八里桥批发市场，我们平常就不怎么去新发地。”

2020 年 6 月 13 日，因北京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活动轨迹涉及新发地市场，在市场从业人员及环境中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简称新发地）宣布暂时休市。

由于新发地在北京农产品供应链中的特殊地位，其下游接受新发地农产品货源的农贸市场、餐饮单位和机关单位受到波及，菜市场环境卫生和安全管理再次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此后也密集开展对传统菜市场、大中型商超、提供生食类水产品的餐饮单位的食品安全检查。

“脏乱差”“城市堵点”……当作为“小菜篮”的社区菜市场的环境开始逐渐改观、普遍升级的时候，作为“大菜篮”的农批市场却还难以摆脱这些负面标签。

为何城市菜篮的现代化步伐总比城

6 月 16 日，北京蓝天救援队队员在岳各庄批发市场开展消杀作业

市发展的速度慢半拍？在生鲜电商和社区生鲜超市越来越普及的当下，城市还需要不同规模的农批市场、农贸市场（以下统一称菜市场）吗？其升级之困要如何解决？

存废之争

“出了问题之后，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关停、取缔。新发地出现新疫情之后，有相当一部分观点就认为需要重构农产品供应和流通体系，以直销模式取代分销模式，以短链代替长链，说白了就是‘绕过农产品批发市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在近期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围绕传统菜市场的存废，一直存在不小的争议。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批农贸市场是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一大场所，从社会学角度而言，这里是城乡边界较为模糊的地带，某种程度上保留着前现代城市空间与社会活动形态，城市现代化进程越快，这个城乡连接点的尴尬与困局就越突出。

上世纪 80 年代末以降，农产品原有的“统购统销”体系被打破后，几十年来为中国人解决餐桌供应的“传统菜篮”体系以农批市场为中心，即“农户→产销地农批市场→农贸市场→消费者”。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一模式所面临的挑战也增加了。21 世纪之初，星罗棋布于城市之中的钢棚菜市场，就成了“脏乱差”的代表，有的城市对这些菜市场进行了搬迁、升级，有的城市则选择推进“农改超”。

小型化、连锁化、超市化的城市副食品供应业态被视为更符合现代城市的新体系。在新世纪初率先进行“农改超”的城市是福州，“农改超”既能改善传统菜市场对市容环境的影响，也可通过企业自我约束力提高食品安全。此后，地方各级政府积极推动福州模式。

针对“传统菜篮”的首次存废之争，伴随着早期“农改超”试验而起，但当时的争议还不足以动摇“传统菜篮”的地位。推行几年后，“农改超”遇到了来自居民消费习惯、投资成本和企业经营风险的多重阻力，学界对此表示了担忧，政策开始鼓励更加符合实际的“农加超”，即在菜市场中增加超市。

2005 年，商务部、农业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标准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农产品批发市场标准化工作的通知》，四年后，商务部和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标准化菜市场示范工程的通知》。后者使得全国菜市场有了转型目标，也造就了近十年来城市居民所看到的社区菜市场标准形态。

与此同时，城市居民的购买习惯开始向超市、生鲜便利店和社区菜店倾斜，这些场所供应的农产品“品貌新鲜、包装卫生”；近年，生鲜电商入局，多种零售渠道逐渐冲击着社区菜市场的地位。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现代物流与供应链处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城市居民的农产品消费习惯、购买渠道出现了一些变化。

一方面，食品新鲜和卫生干净成为消费者购买时的首要决策因素；另一方面，农产品终端零售渠道结构变化明显，其中超市消费受影响不大，生鲜电商、社区菜店和社区团购激增，传统菜市场消费下降明显，社区菜店成为占比仅次于超市消费的购买渠道。

留下菜市场

搜集有关菜市场的新闻可以发现，近五年来，“拆迁”“消失”的字眼出现频率极高，传统菜市场因老旧、落后、脏乱、管理不善，而经历关停整顿、升级改造的新闻屡见不鲜。例如，北京 2015 年前后，大中型菜市场迎来一场大规模拆除；2017 年，在一系列“疏解整治促提升”政策下，社区菜市场又再次清理整顿。

处于菜市场上游的农批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零售端渠道变革的冲击。

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副院长、教授王晓平对本刊表示，如今的农产品流通模式主要有自产自销模式、农超对接模式、农批市场模式，以及“互联网 +”下的创新模式。

其中，农超对接（产地→配送商→超市）模式绕开销地农批市场，“互联网 +”

下的生鲜电商也可以实现产地直销。据2014年中国乡村之声报道，全国多个农批市场出现业户流失、竞争加剧的局面。在这一背景下，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对农批农贸市场进行了搬迁、合并。

北京最大的农批市场新发地暂时休市，就像堵住了一条大河最重要的支流，北京其他农批市场迎来一次“潮涌”。北京大洋路批发市场是主要分流市场之一，这个距离国贸只有7公里的农批市场，在承接分流任务之后成为“堵点”，有进货商反映，受此影响，进出大洋路批发市场需要4个多小时。

传统菜市场承受的压力不仅来自产业本身，“低端”的业态、粗放的管理和给城市管理带来的负担成了“原罪”。“传统菜篮”一边忙着标准化升级改造，一边面临第二次存废之争，其背景不仅是城市农产品供应体系的业态升级。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批农贸市场是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一大场所，从社会学角度而言，这里是城乡边界较为模糊的地带，某种程度上保留着前现代城市空间与社会活动形态，城市现代化进程越快，这个城乡连接点的尴尬与困局就越突出。

此次新发地疫情的暴发，使得农超对接模式在北京进一步得到消费者的接受。王晓平认为，在大城市以后的农产品流通中，超市和社区菜店有可能逐渐取代传统菜市场。

但“留下菜市场”的呼声也很强烈。

首先，我国食品消费习惯细碎多元，供应渠道完全依赖超市和小型社区菜店很难满足这一需求；其次，菜市场提供的社会交往和邻里关怀功能，是规模化的超市难以取代的，其本身也是城市文化景观的一部分;再次，完全取缔菜市场，将使赖此为生的商贩（一般为外来务工者）面临失业风险。

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周应恒在

2019年12月，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举办有关“菜市场转型升级”问题的发布会，强调在推动菜市场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不只注重环境整治提升，更主要是推进市场管理标准化。

2003年曾预判“尽管超市地位日益提升，农贸市场在中国不会消失，而会减少”，如今，零售端结构从原来的菜市场为主体变为超市占比更高，而上游农批市场仍然是整个流通体系的核心。

“销地农批市场是核心，占主导地位，也是农产品价格形成的中心。”中国供销农产品批发市场控股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市场开发部经理郭智勇对本刊说。近年来随着新零售业态的发展，直销模式有所提升，但是并未改变农副产品供应中分销模式的主导地位，三分之二的农副产品供应仍然来自分销模式。

不能止于环境改造

菜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是其物业空间和充分调动社会劳动力带来的经营优势，如今菜市场在城市中还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提供产品性价比依然突出。

位于北京朝阳区青年路地铁站旁的北京益民购物中心青年路店，近年刚完成标准化改造升级，与其仅隔一条马路，就是一家地利生鲜连锁超市，不远处朝阳大悦城里还有一家大型超市。即使如此，这家农贸市场仍然颇受欢迎，因疫情防控需要，它曾经历过两个多月的休市，重新开放后却很快恢复了人气。

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三源里菜市场作为北京市标准化达标社区菜市场，经过2004年后一系列的升级改造、提高经营准入门槛、提升档次，甚至在2017年一度跃升为“网红”。

人们首先惊叹三源里菜市场的“颜值”，此后是精细化管理和每个商贩的服务与营销能力。这里成了传统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模范”之一，证明菜市场经过升级可以适应现代化城市的需要。

2020年5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部长钟山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党中央把扩大内需作为重大战略，商务部要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将从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推进步行街改造提升、发展生活服务业等三方面下工夫，其中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内容就涉及推进菜市场标准化改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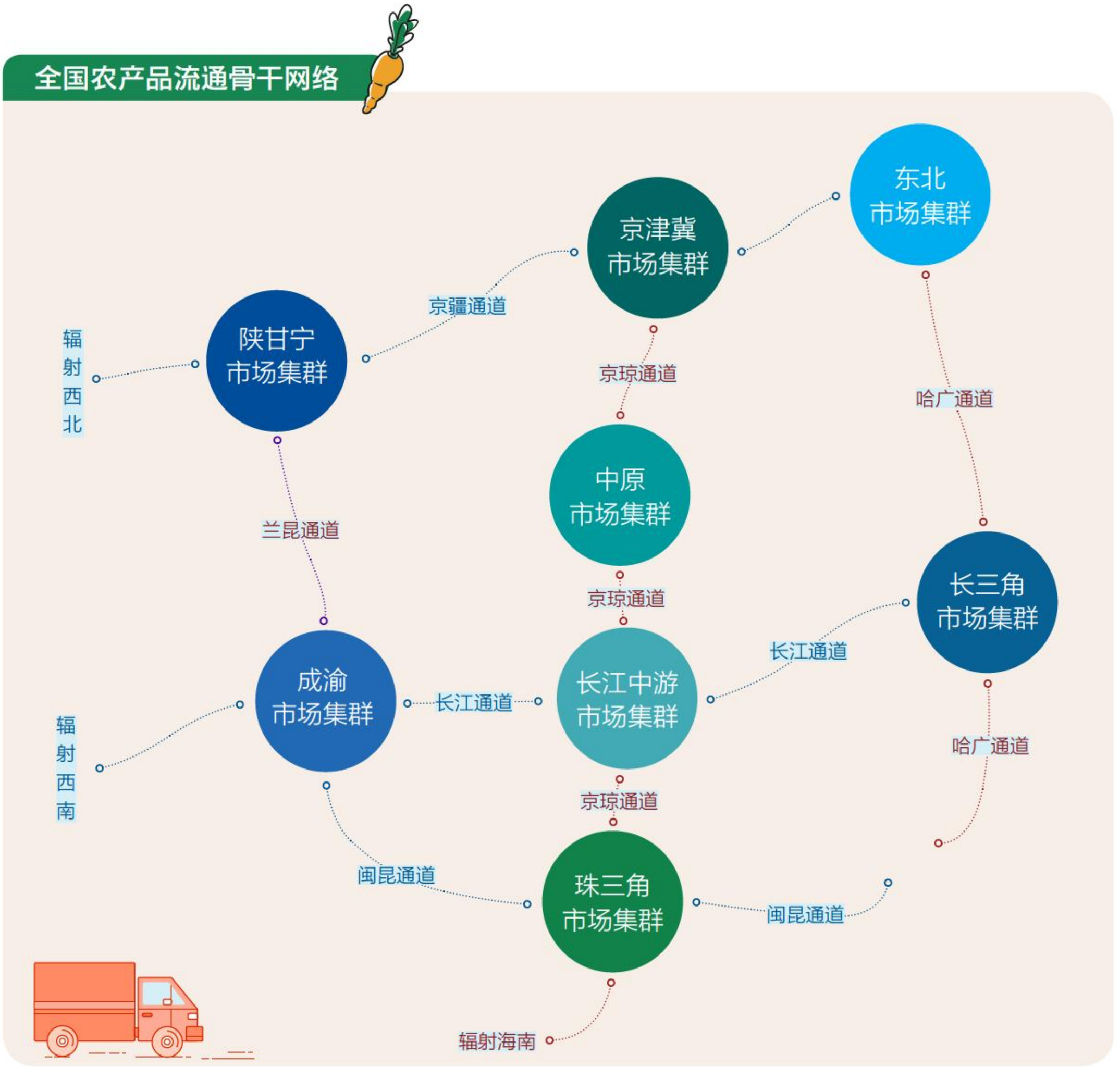
“标准化改造”并非改造环境而已。2019年12月，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举办有关“菜市场转型升级”问题的发布会，强调在推动菜市场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不只注重环境整治提升，更主要是推进市场管理标准化。在全国各个城市菜市场的升级行动中，这并不是孤例。

整体而言，菜市场升级涉及环境改造、经营改造、供应链改造和业态改造，无论是硬件改造还是软件升级，都要进行动辄百万级的投入。大部分升级改造受限于装修、硬件设备，而管理水平如何提高一直是一大症结。有行业人士分析，菜市场缺乏对人才的吸引力，管理和从业人员相对年龄结构偏高，从业经历以传统行业为主，很难适应精细管理的要求。

疫情之下，农批市场的管理痛点显得比农贸市场更加突出。郭智勇总结，首先是标准化程度不高，采购离不开现场看货，市场车水马龙；其次净菜比例不高，货物一般是到农批市场再分拣加工，带来很多城市垃圾；再次信息化水平不高，造成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难以溯源，且信息不对称造成生产盲目性，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

针对净菜比例低的问题，周应恒认为，应在农产品产地进行标准化和商品

全国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



商务部 2015 年发布的《全国农产品市场体系发展规划（2015-2020）》提出：规划形成“八大骨干市场集群和 100 个左右全国骨干农产品批发市场”，依托市场集群，形成“三纵三横”的全国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设计 / 刘章丰）

化处理，提高农批市场对货物的准入标准，不符合标准的货物不进场。

王晓平认为，要想改变目前农批市场“人多车多”的现状，一方面应弱化甚至取消农批市场的零售功能，强化批发功能，另一方面，可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将线下交易转变为线上交易，让农批市场发挥物流中心而非商品售卖的作用，这样将改善市场环境，减少人流车流。

在平日，北京大洋路批发市场夜间做批发生意，白天以零售为主，24 小时都有人流进出。2020 年 6 月 15 日起，因疫情防控需要，该市场宣布日间不再开放零售业务。这一措施是否常态化推行，目前尚不确定。

而北京益民购物中心青年路店的主要货源地八里桥批发市场不久前刚完成一轮改造，整体环境较为整洁，且分出了批发区和零售区，目前仍然开放零售。一位零售区商户对本刊记者说：“夜间和上午批发区人最多，下午批发区闭市，只开放零售区。”

关键在于重塑体系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安玉发近日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采访时表示：

“批发市场的升级再造，要求的不仅仅是市场本身，它意味着生产、加工、仓储、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都要按照标准化、绿色化、智慧化的方向提升管理水平。”

“传统菜篮”升级改造的问题核心，实际上是农产品流通体系的优化重塑。

王晓平认为，在城市对于农批农贸市场的规划上，应进行分级分类：一级批发市场只做批发，且具有一定的数量规模；二级批发市场以批发为主，数量规模可以适当减小；三级农贸市场仅做零售，面向大众消费者。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甄贞近期撰文指出，城市商业规划和市场项目批建之间的管理衔接不够紧密，常出现农批市场开发体量过剩的情况。这不仅导致激烈竞争、部分市场严重空置而不能给地方财政带来受益，而且严重浪费土地资源，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针对此次疫情暴露的农产品流通体系问题，在农批市场规划方面，郭智勇认为大城市应多核保障，不能对单一市场依存度过大。

规划的关键在于平衡“多核保障”与“体量合理”。“在进行批发市场规划时，要对整个城市的各级批发市场进行规划设计，也就是每个批发市场有合理的辐射范围；同时要设定价格标准和经营范围，不要出现不同批发市场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情况，也不要出现有些农产品只能到特定的市场才能购买的情况。”王晓平说。

“批发市场的升级再造，要求的不仅仅是市场本身，它意味着生产、加工、仓储、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都要按照标准化、绿色化、智慧化的方向提升管理水平。”

地方政府层面，不少城市都出台了农产品流通领域政策及规划，其中，以上海市的政策与规划最为详尽，先后发布过《关于加快本市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的指导意见》《上海市食用农产品批发和零售市场发展规划（2011–2020）》，后者对于农批农贸市场进行了详细的布局规划。

“针对食品溯源问题、信息化问题，政府也要逐步主动参与，通过政府采购或委派机构加强管理。”郭智勇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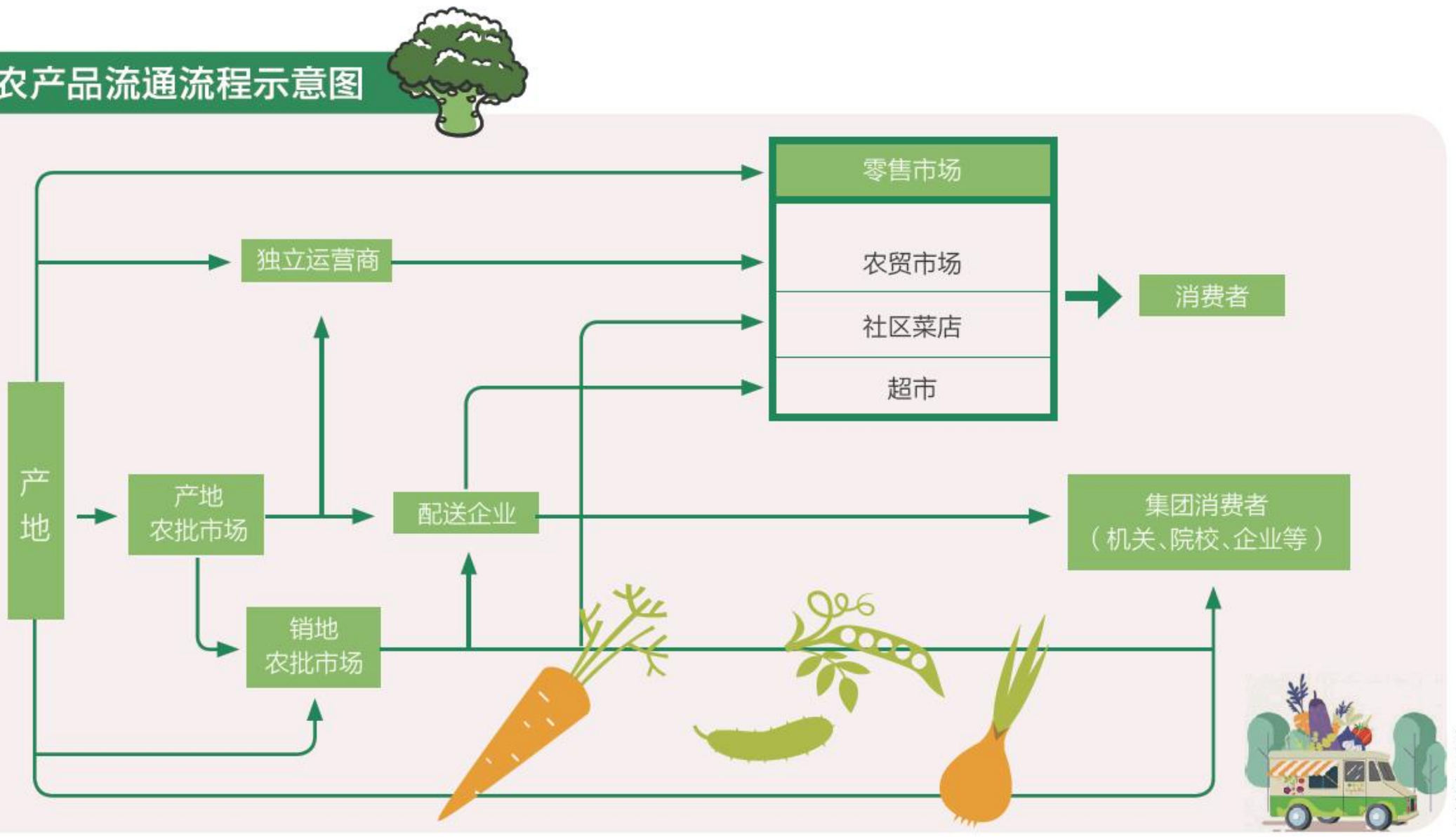
“农批市场电商化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这对于管理有效性和提升安全性方面都不失为一条合理路径。”周应恒认为，目前生鲜电商在我国具有一定发展基础，在传统的供应体系中也导入电商化，将有助于其升级。

在这方面，已经有企业进行了尝试，由广州江南市场起家的广州江楠（集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建立了 B2B 生鲜垂直品类平台“江楠鲜品”。

重视公益性

中国蔬菜流通协会会长戴中久认为，加强市场的数字化信息体系建设和数字化支付，提高商户对接效率，通过市场内的交易数据、销售数据、客流数据、菜价数据、商户数据、活动数据，可以达到食品安全追溯，并提升商户交易体验。

农产品流通流程示意图



设计 / 刘章丰

2018 年 12 月 25 日，菜市场“微风市集”正在前门西兴隆街路口试营业

这也是近年来不少专家在农产品流通领域想要引入的一种新模式，即“智慧农批”。

这一模式很有可能率先在浙江温州孵化出来。2016 年起，温州菜篮子有限公司开始承担温州市属国有农贸市场的统一运营。从硬件改造、管理革新、商业创新、品牌建设等方面对菜市场进行了系统性提升，打造“现代菜篮子”品牌，并进行了智慧化管理试验。

试验的样板是“现代菜篮子”新田园农贸市场，这个市场运用自主研发数字农贸运营系统，实现了非接触无线支付、客流大数据统计，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凸显了数字化管控带来的便捷与高效。据悉，“现代菜篮子”还在研发能够实现交易数据全量采集解决交易溯源问题的升级版运营系统。

显然，这种升级需要巨大投入，且回收期长，对于大部分达不到集团化水平的菜市场而言，无论从能力还是意愿上来看，都存在阻力。

郭智勇认为，涉及公共安全、公共福利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升级，会存在市场失灵：“我国农批市场有很强的原生性，村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占据行业重要位置，逐利性大于公益性；如深圳农产品、上海蔬菜集团、温州菜篮子和供销系统这样的国有力量相对薄弱，大概占 30%。”

2011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鲜活农产品市场“公益性”的概念。2014 年，农产品市场公益性进入备受重视的全新阶段，当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内贸流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制定全国公益性批发市场发展规划，统筹公益性市场建设，培育一批全国和区域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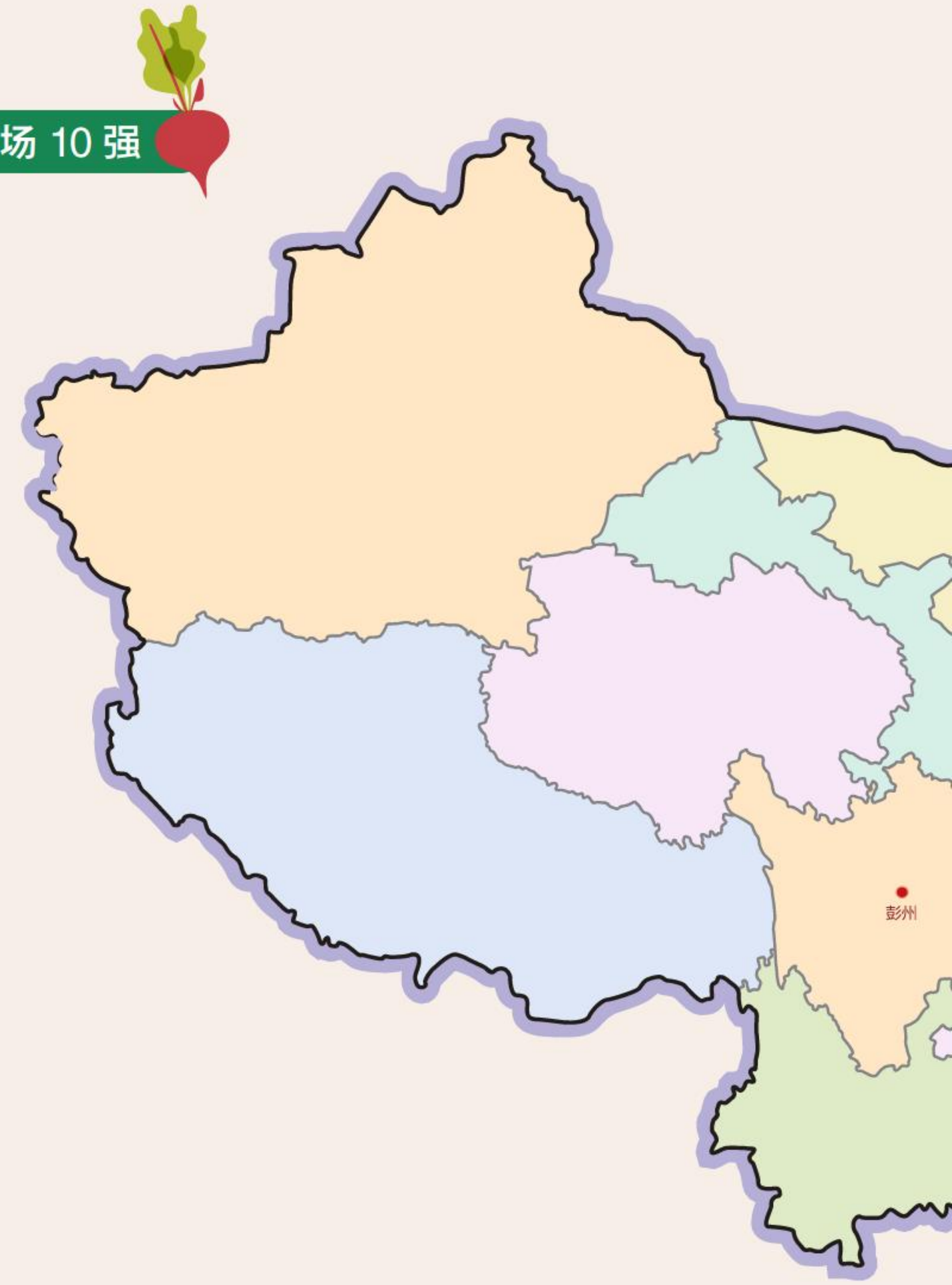
郭智勇认为，由于缺乏长效机制，在民营企业占主导的情况下，不能改变行业忽视公益性的情况，建议提高农批市场中国有企业（含供销社企业）占比，促使农批市场由盈利性组织向公益性组织转变。

从全国来看，如上海一样通过立法明确上海一级农批市场地位的城市还很少，菜市场准入门槛低、对建设运营的主体要求低，这使得其建设运营质量难以保证，而政府监督和对大型服务企业的扶持政策较为缺位，造成劣币驱逐良币，这说明行业相关立法亟待加强。

在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有为农产品批发而制定的法律。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在市场立法、规划、政府管理、市场准入与运行规范等方面，中国还存在很大差距。

因此，甄贞建议，依据中国国情，制定和颁布具有国家法律地位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如果一时难于出台国家层面的立法，也可以发挥地方人大的立法作用，加快推动符合区域特点的地方性立法，加强整体规划和布局。■

2018 年度全国农产品综合批发市场 10 强



01 北京市丰台区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于 1988 年 5 月 16 日，经过 32 年的建设和发展，现已成为首都北京乃至亚洲交易规模最大的专业农产品批发市场，承担首都 80% 以上的农产品供应。在全国 4600 多家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交易量与交易额已连续十七年双居全国第一，2019 年，其交易量 1749 万吨，交易额 1319 亿元人民币。

02 河南省郑州市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

河南万邦农产品物流园区于 2012 年正式投入运营，园区占地 5000 亩，建筑面积 350 万平方米，拥有固定商户 6000 多家。2017 年各类农副产品交易额 913 亿元，交易量 1720 万吨。

03 江苏省南京市

南京农副产品物流配送中心

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坐落在南京市江宁区高桥门地区，为政府主导、企业化运作的特大型“菜篮子”工程，其功能定位是面向中国东部地区，高集聚、强辐射、现代化的“中国长三角菜篮子中心”。其年交易量超 900 万吨，实现交易额 550 亿元，入驻企业超 3700 家，从业人员超 17000 人。

04 河南省商丘市

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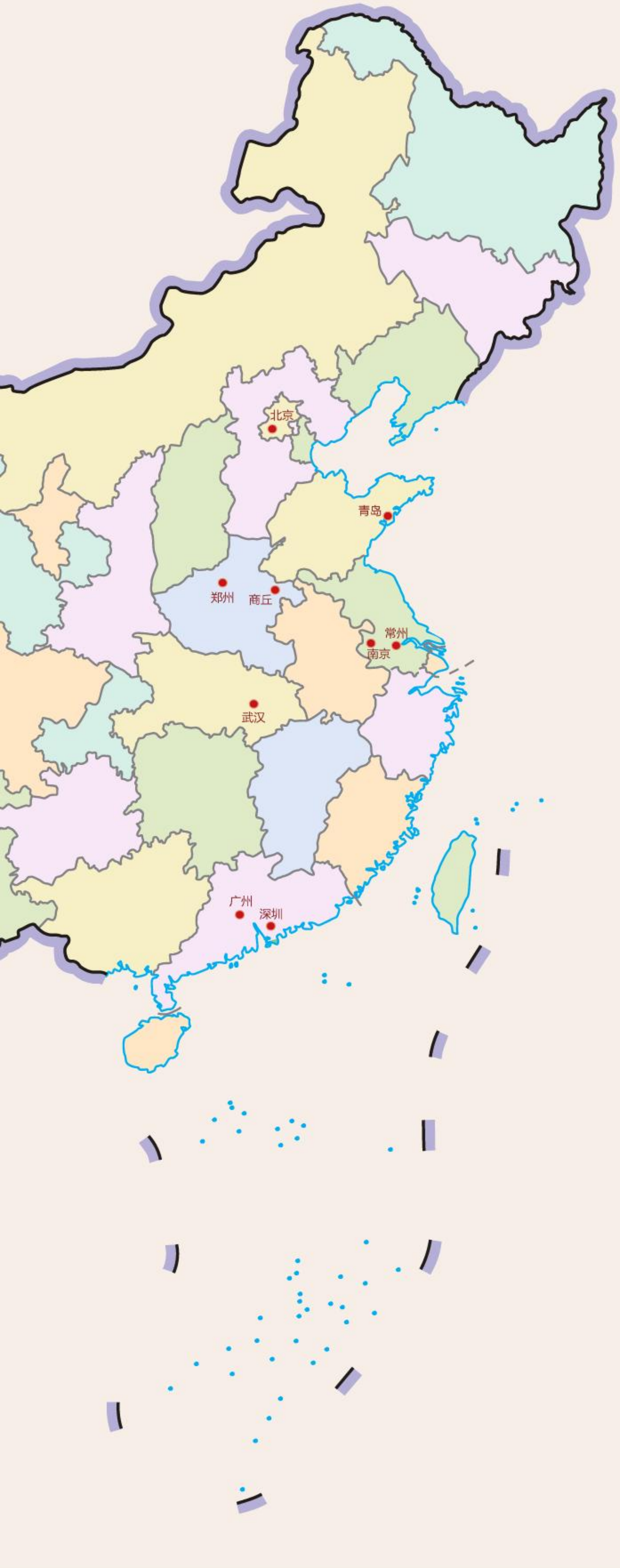
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建立于 1998 年，2004 年重新迁址扩建，现占地面积 1700 亩，年交易金额近 200 亿元，年交易量 700 多万吨，农产品交易辐射全国 30 个省区市，是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地区规模最大并在全国拥有重要影响的农产品交易中心、集散中心、价格中心和物流中心。

05 江苏省常州市

江苏凌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江苏凌家塘市场创立于 1992 年 9 月，2004 年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5 年根据城市总体规划进行整体迁扩建和升级改造，2008 年 1 月整体搬迁至常州市武进区邹区镇，目前是江苏省规模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是华东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中心、价格中心。

（根据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 2019 年 6 月发布的 2018 年度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行业排序结果整理）（设计 / 刘章丰）



06

四川省彭州市

四川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

雨润四川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是西部地区“菜篮子”民生工程，常年果蔬交易量 1.5 万吨 / 天，年交易额 230 亿元以上，已初步具备“价格形成中心、信息发布中心、会展贸易中心、科技交流中心、集散物流中心”五大功能。

07

山东省青岛市

青岛市城阳蔬菜水产品批发市场

青岛市城阳蔬菜水产品批发市场始建于 1984 年，固定资产 26 亿元，占地 1500 亩，交易空间 60 万平方米，日人流量 6 万人次，2019 年实现交易额 233.7 亿元，位列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前茅，是集蔬菜、水产品、干鲜果品、生肉副食品、日用百货等十几大类上千个品种的大型综合批发市场。

08

湖北省武汉市

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

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占地 700 亩，现已形成蔬菜、水产、粮油、干菜调料等经营区域及服务配套区域，享有武汉市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并设置有冷藏加工、物流配送、电子结算与监控、信息收集与处理等服务系统，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09

广东省深圳市

深圳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

深圳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由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平湖物流基地内，现有经销商 2000 多家，汇集全国及世界各地 8000 多种农产品，其中名、优、特、新农产品达 800 多个，目前经营的蔬菜、水果、冻品、干货分别占深圳市民消费量的 85%、90%、90% 和 60% 以上，不但满足了深港两地居民的菜篮子所需，而且辐射整个华南地区乃至全国。

10

广东省广州市

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

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创建于 1994 年，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占地面积 40 万平方米，主要从事蔬菜和水果产品的批发经营。该市场 2002 年起投资了近 8 亿元对市场进行全面升级改造，2019 年交易量达 560 万吨，交易额达到 268.29 亿元，果菜单品交易量连续十六年名列全国第一。

菜市场从哪来？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佳璇、特约撰稿尹希宁　编辑覃柳笛

谈论农批市场及其下游零售端社区菜市场的经营管理问题，绕不开整个农批行业的发展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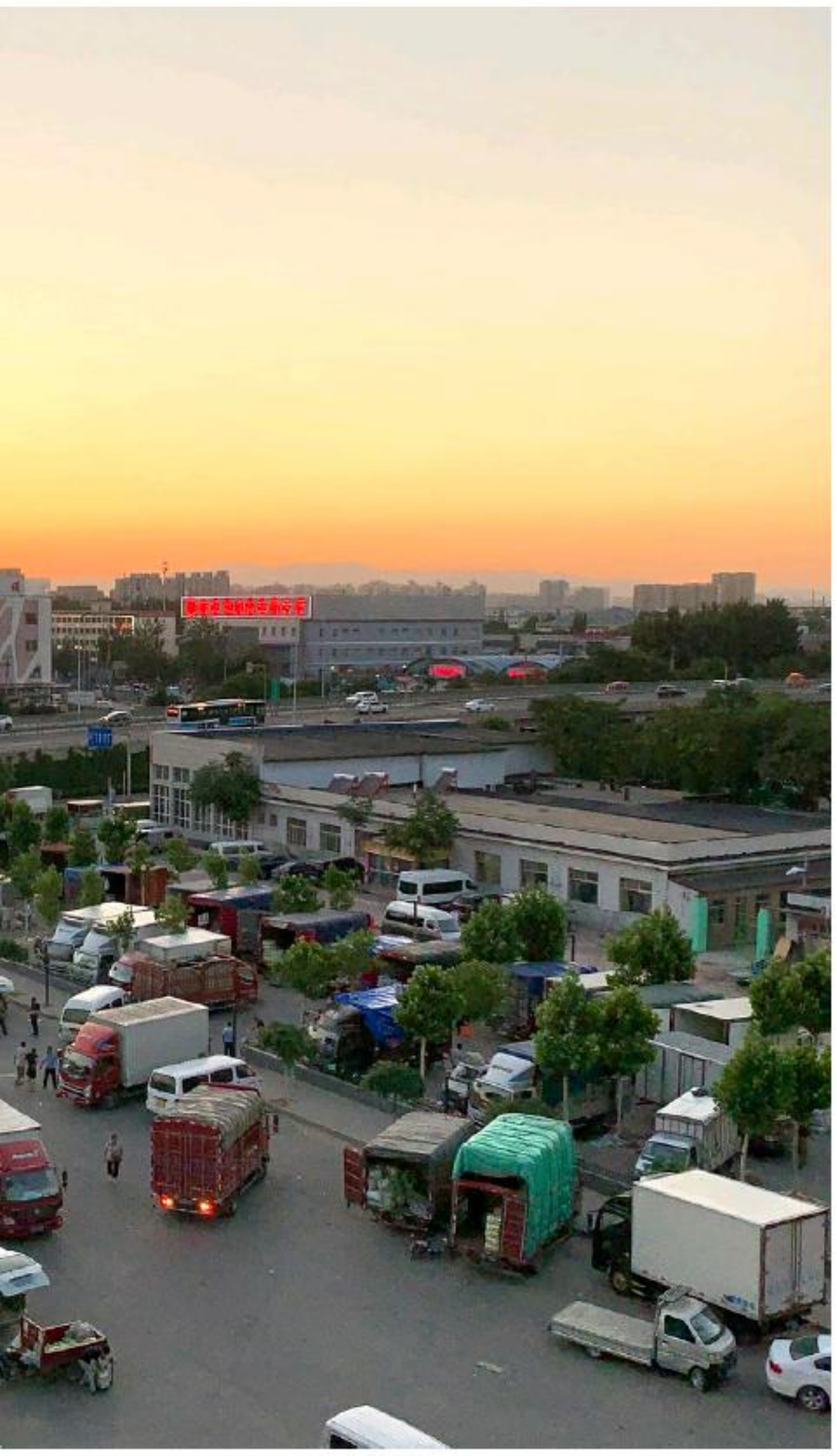
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简称“新发地”）西北方向，沿四环路行驶 13 公里，就是北京京丰岳各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心（简称“岳各庄批发市场”）。新发地因疫情于 6 月 13 日暂时休市后，岳各庄批发市场承接了新发地的部分功能。

岳各庄批发市场面积约为新发地的四分之一，其诞生要比后者早两年。

对比二者的发展历程，能找到它们初期的相似之处：都由自然形成的农贸集市发展而来，且于村集体企业起步，正式建成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那个年代还发生过农批行业的另一大事件——在山东一个名叫寿光的县城，一个巨型的产地农批市场悄然崛起。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农批市场已成为中国农产品流通的主渠道，也是连接中国城乡的重要场域，它的上游是田间地头，下游是都市餐桌，每一次变革都发轫于两端，也牵动两端。

多位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专家表示，谈论农批市场及其下游零售端社区菜市场的经营管理问题，绕不开整个农批行业的发展史。从城乡结合部



6 月 14 日，北京，位于新发地北桥东侧的国际水产城场地，与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仅一路之隔

的集市，到传统业态农批市场，再到规范化和集聚化的大型农批市场，进而向“智慧农批”迭代，农批市场的变迁，一直围绕着城市的需求而动，在未来也将如是。

“大包干”催生“菜篮子”工程

1983 年，山东半岛莱州湾，因种植白菜、韭黄和大葱而在历史上享有美誉的寿光县，迎来了一场大丰收——蔬菜种植面积扩大到 8600 公顷，总产量猛增到 5 亿公斤。

这场大丰收的背景，是全国农村推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即“大包干”。“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并通过蔬果种植业、畜牧和水产养殖业等多种经营增加收入，农业市场化改革的序幕悄悄拉开。

但在 1983 年丰收季，寿光农民的焦虑远大于喜悦，因销售渠道不畅，不少人将成堆的菜倒进水沟。农产品滞销在 1984 年全国部分地区再次上演，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市场上副食品供应长期短缺、城市居民餐桌上蔬菜种类贫乏。

改革开放后，位于北京城区西南的岳各庄村聚集了越来越多摆摊的菜农，其中不乏来自河北的面孔。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自发形成的“马路市场”在中国遍地开花。在市场化农产品流通体系诞生前，这成为农产品在城乡间流通的“土方法”。

但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土方法”已不能满足时代需求。

作为产地的寿光县尤能感受到打通渠道的迫切。

1984 年，当地政府将城区西南九巷村的农贸集市改造为二十多亩的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当年蔬菜成交量达 3 亿斤，交易额 5500 多万元。这是寿光作为全国最大蔬菜集散中心的起点。

1986 年，在丰台区的支持之下，岳各庄村将集体所有的一处废旧养殖场地块改造为农批市场。

此时，新发地村集体企业新发地农商联公司的农业经理张玉玺正头痛于村前马路市场带来的拥堵和环境问题，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驱赶菜贩，丰台区工商所找到张玉玺，告诉他不如因势利导，建一个农批市场。

新发地村划出 15 亩地，在张玉玺带领下，15 个本村青年用 15 万元，于 1988 年建起了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中心。如今，新发地有 15 道大门，有人说和当年这“三个 15”的创业史有关。

彼时中国走到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农村的“大包干”正热火朝天，指向城市农副产品供应保障的“菜篮子工程”正式提上日程。适应农产品集散和

很多地方政府实施“谁投资，谁受益”的政策，行业准入门槛低，销地农批市场出现过热发展、恶性竞争的现象，规划粗放、硬件基础设施简陋，尤其缺乏冷藏保鲜设施。

大宗交易的农批市场在集市基础上脱胎而生，离不开这二者的联姻。

在广州、西安、武汉等城市，“菜篮子”产品沿续几十年的统购派购、统一包销和低价分配供应体制已率先改革，水产品和蔬菜的价格与经营得以放开。这一改革让“菜篮子”产品价格产生了一段时间的上涨，经供需再平衡，市场供应很快就丰富活跃起来，价格回落。此后，越来越多的城市跟进，改革覆盖到肉类、禽蛋等所有“菜篮子”产品。

198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1988 年，经国务院批准、农业部牵头，以稳定保障城市农副产品供应、引导农民调整种养结构、实现增收致富为目标的“菜篮子工程”应运而生，明确要求各地大力加强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

据国家工商部门统计，1986 年至 1991 年，全国农批市场由 892 个增加到 1509 个，增长 69.2%；全国农批市场年成交总额由 28.35 亿元增加到 153.09 亿元，增长 4.4 倍。

“大集市”带来“脏乱差”

“我国现有农产品批发市场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统购统销体系，经过市场化改革逐步演变而来的。”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副院长、教授王晓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5 月 28 日，车水马龙的新发地市场（卫星数据来源：高分二号）

农批市场的地位举足轻重。我国 70% 以上农产品需要通过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集散，是农产品流通的主渠道，而农批市场的一些发展困局，则与整个链条所积累的问题密不可分。

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农批市场与社区农贸市场在全国快速“遍地开花”。

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确定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国民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钱包里的钱越来越多，城镇居民自然想吃得更好，这使得“菜篮子”产品的消费需求大幅度增长。

与此同时，一大批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的农区“菜篮子”生产基地迅速崛起。例如，1989 年寿光县“冬暖式蔬菜大棚”试验成功并推广开来，更多品种的精细菜涌向市场，寿光蔬菜批发市场成了一个大规模的产地批发市场，打出了“中国第一菜市”的名号。

消费需求和产品供给的扩大，拉动了城市销售地和农村产地相关批发市场的快速发展。

根据《中国工商管理年鉴》历年各卷的统计，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农批市场的数量以年均 14.2% 的速度增长，1995 年更是出现 42.3% 的高峰；1994 年到 1995 年间，全国增加一千余家农批市场。

这一千余家农批市场中，有一家后来在华南农产品交易领域举足轻重。

1990 年 4 月，广州出现了第一家个体蔬菜批发部，背后的“个体户”叫叶灿江。1994 年 11 月，他创建了广州石

4 月 21 日，在寿光市现代农业高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AI 智慧大棚里配备了多功能植保机（郭绪雷 / 摄）

井江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这是广州市第一家“单一民营”的批发市场，也是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的前身。

叶灿江对于广州本地农批市场的判断颇具前瞻性，他看出了南方“春淡秋淡”的季节性吃菜难、吃菜贵和冬季蔬菜滞销等问题，和当时的国营批发市场“统购包销”有关，而上世纪 90 年代初农副产品正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这就需要一个供应更丰富、集散更高效的农批市场。

经过几年发展，2001 年，石井江南市场日成交量超过 4000 吨，已成为广州最大的农批市场。

据国家工商部门统计，2000 年全国农批市场增加到 4387 个，比 1991 年增长 1.9 倍；年成交总额 3350.9 亿元，比 1991 年增长 20.9 倍；平均每个农批市场的年成交额增加到 7638.0 万元，比 1991 年增长 6.5 倍——无论是农批市场的数量还是单个市场年成交额，均呈快速增长态势。

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已逐步形成跨区域、大范围、多品种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网络，承担起农产品大市场、大流通的主要任务。农批市场成为中国农产品大流通的枢纽，其在农产品市场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基本确立。

但农批市场的快速扩张也伴随着野蛮生长下的无序。很多地方政府实施“谁投资，谁受益”的政策，行业准入门槛低，销地农批市场出现过热发展、恶性竞争的现象，规划粗放、硬件基础设施简陋，尤其缺乏冷藏保鲜设施。整体管理理念落后、服务功能单一，农批市场更像是租摊位的“大集市”，“脏乱差”成了普遍现象。

整体性“质变”仍未到来

“在发展早期，大多数市场没有规划，都是自发产生的，由原来空间较小的马路市场成长起来。”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周应恒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直到新世纪之后，农批市场才开始逐渐规范，有了一些相关条例、指引。”

当时，“菜市脏乱差”已成为城市心头之患，农业部、商务部等国家有关部委出台了诸多相关政策，着力扶持推进以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为中心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

2005 年，商务部、农业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标准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农产品批发市场标准化工作的通知》，以贯彻此前发布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技术规范》，推动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改造、规范和升级。

由此，农批市场也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自 2001 年以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数量稳定在四千余家，而单体市场的交易规模明显扩大。

在国家专项资金的引导扶持下，一大批农批市场一方面进行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另一方面，重点完善市场信息化、质量安全监管等现代物流功能。

一些大中城市的销地批发市场，则根据城市建设需要，进行了市场搬迁，这些迁建的新市场在基础设施方面普遍加大了投入。

2002 年 1 月，广州石井江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与广州蔬果集团属下的国营“越秀市场”合并组建，变成了今天的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简称“江南市场”），总面积逐步增至 40 万平米；10 月，江南市场率先在全国实施了升级改造。

也是在新世纪后，一些规范化、集聚性的农批市场发展起来，配套服务功能也逐步完善，例如建立了市场信息收集发布平台、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系统，为进场商户提供餐饮、居住等配套设施；部分市场发展了农产品冷藏加工、分级包装和统一配送等业务，有些市场建立了垃圾污水处理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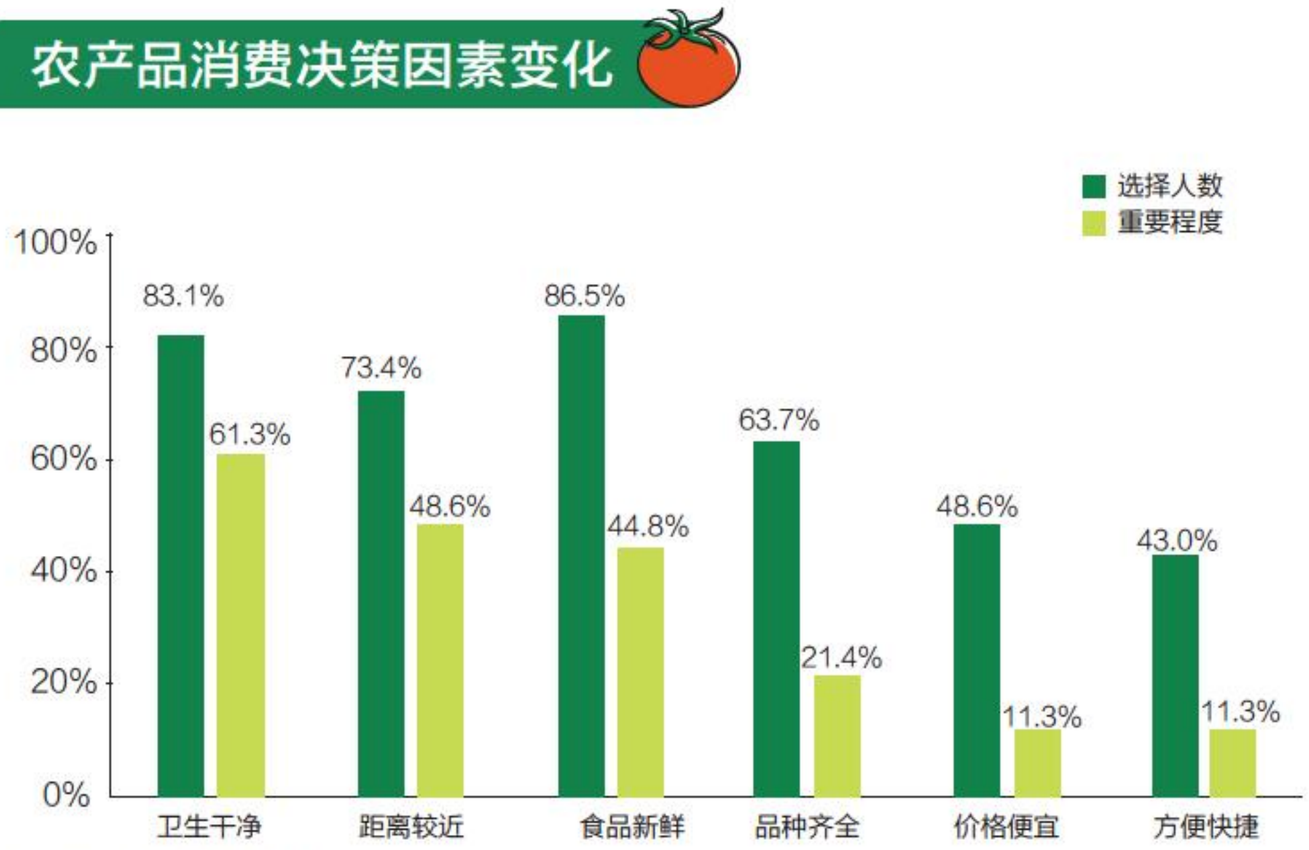
不过，整体性的“质变”还并未到来。大多数农批市场仍未具备商品分级整理、加工包装、质量验证、结算服务、委托购销、代理储运、信息提供、代办保险等全面功能配套，甚至很多大城市中的农批市场也长期处于一个低水平发展状态。

从经营主体来看，2000 年以前，全国农批市场中，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市场约占三分之二以上。中国供销农产品批发市场控股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与市场开发部经理郭智勇对本刊记者介绍，如今全国农批市场约 4500 家，其中亿元以上的 1500 家，年交易额 5 万亿元左右，民营企业以及村集体企业占比 60% 以上。

郭智勇认为，由于准入门槛较低，产品特性差异不是很明显，农批市场之间竞争激烈，导致“成本怎么低怎么来”，忽略了公益性，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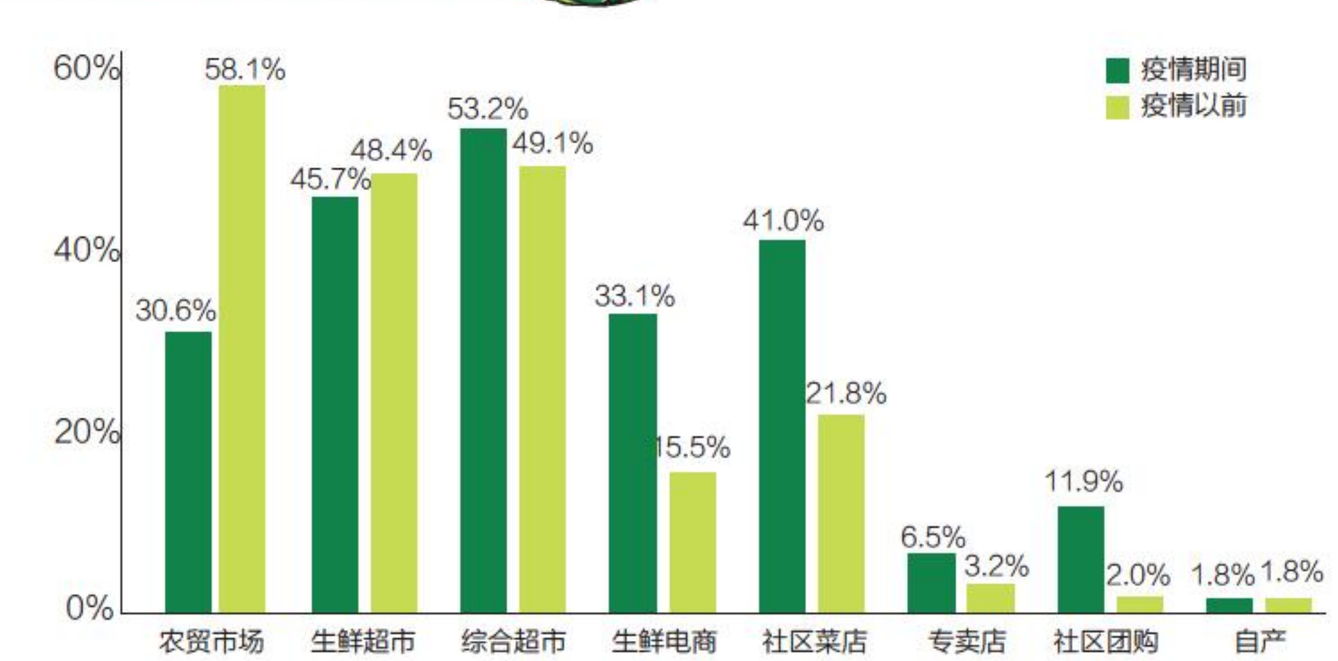
例如，一些民营企业以及村集体企业“凭借地理位置优势，掌控了一批国内有重要影响力的市场，以获取租金收入（含交易费）为主，低成本低水平运作，管理粗放；在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收集、质量安全检测、农产品准入和

农产品消费决策因素变化



数据来源：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农产品购买渠道变化



数据来源：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设计 / 刘章丰）

4 月 13 日，在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批发商在搬运蔬菜（卢汉欣 / 摄）

溯源、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等方面，长期投入不足，市场公益性缺失，脏乱差普遍存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卫生防疫等公共安全得不到保障。”

“农批市场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缺乏总体布局规划，缺乏科学管理和规范指导，管理不到位导致批发市场功能弱化；交易方式落后，农产品流通追溯体系不完善；批发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差强人意。”王晓平说。

中国农产品流通的链条一般是：农户生产的产品运送到附近的产地农批市场出售，或由市场收购商直接到地头收购，然后由长途运销商运到大中城市销地农批市场，一些大城市还形成了一级、二级、三级批发市场，经过这些批发市场将农产品扩散到社区农贸市场、超市及团体消费单位。

在这一链条中，农批市场的地位举足轻重。我国 70% 以上农产品需要通过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集散，是农产品流通的主渠道，而农批市场的一些发展困局，则与整个链条所积累的问题密不可分。

周应恒认为，由于农民个体商贩或农村经纪人是目前承担农产品运销的主要力量，作为农产品流通渠道中枢的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没有确立公益性主体的定位，停留在提供交易场所，以收取场租为主的盈利性物业商的地位。批发流通体系也存在流通主体组织化程度低，经营规模小、功能单一的问题。这也使得农批市场长期批发和零售混杂，加大了农批市场的管理难度。“即使在新世纪到来，城镇化速度加快后，这一问题也没有在城市农批市场上得到有效解决。”周应恒说。

马增俊近日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采访时表示，第一代批发市场的特征是“圈地、圈院子、盖围墙”，硬件设施不健全。第二代批发市场虽然硬件设施基本健全，但功能发挥不完善。第三代批发市场则应该是设施先进、功能完善、管理科学、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现代化市场，其升级版就是“智慧农批”。■

菜市场应有“大智慧”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璇　编辑覃柳笛

转型是传统菜市场在时代变革下的内生需求，而建设“智慧农批”“智慧农贸”便是呼应转型需求的一种表现。

一场疫情，照出菜市场斑驳的一面。

作为农产品快速集散、流通的重要渠道，热闹喧嚣的大型农贸市场和中小型菜市场，为城市餐桌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来自各地的生鲜食材，让人们得以身处闹市而品尝山海之味。

然而，提起菜市场，许多人会想到这样一幕场景：如潮水般的人流涌入市场内部，在一个个杂乱堆放货物的零散摊位前停留，现场气味混杂、交易环境简陋。

事实上，近年来，针对菜市场环境“脏乱差”、设施落后、管理低效等问题，国内不少城市已在提升其智慧化水平方面开展举措，让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为城市菜篮子赋能。

面对疫情变化，考验、提升菜场“智慧”程度的时刻到了。

供应链可追溯

考量菜市场生鲜食材的好坏，产品供应链信息是否清晰完整是个重要标准。

一般而言，农产品由菜地到餐桌，其间要经历多级分销过程。

天津市河西区大梅江菜市场快检室的实验设备和样品（白禹 / 摄）

从分散农户到当地收购人，从产地批发市场到销地批发市场，再从各类菜场、超市等来到消费者手中，一级级的流通、分销，即便是同一品类的农产品也很难进行信息追溯。

根据兴业证券发布的《2019 年农产品供应链行业深度研究报告》，多级分销市场还让完整流通过程呈现出多元交叉的特点：

零售商可从二、三级批发商进货，也可从产地、销地批发市场进货，资源整合能力较强的零售商会一定比例地直接与农户或合作社签订订单，多级批发市场也会从农户、产地、销地批发市场进货，生鲜在不同“角色”之间的流通多元交叉，没有统一规划，使流通效率下降，商品难以溯源。

利用物联网技术来实现农产品供应链全链条可追溯，主要体现在为农产品设置“一物一码”的可追溯码，让每一件农产品拥有独立编码。消费者只需手机扫码，即可追溯所选产品的信息。

农产品流转各个环节既已如此复杂多变，为将每个环节的产品信息精准留存，实现可追溯，引入新技术来提升供应链条的信息化水平，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2015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采用物联网等技术手段采集、留存信息，建立信息化的追溯体系。批发、零售、物流配送等流通企业要发挥供应链枢纽作用，带动生产企业共同打造全过程信息化追溯链条”。

利用物联网技术来实现农产品供应链全链条可追溯，主要体现在为农产品设置“一物一码”的可追溯码，让每一件农产品拥有独立编码。消费者只需手机扫码，即可追溯所选产品的信息。

近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变化，冷链运输中的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引来人们关注。2020 年 6 月 22 日，浙江省冷链食品追溯系统在全国率先上线，该系统利用“冷链食品溯源码”来掌握冷链食品供应链流向，力图实现从供应链首站到消费环节产品最小包装的闭环追溯管理。

实际上，农产品信息追溯系统是否准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个环节是否录入了足够精确的数据。一旦数据缺失或是遭到篡改，农产品可追溯的链条也会相应受到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具备去中心化、不可更改等特点的区块链技术，能够为农产品供应链溯源提供更具监督性和透明性的视野。

事实上，区块链技术也正被运用到农产品从生产到交易的全过程。

例如，素有“中国蔬菜之乡”称号的山东寿光，2018 年以来，在新规划建设的 18 个农业园区全面推广区块链追溯系统，链接起蔬菜的产、供、销流程。

数据可视化

随着可追溯食材从各种途径流转至菜市场，另一场由新技术带来的变革，正在上演。

建于 1986 年的天津何庄子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天津地区四大蔬菜批发集散市场之一，近年来，基础设施老化、经营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一直困扰着这座已经运营 30 多年的农批市场。

2018 年起，在当地企业投资下，何庄子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始进行智慧化升级改造。升级改造后，该市场实现产品溯源、交易、商户管理全面电子化，并搭建起农副产品网上平台。

在智慧赋能的当下，何庄子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选择并不鲜见。

伴随着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发展，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食品信息可追溯的日益关注，以及城市日新月异的产业格局变迁，原有菜市场，无论是从设施、管理观念还是交易方式上，都已落在了时代背后。

转型是传统菜市场在时代变革下的内生需求，而建设“智慧农批”“智慧农贸”便是呼应转型需求的一种表现。

纵观中科深信、筑美科技、林鲲科技等服务商对菜市场的改造，“两屏一秤”（信息公示屏、触摸查询屏与智能溯源电子秤），是菜场智慧化升级过程中最普遍也最为直观的设施。

在以往菜市场销售场景中，“货比三家”再寻常不过。在引入信息公示屏、

触摸查询屏后，各类食材指导价格、即时行情、安全检测信息，以及市场当日交易金额、销售排行榜、实时交易数据等信息，都以可视化形式一一呈现。

与此同时，在每一个摊位上，都统一配备了智能溯源电子秤，电子秤屏幕上可以显示出该商户的工商注册信息、健康证、营业执照等内容。农产品一上秤，其名称、重量、单价、价格等数据也会实时出现，保证交易透明，杜绝“缺斤短两”的交易纠纷。

支付完成后，智能溯源电子秤还会打出一张凭证单，消费者“扫一扫”凭证单上的食品安全溯源二维码，便能够看到该商品的安全溯源信息，而电子秤上每日沉淀的运营数据也成为可查询、可追踪的数据账本。

“两屏一秤”看似简单，背后却显现出整个菜场“数据化”的影子。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带动下，一台台电子秤上留存的交易数据、菜价数据、溯源数据，得以在市场大屏上归集汇总、即时更新。

在疫情期间，对于消费者而言，可视化、可追溯的农产品购买体验更能起到“安心”的作用。

管理可迭代

与大多数智慧设施相同，以“两屏一秤”为代表的菜场智慧产品，发力处也不止于消费端。

智慧追溯电子秤上的交易数据、产品信息、检测报告，都会实时传输到市场所在地监管机构的线上监管平台上。各个菜市场积累的大量数据，又会在监管平台上分类，为完善机构预警机制奠定数据基础。

在菜市场内部，由“两屏一秤”留存、沉淀的一笔笔数据，除了为消费者提供清晰的购买和溯源路径，还会上传至云端管理平台，让商户、市场管理者在不同端口掌握各自需要的信息。

例如，登录智慧菜场系统平台，用户既可以看到大数据分析结果，了解消费者购物偏好，为下一步进货、营销探寻更为精准的方向，也可以登录电商平台，打通线上、线下壁垒，丰富营收渠道。

尽管农批市场带有保民生的公益属性，大部分国内农批市场却都是家族式或者乡办式企业，如何在民办企业市场性与农产品公益性之间取得平衡，是关乎农批市场智慧化改造速度的关键一步。

除此之外，商户还能在平台上及时查收所在市场发布的通知公告、安全卫生问题预警等信息。

对于市场管理者而言，云端管理平台则是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渠道。

自 2019 年以来，已在深圳、广州、汕头等城市农贸市场进行推广的“食安检 – 智慧农贸管理系统”，包含智慧支付、智慧计量、快速检测、巡查稽查、商户管理、数据分析等功能，意在打通监管方、管理方、经营方与消费者。

通过这一平台，菜场管理人员可以在线开展商户进出货台账检查、食品溯源管理、食材抽样快检等检查内容。

筑美科技则利用区块链技术，在菜场与商户之间搭建线上摊位招租与竞拍、电子合同签约等场景，方便二者之间的沟通。

值得留意的是，相较于小体量菜场，国内大型农批市场低水平运营、粗放式管理的问题更为突出。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贸易经济系主任王晓东曾对媒体表示：“现在国内不少批发市场仍停留在原始摊商阶段，市场监管还是以收摊位费管理为主。对标零售管理，这些年随着零售业的快速发展，零售业态的现代化管理日臻完善，而批发市场的管理水平并没有随市场规模的扩大而显著提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慧管理平台的赋能，为农批市场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提供了一种发展思路。

新场景能有新商机

实际上，早在 2014 年 3 月商务部等 13 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产品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中，便已明确提出“开展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化提升工程，完善信息化管理系统，推广电子结算系统”。

然而，除了少数农批市场已完成智慧化改造升级，大部分农批市场依然存在管理粗放、运营水平较低的问题。

在中国蔬菜流通协会执行会长戴中久看来，农批市场智慧化改造滞后，与其长期处于“谁投资、谁受益”模式不无关系。

“（批发市场）以最低的成本，将多层次人群的消费需求聚集起来又快速匹配供给，在这个过程中，批发市场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生存和收益的问题；对于那些需要大量投入人力、物力、资金，又无法快速提高市场运营收益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信息化体系建设等方面，就显得发展滞后。”戴中久说。

尽管农批市场带有保民生的公益属性，大部分国内农批市场却都是家族式或者乡办式企业，如何在民办企业市场性与农产品公益性之间取得平衡，是关乎农批市场智慧化改造速度的关键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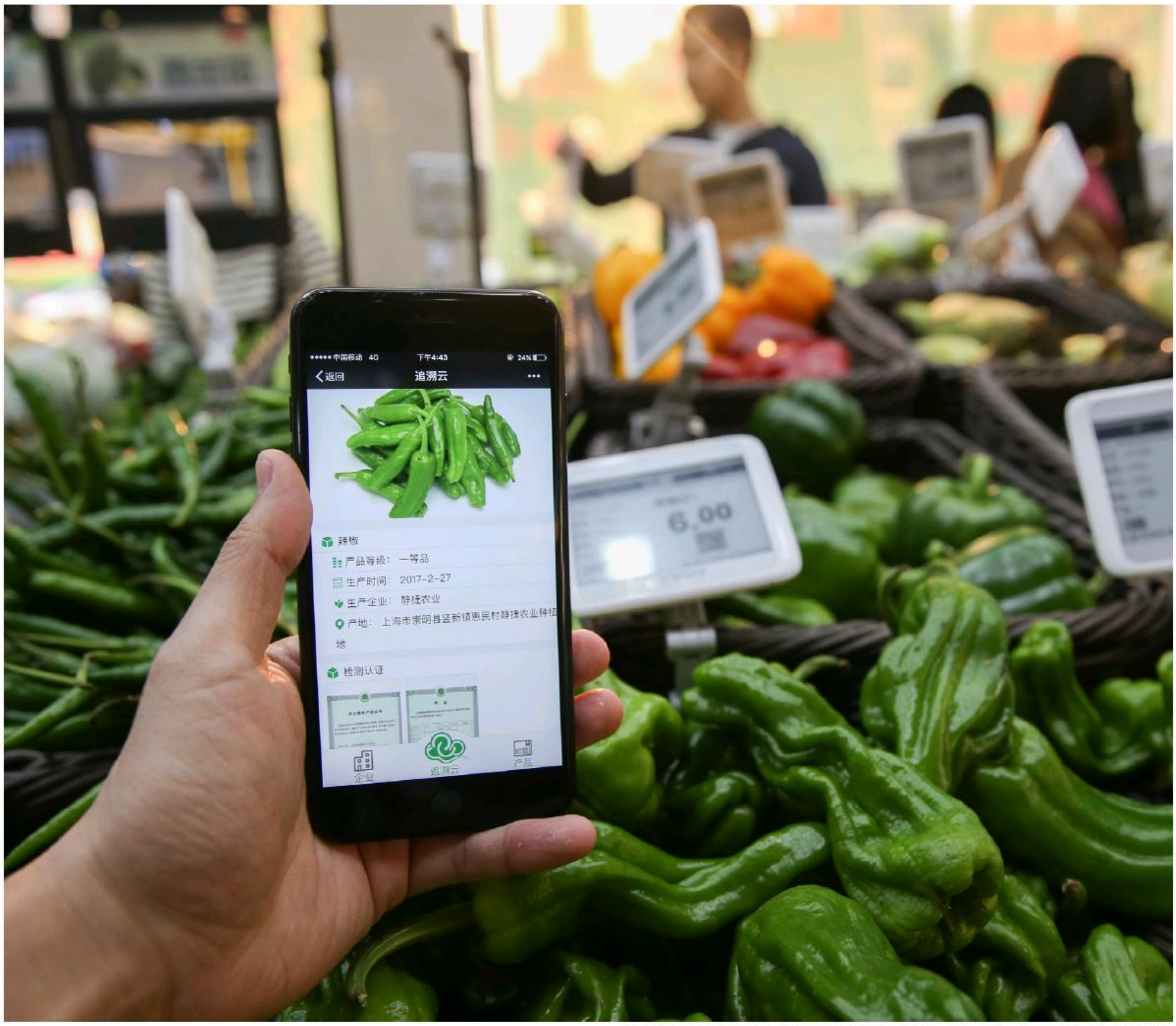
而政府在农批市场改造中的投入程度，也与这一问题息息相关。

在戴中久看来，针对农批市场智慧化体系建设，政府除了在政策上给予扶持，还需要在资金、常态化运营管理等方面加强支持力度。

与农批市场相较，中小型菜市场的智慧化转型，进展要更为明显。

政策的推动是一方面。

2019 年，按照建设“智慧化”农贸



在上海市美天华山菜场，消费者展示扫描商品标签上的二维码后显示的内容（丁汀/摄）

市场的要求，深圳计划分批改造升级农贸市场。截至2019年7月，在全市353家农贸市场中，已完成改造农贸市场61家，正在改造的农贸市场30家，规划近两年改造的市场78家，尚未纳入规划改造的184家。

疫情发生以来，天津提出要进一步加快菜市场升级提档。2020年4月，天津市商务局发布《关于推动菜市场全面提档升级的通知》，“推动智慧赋能提档升级”是其中重要一方面。

从产业角度来看，智慧化改造农贸市场，也让新技术的应用场景得到进一步扩展。

例如，地处杭州的骆家庄农贸市场是一座由移动5G网络信号全覆盖的智慧菜场。当5G技术进入农贸市场，在市场上进行5G+VR全景直播、完成普通网络无法支撑的全景图像数据传输，也就成为可能。

新的应用场景，也意味着新商机。

近年来在生鲜领域颇为活跃的互联网电商平台，也开始将视线移向实体菜市场本身。

2020年5月，饿了么发布智慧菜市场六大标准，包括选品智能化、管理可视化、数字化营销、质控数字化、技术多样化、履约数字化等内容。饿了么还宣布将在全国100个城市以上述标准完成传统菜场改造工程。

值得留意的是，骆家庄农贸市场正是由饿了么联合合作方打造的智慧菜市场。市场上的5G直播间，便遵从了“数字化营销”的标准。

可以预见的是，菜场智慧化未来必定是各方大显身手的舞台。■

生鲜平台：菜市场取代者?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璇　编辑覃柳笛

疫情之下，人们对线上业务的需求被放大，但有多少因疫情而选择线上买菜的消费者会长期留存在平台上，尚无明确答案。

自 2012 年“褚橙进京”掀起生鲜电商热度以来，创业公司、电商平台纷纷在这一领域布局，其间既有“攻城略地”的高光时刻，也不乏落寞转身的黯淡瞬间。起起落落间，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又让生鲜电商平台交易数量明显增长，加速了行业渗透的进程。

艾媒咨询 2020 年 1 月发布的《2019 年中国社区生鲜行业市场运行监测报告》显示，2013–2019 年中国生鲜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扩大，2019 年中国生鲜市场交易规模达 2.04 万亿元，同比增长 6.8%。

与传统菜市场相比，生鲜电商平台自带互联网基因，能够以新技术、新观念重构上下游产业链条，不断开拓新场景、新模式。

疫情之下，生鲜电商平台未来几何？是否会取代菜市场？

农批市场绕不开

2020 年 6 月 13 日凌晨，素有首都“菜篮子”之称、承担全市蔬菜 70% 供应量的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以下简称新发地），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暂时休市。

4 月 7 日，北京盒马鲜生店，湖北德炎小龙虾上架盒马鲜生

北京市商务局随即协调各相关单位和企业，发挥生鲜电商、蔬菜直通车、无接触配送等新模式作用，加大市场供应保障力度。

一时之间，“菜从哪里来”的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而生鲜电商平台的进货渠道，以及与农批市场的关系，也被更多消费者关心。

按照商业模式划分，生鲜电商主要分为外卖平台与自营两类。前一类以饿了么、京东到家为代表，由平台负责配送服务，生鲜食材还是由各类菜市场提供，自然离不开批发市场的分销供给；选择后一类模式的每日优鲜、盒马鲜生等，则侧重发展“源头直采”。

所谓源头直采，意即从原产地直采直销，打通上游与终端，跳过农产品流转的中间步骤。

近年来随着新零售业态的发展，直销模式有所提升，但是并未改变农副产品供应中分销模式的主导地位，三分之二的农副产品供应仍然来自分销模式。

新发地休市后，不少生鲜电商平台在声明保证供应的同时，强调大部分果蔬食材都由厂家直供、源头直采，与新发地无关。

事实上，生鲜电商平台的“撇清”，既是展现其正在发展的商业模式，也侧面显现出公众舆论对农批市场的担忧情绪。

疫情之下，不乏一些呼吁取缔、关停农批市场的声音。

而在大多数业内人士看来，农批市场在农产品流通体系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不能“因噎废食”。

国内农产品供应链条长、参与方多，这源于农产品产、销地分散，“产全国卖全国”的特点，而以新发地为代表的农批市场，能够对农产品进行快速匹配供给，正是中间步骤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蔬菜流通协会执行会长戴中久曾以“快速分销的漏斗”来形容农批市场，也是侧重描述其中转、集散效率。

在 2015 年 8 月商务部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的《全国农产品市场体系发展规划》中，已对全国农产品市场体系提出了发展目标：

到 2020 年，初步建立起以产地集配中心和田头市场为源头，以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中心，以农产品零售市场为基础，以高效规范的电子商务等新型市场为重要补充，有形和无形结合、线上和线下融合、产地和销地匹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布局合理、制度完备、高效畅通、安全规范的中国特色农产品市场体系。

这一发展目标，点出了农批市场、电商平台各自在农产品市场体系中的位置。

事实上，生鲜电商也离不开农批市场。

6 月 21 日，在国家发改委统一部署下，北京相关企业与河北开展“点对点”对接，就产地农产品通过河北相关进京果蔬中转调运站，保供北京市场进行商讨。除了北京各大连锁商超、市内二级农批市场等企业之外，部分生鲜电商也在参会之列。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认为，近年来随着新零售业态的发展，直销模式有所提升，但是并未改变农副产品供应中分销模式的主导地位，三分之二的农副产品供应仍然来自分销模式。

自建供应链

以溯源上游来打通链条、降低成本，是生鲜电商选择发展源头直采的初衷。

然而，入局的生鲜电商很快体会到，“电商领域里最后一块硬骨头”不好啃。

生鲜行业具有毛利低、损耗高、供应链复杂等特点。一方面，生鲜产品种类繁多，在种植、收货、存储等方面差异较大，如若所有品类都选择源头直采，冷链物流成本极高，很多前期投资数目较大的生鲜电商创业公司，都没能“熬过去”。

另一方面，经过多年培育，传统菜市场早已形成一套成熟的运转机制。

“生鲜行业是高频刚需，曾经被很多电商平台视作待开发的蓝海，但是实施起来才知道，此前的‘留白’是有原因的，这个行业利润率太低，而且传统菜市场批发渠道已经是生鲜市场上价格最为优化的，平台价格优势很难体现出来，更何况还有配送费。”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尽管如此，电商平台还是试图啃下

生鲜这块“硬骨头”。

例如，每日优鲜合伙人王珺曾对媒体表示，每日生鲜只做两类产品的产地直采，一类是大白菜、土豆等民生、流量产品，另一类是毛利率更高、能够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的特色产品。

疫情发生以来，不少生鲜电商平台出现过菜品断货现象，这也让一些平台开始加码布局供应链体系。

截至 2020 年 6 月，盒马已在全国搭建完成 41 个常温和冷链仓、16 个加工中心、4 个活鲜暂养舱的供应链体系。

随着 2020 年 4 月盒马宣布将总部落户上海浦东，生鲜商品加工中心、半成品及成品食材研发中心、无人自动化冷链物流中心也已动工。盒马还将与上海浦东新区航头镇共建一批盒马村。

值得留意的是，拥有完整供应链后，电商平台还可对生鲜品类进行更多尝试。

以盒马推出的“平价有机菜”为例，在打通供应链的前提下，通过订单模式，种植有机菜的直采基地稳定了生产和供应，在与基地共赢的基础上扩大了重点品类的生产规模，降低了有机蔬菜的种植、物流成本。

经过两年多的项目孵化，盒马于 2020 年 3 月对外发布旗下主打有机菜的新品牌——盒马有机鲜。

菜市场为了解一座城市的文化和生活底色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入口。旅行者要想迅速掌握陌生城市的“密码”，最简单的方式便是起个早，到街角菜市场去看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各个电商平台积极扩充自身供应链，也为生产更多“自有产品”埋下伏笔。

社区“试验场”

对于生鲜电商平台而言，社区是其触达消费者的“前线战场”。

在以何种方式触达社区消费者这个问题上，不同生鲜电商平台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其中以前置仓模式和店仓一体化模式较为普遍。

根据罗戈研究推出的《2020 中国社区零售供应链研究报告》，前置仓的典型特征是区域密集建仓。基于大数据精准预测，提前判断各地区需求情况，货物在大仓进行标准化加工，基于预测结果，统一配送到各地前置仓，一旦消费者下单，便从前置仓即时配送到消费者。

前置仓模式不设线下场景，主要发挥流通作用和仓储功能，自然对生鲜平台准确备货的能力要求较高。

针对前置仓的特点，以技术投入来优化算法模型，是叮咚买菜、每日优鲜等选用前置仓模式的平台的主要着力处。例如，为提高运营效率，叮咚买菜采用大数据和 AI 技术来完成订单预测、智能推荐、末端物流自动调度等工作。每日优鲜旗下 1500 个前置仓都有独立的基于销量预估的智能补货计划，其目标是实现“千人千仓千面”。

与前置仓相较，以盒马生鲜为代表的店仓一体化模式，更多体现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设计思路，在业态上也更为丰富。

按照投入成本、覆盖区域、业态轻重的差异，盒马鲜生分别推出了盒马鲜生门店与盒马 mini 两种业态。相对来说，盒马鲜生门店对标的是大卖场，而盒马 mini 模式轻、投资少，可以进驻到郊区、城镇社区，选址更为灵活。

消费者到店体验也是盒马鲜生发力的领域。除了生鲜产品销售，还设置餐饮服务场景，并根据不同地区的消费者需求和口味偏好调整销售供给。

那么，两种模式里，哪种可以走到最后?

目前还无定论。

事实上，生鲜赛道竞争激烈，短短几年时间，选择两种模式的电商平台，便各有出局者。

在业内人士看来，整个生鲜电商行业目前尚未形成成熟的盈利模式，即便是头部企业出现数据足够漂亮的个例，也难以在整体上实现盈利。

“生鲜赛道是一条很长的赛道，当下社区生鲜行业的确出现了一些新业态、新模式，但这种创新并未从根本上带来现有生鲜市场生态的变革，电商平台能否在社区中‘突围’，还要看更长远的表现。”王健说。

2013–2019 中国生鲜市场交易规模

数据来源：艾媒数据中心（设计 / 刘章丰）

2018 年 4 月 22 日，运输乳瓜的无人机从陕西省武功县福瑞特现代农业园区飞往菜鸟原产地标准化仓库（李一博 / 摄）

回到菜市场

对于很多生鲜电商而言，2019 年是难忘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不少生鲜电商平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折戟沉沙，以至如《丧钟为谁而鸣：盘点分析 2019 年生鲜电商死亡名单》这般的题目，不断出现在年底新闻报道之中。

盲目扩张、资金链断裂、模式不成熟，是提及失败案例时的高频词汇。

然而，随着疫情暴发，事情发生了改变。

凭借非接触经营方式的优势，生鲜电商平台订单飞涨，根据数据智能服务商个推发布的数据，2020 年春节期间，生鲜类 App 平均日活同比增幅为 107.17%，其中 7 天长假和在家办公期间分别达到了 108.46% 和 108.55%。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胥正川认为，“这次疫情是对企业零售能力的极大考验。新冠疫情改变了消费者行为，使其强制性转向线上购买，配送到家。在线生鲜品类攻克了实体菜场的最后一道防线。”

而在王健看来，生鲜电商与实地菜市场之间，本不构成明确的竞争关系：“互联网生鲜市场其实就是让有生鲜配送到家需求、对价格不敏感这一类消费者多了一种选择。”

疫情之下，人们对线上业务的需求被放大，但有多少因疫情而选择线上买菜的消费者会长期留存在平台上，尚无明确答案。

毕竟，传统菜市场之于城市和个体的意义，远远不止于买卖本身。

一方面，菜市场为了解一座城市的文化和生活底色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入口。旅行者要想迅速掌握陌生城市的“密码”，最简单的方式便是起个早，到街角菜市

场去看看。一个个摊位走下来，对城市性格也就有了底。

另一方面，菜市场还是外来务工者的重要就业场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陈宇琳有着多年走访调研菜市场的经历，在她看来，相比于封闭的厂房、漂泊的工地，菜市场的环境更有利于商户和居民、菜市场内部商户社会融合，是农村商户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事实上，社区菜市场本身便带有很强的公益性。国家发改委 2020 年 4 月印发的《2020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里，提出“改善城市公用设施”，其中便包括“健全停车场、智能快件箱、社区菜市场等便民设施”。一座社区菜市场，可以助力提升街区公共服务水平和综合承载能力。

当然，菜市场自带的社交属性和烟火气，也是生鲜电商平台和商超无法比拟的。在中篇小说《井》里，作家陆文夫描述了一个人物的菜场瞬间：“买菜是一种学问，一场战斗，她进了菜场就是上了战场，脚步飞快，眼看八面，讨价还价，刨去零头，假装要走，三步回头，称好了菜还要抓一颗放在篮里：‘你小气的啥呀，反正是自家地里长的！’”

在卖家与买家的三言两语之间，一把小菜、几颗葱头的小生意，也能带出鲜活热辣的生活滋味。

事实上，近来部分生鲜电商平台也关注到了菜市场的人情味道，并在平台上为购物体验加入细节设计。

例如，“赠品提醒”是叮咚买菜 App 应用设置里的一个选项。选项开启后，平台会在购物车页面上询问是否需要免费小葱，点击“需要”，一份 20g 的小葱就会出现在购物车中。

生鲜平台的细节设置，让传统菜市场的买卖逻辑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线上，而围绕在一份免费小葱上的人际来往、熟客氛围，却无法在平台上简单复现。

归根结底，菜场温度，只有在菜场里才能真实感知。■

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贾寨镇后村，村民在采摘韭花

2019 年 3 月 10 日，上海新地标愚园公共市集，菜场里暗藏知名美术馆

上海菜场变身记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万宏蕾　编辑覃柳笛

“既想保留老菜场的烟火气、人情味，又想从‘油盐酱醋茶’到‘衣食住行闲’，集合十几项配套功能，升级为城市新街区的载体。”

“哎哟，那阿来兜兜啦？”

“喏，带孙女过来买两则青团。”

“妹妹长噶高啦！几年级啦？好看嘞！”

在上海诸多“网红菜场”之一——普陀区真如高陵市集，两位上海老阿姨边挑菜边闲聊，这家比比，那家逛逛，很是惬意。

高陵市集前身是高陵农贸市场，2019 年 3 月开始改造，2020 年 3 月再次开放。改造后的高陵市集视觉效果上呈现浓浓的“老上海风”，蔬菜、海鲜、肉禽、腌腊、豆制品、米面粮油的摊位应有尽有，日用杂货和缝缝补补的小摊也都保留了，对邻里们非常友好。

从马路菜场入室，到室内菜场启动标准化改造试点，再到标准化菜市场基本实现全覆盖，上海用十多年完成了菜场建设“三级跳”。

目前，上海市内有超 900 家标准化菜市场。整体来看，中心城区集聚度相对较高，外围区域布点分散，但基本覆盖各个街道镇。其中，浦东新区标准化菜市场数量最多、约占全市的 20%，

排在二、三位的分别是闵行区和宝山区。

时髦洋气的菜市场开始在上海密集出现。

浦东新区先进探索

“菜市场应该是什么样子？”时间回到 2012 年，浦东新区商务委副主任李晓明在一次务虚会上提出这个问题。

彼时，上海各种马路菜场和不规范菜场比比皆是，浦东新区内 200 个菜场产权性质各异，民营企业居多，“早期菜场不连锁，每个菜场都是不同的管理者，召集 200 多人一起开会，大家抽着香烟、穿着雨鞋就来了，难以统一管理。”李晓明在这次会上说，“如果未来菜场是现有的样子，那我们就下大力气去整治，如果不是，我们就直接改换跑道，先行探索出一条路子。”

为了改变浦东新区菜市场建设与群众需求、经济发展、城市形态不相符的现状，也为了回答“未来菜市场的发展方向”这一问题，2012 年，浦东新区商务委开始各种调研论证，“当时我们前往永辉超市的大本营福州取经，巧遇同来寻求转型方向的上海蔬菜集团，三方一拍即合。”李晓明回忆，“几方形成合力，大家决心先行探索菜场转型新模式。”

老牌国企上蔬集团旗下拥有十多家批发市场和数百家菜场网点，农产品年经营量 350 万吨以上；永辉超市在全国有几百个农副产品直供地，以及 1300 亩现代化物流中心，双方资源互补，可以最大程度降低流通环节的成本。

2013 年，浦东正式引进龙头企业上蔬永辉，除了国企上海蔬菜集团、上市民企永辉超市、还有摩根斯坦利以及鼎辉投资。这样以超市业态运作的“中心菜场”模式，是浦东突破城市菜市场管理瓶颈的尝试。

“菜场改造升级需要制度设计，这种民生工程不能完全放给市场，但又不能政府自己撸起袖子下场干。”李晓明

“定位社区，食品的经营比例在 90% 以上，生鲜的比例在 60% 以上”——标准化菜市场看上去越来越像超市，但它还是姓“菜”，超市化的“品相”和管理模式，正是 2.0 版的发展重点。

说，在浦东新区商务委与上蔬永辉的战略合作协议中，对新模式菜市场有基本要求——建筑体量要在 1000 至 4000 平方米之间，主营生鲜食品；统一标识、统一管理、统一结算、统一售后服务，实行冷链配送，冷库储存，商品溯源等。新区还承诺帮助上蔬永辉协调推进菜市场网点的落实，给予相关的扶持政策。上蔬永辉除了建设运营中心菜市场外，还要在农产品价格出现剧烈波动时，按照政府指导价格供应，起到“稳价器”的作用。

在第一家上蔬永辉尚博店经营一个月之后，浦东新区商务委专门找附近居民开了一个座谈会，听听居民的真实感受，得到正面评价后，“我们才考虑新模式菜市场逐步试点推开，首批推进的重点是菜场布点存在盲区的陆家嘴、联洋等区域，其次是即将再次进行标准化改造的菜市场。”李晓明说。

浦东新区先行试点的同时，上海市菜场标准化改造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2017 年《上海市示范性标准化菜市场建设指南》，从规划合理、经营规模等 10 个方面，为示范性标准化菜市场“建章立制”。

“定位社区，食品的经营比例在 90% 以上，生鲜比例在 60% 以上。”——标准化菜市场看上去越来越像超市，但它还是姓“菜”，超市化的“品相”和管理模式，正是 2.0 版的发展重点。

最新的情况是：2020 年 5 月 1 日起，上海市新修订的《标准化菜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开始实施，从标准化菜市场的建设、经营要求、食品安全、价格、卫生、计量、人员等管理要求和服务功能等方面作了规范。

一站式便民综合体

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菜场的蔬菜摊多少带点文艺气息。摊贩们对食材的摆放讲究，处理得也精致，板栗要细分成带壳的、去壳带皮的、只有果肉的三种；冬笋、荸荠，都被剥壳处理得“干干净净”；绿叶菜竟然有二三十个不同品种，草头、豆苗、矮脚菜、太湖菜、西洋菜、观音菜……有些听都没听过。

在上海菜市场，莫兰迪配色、卡通霓虹灯、专属 LOGO 等各种设计元素让人眼花缭乱，闵行区黎安集菜场、黄浦区永年菜场、长宁区九华·邻里中心等都是上海菜场的网红打卡点。

什么是“示范性标准化菜市场”？

一排排整齐的货架，干净的地板，精装修的空间，冷藏柜一字排开，摆得赏心悦目。除了买菜，还有各式美食小吃、健身馆、鲜花店、便民药店、舞蹈房、医疗室、理发室、阅读区、儿童活动区……

与普通标准化菜市场相比，示范性标准化菜市场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经营模式上。以万有集市为例，它将传统的“摊位制”转变为菜场管理公司与经营户合作的“统一标识、统一管理、统一结算、统一服务、统一品牌”五统一管理模式。

在这里，购物环境、收银方式、整体运营都与一般的连锁超市无异。而且，商品标牌上除货号、规格、等级和价格外，还有一个二维码，手机一扫就能追溯整件商品从“出生”到最终摆上货架的全过程。在收银处，除有两名收银员“站岗”的人工收银台，还有一台自助收银机，顾客自行扫描商品条形码，选

上海上蔬永辉菜场

择支付宝或微信付款，就能快速完成“无人收银”。

改造后的“示范性标准化菜市场”与其说是“菜场”，不如说已经升级为“社区一站式便民综合体”。

“既想保留老菜场的烟火气、人情味，又想从‘油盐酱醋茶’到‘衣食住行闲’，集合十几项配套功能，升级为城市新街区的载体。”万有集市负责人马莉介绍。

另外，美天芙蓉江路菜场堪称顶配版菜场，作为上海首家 AI 菜场，门口有迎宾机器人引导市民进入，菜场内的智能超市，甚至只要“刷手”就可以完成支付结账。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菜场在硬件环境提升的同时，一些“基本款”蔬菜价格反而更便宜了。

由传统菜场改造而来的绿川生活中心菜场南新店，一改传统菜场所有摊位分散进货的局面，以自营模式运营，菜场统一进货。“进货集中了、进货量变大了，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

菜场运作方上海亳鑫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明介绍，公司在自身经营菜场、超市外，还承担不少超市的供货，每天仅猪肉就进出约 150 头的量，“厂家给的自然是最低价。”

“2.0 版菜场采取集中收银，每笔订单都有后台记录，菜场对价格浮动、品种变化、销售数量都能详细掌握，不再是‘只问租金不问经营’的‘房东’。经营户使用菜场统一的 ERP（企业资源管理）系统进行收银、菜品管理，菜场管理方通过 ERP 可以实现对每个摊位进货和出货的精确掌握，一旦发现违规经营就能及时处置。”张明说，“比如当天进货 100 斤，实际却卖了 105 斤，多出来的 5 斤一定是隔夜菜，说明商户违反了诚信经营原则。”

空间少催生“限时菜场”

时间回到 2017 年，旭辉和香港置地“联姻”，此前以 41.75 亿元拿下上海浦东新区洋泾地区地块后，这次又再次联手拿下该地块附近的菜场用地。

从位置来看，该地块处于上海浦东内环核心商圈，与 LCM 置汇旭辉广场接壤，位于博山路和崮山路交叉口。此外，该地块周围小区环绕，洋泾街道现有居民小区 113 个，高中低档小区呈现从西向东、从南向北梯次分布，5 公里内成熟人口达 127 万。

这是上海市近几年来唯一一次出让的菜场用地。出让文件显示，该地块将规划为社区商业用地（室内菜场），并要求开发商全部持有，确保菜场公益性，不得挪作他用。LCM 置汇旭辉拿下地块后，参考荷兰鹿特丹最美菜场，打造成集生鲜、净菜、生鲜食品加工配送等为一体的“中国最美生鲜集市”。只不过，

这一菜市场可能没有熙攘的人群、积水的地面，更没有此起彼伏的吆喝声。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要完成菜场升级改造，“土地制约是个老大难问题”。李晓明说，“我们的做法是经过详细调研提前做好菜场用地规划，土地性质就只能用做菜场，如果不做或放弃政府可以原价收回。”

比如，上海陆家嘴区域核心面积约31平方公里，户籍人口约40万，细数下来，周边有八佰伴、华润时代、新大陆、新梅、正大广场等大型商场，东昌路、浦城路、商城路、张杨路、浦东南路等传统临街商业。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陆家嘴地区买菜问题素来是居民的“老大难”。

记者翻阅《浦东新区菜市场（农贸市场）专项规划（2011–2020年）》，发现如下表述：“通过规划的系统梳理，发现部分菜场紧缺地区由于所在区域已完全建成，没有剩余土地可以建设菜场。从理论上而言，这些地区巨大的需求会吸引商家到此开设生鲜超市，但由于生鲜农产品微利的特点，这样的市场机制往往失效。因此，政府必须主动介入，提供生鲜农产品的供给。”

浦东新区便率先探索出限时菜场模式。

以浦东新区联洋社区为例，社区周边土地开发已经完成，虽然规划了超市，但一直没有标准化菜场配套。而布点一家菜场涉及规划、土地、建设、运营等多方面，增设菜场难度大、周期长。

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快、平、短、安”特点的限时菜场成为菜场体系的有益补充。

限时菜场设于联洋社区街角的空地上，几十个方形空菜筐被摞成有一定高度的平台，在菜场一角的“商品价目表”上，清晰地注明了当天销售的近百种菜品的单价。营业时间大多在上午6点至10点，错开大部分超市和商场的开门营业时间。据了解，布点的限时菜场中，最快落实的点位前后仅耗时半个月。“快捷”的特点使得限时菜场的可推广性进一步增加。

限时菜场设于联洋社区街角的空地上，几十个方形空菜筐被摞成有一定高度的平台，在菜场一角的“商品价目表”上，清晰地注明了当天销售的近百种菜品的单价。营业时间大多在上午6点至10点，错开大部分超市和商场的开门营业时间。

“这个菜场和路边菜场可不一样，路边菜场都由临时商贩聚集而成，菜品来源无法保证。这里引进的是集团化运作，产销对接，每样蔬菜和产品都可追溯，是有小票的。”李晓明说。

居民尝到甜头后，“限时菜场”的做法逐渐推广开来，如今也推广到长宁、静安、闵行等区。

供应链悄然升级

尽管正向标准化方向改造升级，但菜市场“脏乱差”的印象还没完全从消费者心中抹去。

在超市、生鲜便利店及电商的多维冲击下，存在供应链冗长低效、环节多、消耗大、效益差等问题的传统菜市场何去何从？

“为了提高菜市场改造升级的动力，我们的做法是‘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李晓明说。

一方面，浦东新区政府按审计报告核定的建设及改造面积，给予标准化菜市场50%的资金补贴，最高不超过40万元。对于试点企业在菜市场缺失区域开设限时菜场，每个一次性补贴1万元。

在考核奖励方面，对菜市场工作成绩突出的经营管理主体给予不超过300万元奖励，对平价菜柜，不超过700万元。

另外，在考核评比方面，“我们花多年时间理顺了工作关系，委托专业机构对全区标准化菜市场每季度开展一次实效测评工作。”李晓明说，结合《菜篮子工作考核办法》《标准化菜市场评估细则》《平价菜柜评估细则》等相关规定，成立考核小组，菜市场测评内容涉及市场建设、市场管理、市场供应、市场安全、市场满意度5大类，共计70项评估细则。

为了进一步提高标准化程度，菜市场引入了具有丰富行业资源和优秀管理团队的专业菜市场管理公司，菜市场实现连锁化或品牌化经营，更能发挥规模经济优势、降本增效。

未来随着菜市场升级改造、经营权聚集，在上游可以借此实现大型交易合作，从而实现产地直采或厂商供货。在下游可通过提高人气，吸引更多客源。区域邻近菜市场或能形成联盟，统一管理、采集、购货，提高议价能力。

目前，上海已出现三种细分类型示范性标准化菜市场品牌：以上蔬永辉、康品汇、铭言生鲜、盛政都市农超等为代表的社区生鲜超市化菜场；以万有集市为代表的文艺范街区化菜场；以阳普生鲜·乐味坊、美天凯顺、清美品上生活等为代表的邻里购物中心化菜场。

据了解，上海菜场标准化改造的做法也被其他城市借鉴。根据2020年4月武汉市农贸市场（菜市场）标准化改造指挥部下发的《武汉市农贸市场（菜市场）标准化改造工作指导意见》，武汉将拿出2亿元财政资金改造425家农贸市场，“全面对标上海”。■

美天 AI 菜场

科技感十足的人工智能菜场

地址：长宁区天山支路 201 号

九华邻里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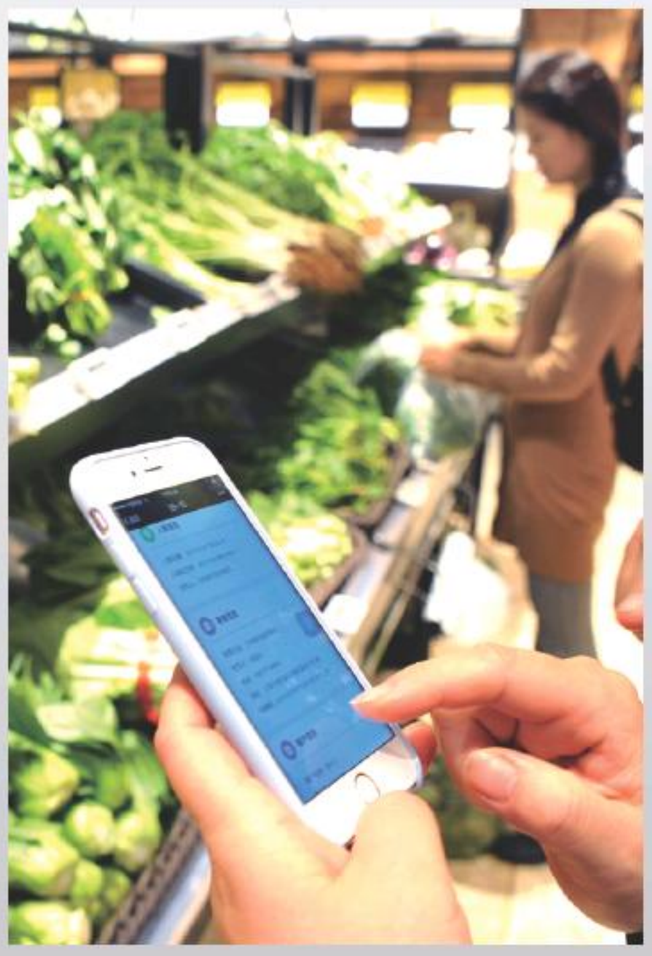
文化多样性的菜场

地址：长宁区安顺路与凯旋路交界处

万有集市

时尚前卫的新潮地

地址：浦东新区商城路 357 号



黎安集

拥有“夜市”的一站式菜场

地址：闵行区秀文路 550 号

永年菜场

乡野气质的小清新

地址：黄浦区永年路 74 号

设计 / 开开

东京菜市场这么管

文 | 陈言　编辑戴闻名

筑地市场的管理，主要靠行业协会的管理组织自治，并非政府——这些管理组织，在日本叫做“管理组合”。

这些年和中国朋友一起去东京的机会多了，不少人会提议去看看筑地市场的早市。

他们心甘情愿赶清晨 4 点半的第一班地铁去筑地市场，就是想看鱼商如何将一条数百公斤的巨型金枪鱼，如庖丁为文惠王解牛一般，转眼间就分解成了一块块的刺身，手之所触肩之所倚，样样酣畅。看完“表演”之后，还可以就地买下分解好的嫩滑刺身，饱餐一顿最为鲜美地道的东京“全鱼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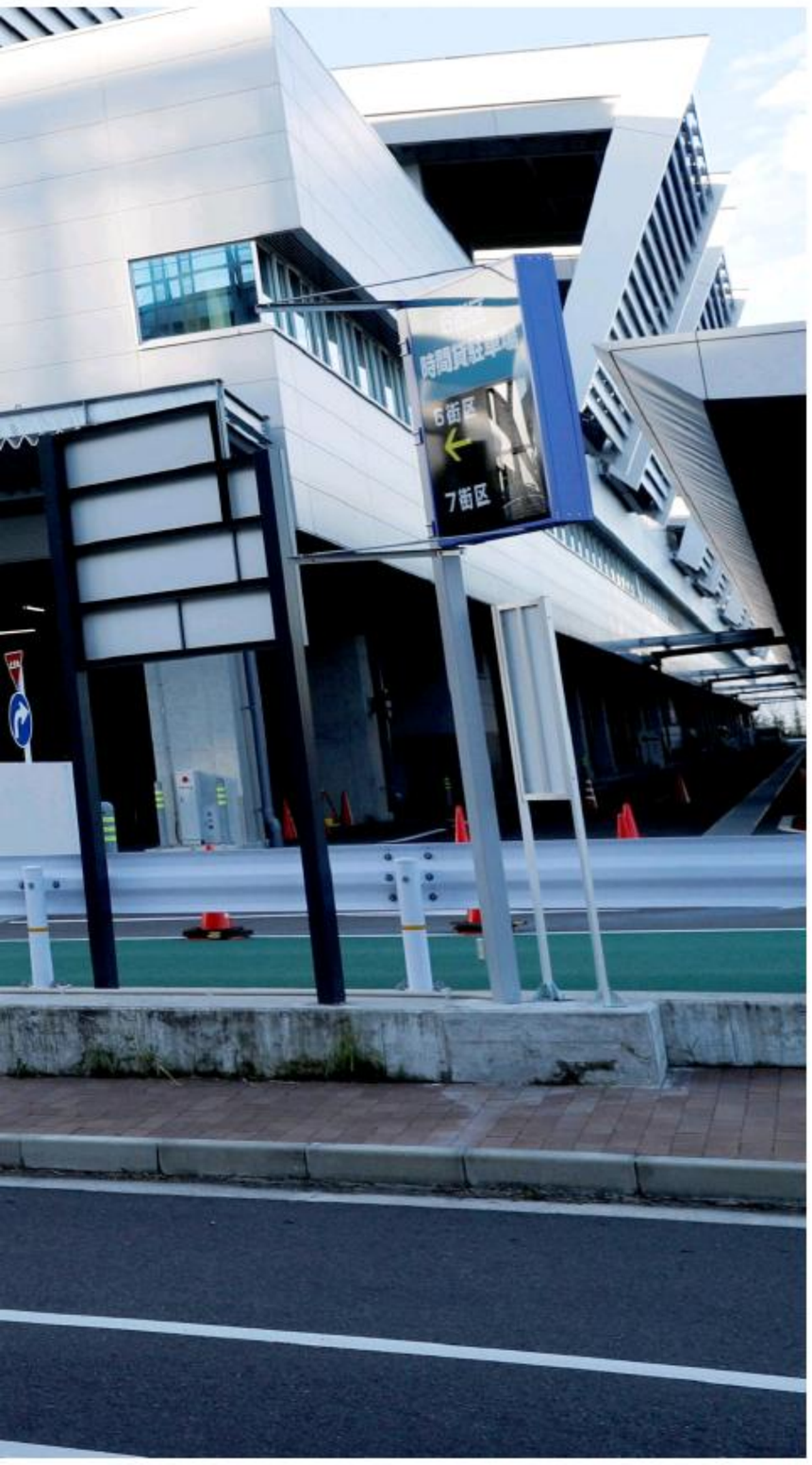
筑地市场虽然已经成了东京标志性的旅游景点和美食天堂，但从历史和本质上来说，它仍然是个批发市场。

日本海鲜最大批发市场

1927 年，日本从大正时代进入到昭和时代，靠近海边的筑地，被规划为一个鲜鱼交易和批发市场，到 1935 年逐渐形成规模。

从东京最繁华的银座，一路步行往东到东银座，之后再向海边走十几分钟，就到筑地了，骑车或者开车的话时间更短。正是因为靠海和距离市中心步行可达的双重位置优势，使筑地成了一个东京市民和游客都喜欢光顾的市场。

东京城内超市很多，三文鱼、乌贼



2018 年 10 月 7 日，在日本东京，一名工人在丰洲市场（原筑地市场）外拖运货物

等较普通的鱼很容易买到。但那些“季节限定”的鱼，比如每年 6 月才最肥美的飞鱼、鲹鱼，7 月进入成熟期的鲇鱼等等，由于对保存条件要求很高，就只能去筑地购买了。

所以，23 万平方米的筑地市场基本一年到头摩肩接踵，每天约有 4 万人进出，日营业额高达 16 亿日元。中国游客最喜欢看的“解鱼表演”，其实只是近百年来，东京鱼贩每天再普通不过的日常而已。

近年来，筑地市场不但是海鲜处理量全日本最大的批发市场，也是蔬果和其他各类食品的批发枢纽。在东京，这里的蔬果批发量仅次于大田市场，鸡肉、鸡蛋、腌菜和各种冷冻加工食品的处理量也非常可观。

它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在扩大规模、聚集人气和严格把控食物质量方面保持平衡，值得同样热爱批发市场的中国人学习和借鉴。

虽然东京都内共有 11 间中央批发市场，但筑地的规模之大，知名度之广，仍然首屈一指。

让东京人和全世界游客非常遗憾的是，由于筑地市场海鲜处理量不断扩大，市场设施已经跟不上发展，再加上靠近市中心被认为可能影响市容，运营了 83 年之久的筑地市场在一片争议声中于 2018 年 10 月被部分搬迁到设施更现代、距离市区更远的丰洲市场。

如今，筑地市场地名仍在，但往日的烟火气和热闹劲已经一去不复返。不过，它在扩大规模、聚集人气和严格把控食物质量方面保持平衡的做法，却值得同样热爱批发市场的中国人学习和借鉴。

行业自治和政府协调相结合

筑地市场的管理，主要靠行业协会的管理组织自治，并非政府——这些管理组织，在日本叫做“管理组合”。

最上面的是“筑地市场协会”，相当于“各组织中心联合会”，会长通常由筑地最大的管理组合的会长担任。在需要解决问题、推出新政策时会召集各个管理组织的代表开会。

再往下，筑地最大的批发商联合会是“中央鱼类会”，因此“中央鱼类会”会长通常也是“筑地市场协会”会长。

会长本人也是每天在批发市场上做生意的人，同时广受尊敬。作为内行人，在处理矛盾冲突和协调利益关系时，自然更加驾轻就熟。需要向政府争取政策时，也会特别卖力。通过行业自治和政府协调相结合的模式，筑地市场实现了井然有序，政府管理起来也比较轻松。

在“筑地市场协会”之下，还有各类的管理组合。比如水产方面有“东京都水产物批发者协会”、“批发企业联合会”、“东京鱼市场批发协同组合”，蔬果方面有“筑地市场青果联合事业协会”、“筑地本场青果批发协同组合”、“东京筑地市场青果中介批发协同组合”等等，各商贩可以自由加入。筑地最为繁荣的时候，大约有 596 家商贩参加了这些管理组合，保障自己的权益。

在这里，不用“拼死吃河豚”

“拼死吃河豚”是中国的一句老话。河豚味道鲜美，但处理起来要非常小心，有些河豚内脏剧毒，肉上粘上一点，就能要人命。河豚的种类还相当多，还有些河豚鱼皮也是有毒的。

筑地市场的河豚是日本一绝。一条两斤左右的河豚，去掉内脏和鱼头鱼皮后，在厨师手中被片成一块块透明的刺身，摆在一个比蒲扇还要大的盘子中，整个造型像是一朵平铺的菊花。用薄薄的河豚刺身蘸上一点略带芥末味的酱油，是最为新鲜美味的吃法。

筑地市场的另一绝，是运营 83 年中，从来没有因为吃河豚而出现食物中毒的问题。

普通食客并不知道的是，筑地市场内有个“河豚除毒所”——河豚需要在这里由专业持证人员彻底去除掉有毒部位之后，才能拿到料理店里去加工。

从河豚这个细节上，就能看出，看似杂乱无章的筑地市场，在食品安全管理上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人们才不用“拼死吃河豚”。而筑地市场的食品安全管理意识和机制，也正是来自于其历史上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

1954 年 3 月 1 日，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在比基尼岛附近进行打渔作

业时，正好遇到美军在那里进行氢弹核试验，结果 23 名船员受到了核辐射。3 月 15 日，该船捕捉的金枪鱼运到了筑地市场后，其中一些被检测出具有强烈放射性。

由于鱼已进入市场，且不知核污染和二次污染的影响范围到底有多大，筑地市场陷入一片混乱，所有水产品价格转眼暴跌，无人问津。

日本曾在 1945 年遭受了原子弹打击，对核污染的认识要比世界其他国家更为深刻。东京都政府于是立刻采取了强力手段，命令将有核污染可能的所有水产品全部就地深埋，并在该处标明“原爆金枪鱼之冢”，永久警示后人。

这个事件，也让筑地市场管理方痛定思痛，决定食品安全管理一定要“常抓不懈”，并重新恢复起筑地市场的人气。

2019 年 1 月 5 日，在日本东京的丰洲市场（原筑地市场），一名男子在拍卖会前检查整齐摆放的金枪鱼

“拍卖产业链”

去过筑地市场的人，一般都喜欢观摩甚至参与每天上演的拍卖。

筑地很多最新鲜的好鱼，都是可以拍卖竞价的。想参加拍卖的人，只需要戴上一顶写有自己号码的帽子，叫卖的时候，有意向的话用帽子或举手示意即可。如果没有其他人竞价，鱼就拍下来了。

面对面拍卖是筑地市场的传统、特色，也是卖点。这种略带紧张和刺激的气氛，会激发人的好胜心，不一会儿功夫一车鲜鱼或鲜果就拍卖完了。

小型拍卖会又会吸引来旁观的观光客和购物者。拍卖一结束，他们就会跟着拍下了好鱼的鱼老板，去他店里吃最新鲜的鱼料理。

“拍卖产业链”，正是筑地市场人气长盛不衰的法宝之一。

核污染事件后，为了吸引更多的商家入驻，筑地市场的管理方也动了很多脑筋。

首先是接入了火车线路、高速公路进出口，并开辟了面积巨大的停车场，保证什么时候来都能有停车位。

筑地本来就在海边，渔船可以很方便的停靠。但东京都人口众多，小渔船的供货满足不了市民的需要。火车线路和高速公路进出口接入后，日本主要渔港的货物可以通过火车和冷藏卡车直接运进来。这些基础设施的建成，也使得筑地可以轻松地把业务范围扩展到其他蔬菜鲜果，成为东京食品供应的中心枢纽之一。

有了鲜鱼、水果蔬菜和观光人气，筑地市场进一步吸引了各种相关产业的小商贩在周边开店，卖日本茶、瓷器、刀具、旅游纪念品和开小餐馆。筑地因此渐渐从批发市场发展成了一个地标景点和休闲中心，在东京的批发市场中一骑绝尘。■

2018 年 9 月 4 日，天津居民在大直沽菜市场内选购商品（李然 / 摄）

治理菜市场须打通政策梗阻

文 | 杜欢政　编辑覃柳笛

要改变菜市场脏乱差的现状，关键在于转变菜市场经营模式，把菜市场治理工作向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菜市场两度成为关注焦点，为公众敲响警钟。

长期以来，我国大型农贸市场以及中小菜市场（以下统一称菜市场）存在各种管理问题。我们认为，应继续深化城市菜市场治理改革，以优化监管政策、改变经营管理模式为抓手，改善全国各地尤其是超大城市菜市场的卫生条件和防疫标准，为公共卫生安全增加保障。

环境缘何“脏乱差”

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推动城市菜市场的改革。但目前，诸多菜市场依然在环境卫生、硬件设施、日常监管等方面，存在脏、乱、差等各种问题，给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埋下重大隐患。

调研发现，菜市场环境卫生问题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现有的摊贩经营模式无力维护菜市场卫生环境。当前，城市菜市场的主流模式为散户式经营，运营方将市场空间分

2018 年 9 月 11 日，个体工商户在浙江省东阳市东门菜场党群服务中心注册登记通办窗口办理相关事项

割后租给小菜摊，向其收取摊位费，并负责卫生保洁工作。在这种模式下，一方面租户混杂，维持公共卫生的社会责任意识淡漠；另一方面，多数小菜摊和菜市场经营者的管理水平都不高，尤其是小菜摊还面临房租、水电、税费等压力，对维护环境卫生“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是菜市场标准化建设缓慢，环境难以达标。2009 年以来，商务部、财政部等部门就开始部署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管理运行相对规范的标准化菜市场。这一类菜市场对选址、装修、排水、垃圾处理等均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但相关推进仍难以满足群众需要，为散、乱、脏、差的小菜市场留下了生存空间。对此，部分地区的监管单位出于民生考虑，默许小菜场的生存。这直接导致已建成的标准化菜市场被冷落，经营者陷入门可罗雀的窘境，有的甚至关门谢客。

三是菜市场净菜普及率低，以出售净菜为主的生鲜超市盈利状况不佳。净菜上市可以大大减少生鲜垃圾的倾倒，有利于维护菜市场的卫生。国内多个城市近年大力推广净菜上市，但目前我国净菜成本居高不下，价格高企，导致净菜“叫好不叫卖”，上市受阻。近年来，出售净菜的生鲜超市虽大批崛起，但在净菜成本难以降低的情况下，生鲜超市盈利状况不佳。

菜市场的卫生管理问题会带来多重负面影响，不仅关乎居民的购买体验，更影响到人们城市生活的幸福感，以及公共卫生状况。

一是传统农贸市场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人民消费需求的提升和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脏、乱、差的农贸市场，难以承载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数据显示，自 2014 年以来，农贸市场等传统渠道市场份额持续缓慢下滑，从 2014 年的 62.3% 下滑到 2019 年的 56.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环境整洁的生鲜超市门庭若市，网上订单“一单难求”，菜市场中年轻人的身影越来越少见。

二是农贸市场由于其环境问题以及客流过度集中，容易成为重大疫情传染源头。农贸市场本来就客流量巨大，加之其环境卫生状况不理想，极易成为病毒传播扩散的温床。

从这个方面来看，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疫情风险非常高——新发地市场占地 1680 亩，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 20 多倍；管理人员 1500 名，固定摊位 2000 个左右、定点客户 4000 多家。在全国 4600 多家农产品批发市场中，其交易量、交易额已连续十七年双居全国第一。

卫生治理有多难

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与菜市场相关的一系列政策存在不少局限，制约了菜市场的良性发展。

一是政策滞后。当前政策下，菜市

场无法完成从出租摊位到自主经营的业态升级，“标准化”菜场建设难以普及，卫生建设无从提起。根据目前商务部对菜市场的定义，菜市场是出租固定摊位售卖生鲜产品的经营场所，只租不售。因此，生鲜超市不算菜场。这一定义，可能阻挡了菜市场“超市化经营”的努力。在工商部门看来，超市型菜场只能算超市，不算菜场，这导致菜市场的公益性质全无，国家优惠政策难以享受。

二是用地困境。菜市场受限于商业用地的规定，租金昂贵，商户成本高企，难以顾及卫生环境。“菜篮子”虽属民生项目，但菜市场用地属性却是商业服务业用地，这导致菜场租金成本高企，菜价随之上涨，大量旧有菜场让位于写字楼、餐厅等其他业态。在城市中心地段，居民买菜难、买菜贵的问题尤为突出。

三是销售环节冗长。当前生鲜生产及销售链条规模化不足，净菜上市成本居高不下，导致净菜普及难。净菜贵，

“菜篮子”虽属民生项目，但菜市场用地属性却是商业服务业用地，这导致菜场租金成本高企，菜价随之上涨，大量旧有菜场让位于写字楼、餐厅等其他业态。

但卖菜人的收入却不高。

卖菜人收入不高，首先在于流通环节过多而挤占了利润，从田间地头到城市餐桌，生鲜辗转于多个批发商和零售商之手，使得产销两地产品差价较大，而当前生鲜零售终端毛利率普遍较低；其次，农产品生产上游环节多为“小农经济”，未能形成规模效应，导致农民至今“看天（行情）吃饭”，难以实现按订单生产的高效模式。上述因素导致生鲜市场效率低下，净菜难以普及。

四是监管挑战。多头监管权责不明，精细化管理程度低。一方面，“九龙治水”致使监管效力不佳。菜市场监管涉及农业、市场监管、商务、城管、环卫等多个部门，但各部门之间存在责权划分不清、责任主体不够明确等问题。另一方面，菜市场“合格”标准不够细化，环境干净整洁的软硬件指标不够明确。比如，国内许多城市都已开始探索垃圾分类，但菜市场垃圾分类丢弃程度仍然较低，也缺少规范的排污设施。

经营模式怎么转

要改变菜市场脏乱差的现状，关键在于转变菜市场经营模式，把菜市场治理工作向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推进。

一是修订当前政策，鼓励菜市场超市化经营，可考虑将菜市场用地属性改为公共性质，为菜市场的环境治理奠定政策基础。建议将菜市场的经营范围从出租摊位拓展至出租摊位和直售产品皆可，以此鼓励超市化经营的菜市场蓬勃发展，实现真正的菜市场业态升级。建议做好用地规划，从源头上降低菜市场的运营成本，为提升环境水平留出空间。“菜篮子”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其用地性质应是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而非商业用地。建议规划按照居民分布区域做好菜市场建设规划，将民生工程想在前头，避免后期改造或增建带来的额外成本。这两项举措将为菜市场的环境治理奠定必要的政策基础。

二是整合蔬菜生产销售的供应链环节，推广净菜，引入龙头企业，带动菜市场整洁有序发展。建议进一步整合农产品产出端和销售环节，实现农业基地化、零售连锁化，以此减少中间消耗，降低生鲜产品成本、尤其是净菜成本。建议政府探索通过 PPP 等模式，引入行业龙头企业与政府共同投资、经营、管理菜市场，加快标准化菜市场建设，推行净菜上市，重塑“干净、卫生、整洁、有序”的菜市场形象。

三是加强监管协同，实现菜市场的精细化管理。政府应进一步明确菜市场治理的监管主体，以及相关部门之间的权责配置，并加强监管部门与疾控部门的联动。各地方政府应把菜市场环境治理任务，纳入到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任务框架，明晰菜市场相关软硬件标准，细化菜市场废弃物处理流程，以精细化管理消除公共卫生隐患。

四是在一线城市打造若干“网红”菜市场，引领治理升级。干净整洁、独具特色的菜市场，可成为一座城市的靓丽名片。荷兰鹿特丹“拱形菜市场”，就是全球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地”。我国可借鉴相关经验，将菜市场建设纳入城市规划，在一线城市打造一批现代化的地标菜市场，在外形、功能、基础设施等方面精益求精，提升其文创和旅游价值。■

（作者系联合国环境署 – 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责任教授、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

卡萨帝：把塔尖当起点，开启生态布局

在 6 月 24 日启动的“为爱不凡 · 再创传奇”2020 卡萨帝思享荟精致艺术体验会上，卡萨帝现场发布了衣食住娱全场景高端生态解决方案，与用户、客户、专家一同见证全新的“卡萨帝起点”。

从 2016 年到 2020 年，卡萨帝经历了产品、品牌、场景、智慧的引领阶段。形成了“用户愿意买”“客户愿意卖”“行业愿意学”的卡萨帝现象。不过，卡萨帝并没有停留在这个阶段，而是跟随潜在用户需求的变化继续前行。

中怡康数据显示，2020 年在行业整体零售额下降且平均单价远超过行业的情况下，卡萨帝实现逆势增长：冰箱、空调高端份额超 40%，洗衣机份额也实现超 75%，酒柜 21 周占比 84.8%，电热水器“五一”期间份额攀升至 12.3%。

这些在外界看来代表成功的业绩，正促使卡萨帝迈向更高的追求：开始场景品牌、生态品牌的引领。海尔集团副总裁、首席体验官、中国区总经理李华刚表示：“卡萨帝的品牌思路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高端品牌，第二个是场景品牌，第三个是生态品牌。而今，卡萨帝正在努力发展第三个阶段。”

高端智慧成套方案连接生活

卡萨帝高端智慧成套方案以一致性、互联性、整体性、迭代性四大特性，给用户带来了卡萨帝的生活智慧：不止于家电的连接，更是连接生活。

走进卡萨帝打造的智慧客厅，“指挥家”空调正在吹出“定制风”，搭载的语音助手“小优”能与用户直接对话，它能识别各种语速和当地方言；臻藏 + 冰吧具有创新的“分享 + 私享”双域设计，无论朋友聚会

还是家庭精储的需求都能满足；“指挥家”电视M300通过远场语音和面部识别技术，实现无触控操作，舒适观影。

来到智慧厨房，物联网双屏冰箱、“指挥家”智慧厨电、固态制冷酒柜等一应俱全。物联网双屏冰箱读取用户身体数据后能提供了未来一周的健康饮食计划，堪称厨房内的“家庭健康管家”；打开固态制冷酒柜，“0振动”的储存效果让珍藏的葡萄酒保持最佳的口感；用“指挥家”厨电煲粥，只要点一下灶具的煮粥程序，灶具就能一键烹饪，程序结束自动切断火源气源；还可以远程预约TFT大屏电饭煲，语音“动口”就能做饭，百余菜谱触手可得；用餐结束后，用创新蒸汽洗的洗碗机深度清洁油污，厨房焕然一新。

在智慧卧室里，“指挥家”壁挂式空调智能调节风速、出风量、风向以及温度等，温冷感知及智能控制技术能带来最舒适的睡眠环境；馨享冰吧则带来母乳级储鲜体验，新鲜水果、饮品等随饮随取。

智慧阳台上的融合纤洗护理机能洗护矜贵面料，无论爱马仕丝巾、意大利进口羊绒成衣都不在话下；“指挥家”中央空调缔造了舒适空气体验，通过AI智能科技实现自联网、自适应和自节能，带来凉而不冷的吹风新体验。

在智慧浴室里，天沐PRO热水器营造了一个定制健康洁净空间。不仅能快速加热，还有深度学习功能，“记住”家庭成员的洗浴习惯。

重新诠释衣食住娱

如果说之前的产品、品牌到方案和智慧的引领都为“卡萨帝现象”提供了土壤，那么，卡萨帝目前已成长壮大，并基于海尔智家体验云平台实现了平台引领，已经有足够的实力撑起全场景高端生态方案的“倒金字塔”结构。

卡萨帝高端生活倒金字塔，从衣、食、住、娱四维度诠释高端生活方式进阶。在此结构下，舒适住居、健康饮食、智慧护理、娱乐互联全场景生态解决方案覆盖用户生活的方方面面。

舒适住居生态：提供全屋用水解决方案，打开热水器随时有温度适宜的热水；空调满足微风体验，并提供健康生态软风，睡觉时空调主动调整至睡眠模式。

健康饮食生态：冰箱担任整个厨房的智慧“大脑”，管理用户健康的同时，还指挥成套厨电主动启动，灶具主动控温控火、吸油烟机主动开启。

智慧护理生态：“空气洗”可以护理高端衣物，晾衣架能自动晾晒，衣帽间能搭配服装。

娱乐互联生态：用钻石影院提供智能影音，同时在厨房时能听歌，在浴室能追剧。

“今天的卡萨帝除了研究产品，还研究厨房、住居空间，研究整个相关连的服务体系。所以卡萨帝不仅实现了人和机器连接、机器和机器连接。还实现了用户操控机器、机器可以主动为用户服务，不需要用户多花一分钱，卡萨帝所有家电能实现升级。”在解释卡萨帝衣食住娱全场景高端生态方案时，李华刚如是说。

引领行业未来

那么，为什么卡萨帝没有继续在已经成功的道路上走下去，而是重新开辟一个新赛道？重新开始打造生态品牌呢？这些都源于智家体验云平台。

李华刚说：“传统企业或商业模式想发展、壮大总是非常艰难，其核心就是因为没有平台作为依靠，所以留不住用户。而今天卡萨帝拥有自己的平台，能提供全方位的家居解决方案，并在方案、技术、体系和模式四大维度实现引领。”

做高端品牌时，卡萨帝以价值颠覆了价格；做场景品牌时，卡萨帝以场景取代了产品；到了生态品牌阶段，卡萨帝用生态覆盖了行业。因此，从根本上说，卡萨帝品牌通过智家体验云平台的支撑，总是能站在前瞻的视角上看待未来的发展，从而能做到行业引领，这就是“卡萨帝现象”，也只有持续优化自己，提升自己，才能持续领先，这也是为什么已经站在金字塔塔尖的卡萨帝，却又开始了场景品牌与生态品牌建设的原因——这也恰好是卡萨帝在未来保持领先的起点。■

广州知识城蓄势待发

——专访广州市委常委、黄埔区委书记周亚伟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顾佳赟　编辑金明大

在主战场中新广州知识城，66个项目同日按下“启动键”。

以重大项目牵引，于变局中开新局。

5 月 28 日，在全国两会期间，广州开发区、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共同举办 142 个重大项目集中动工活动，项目总投资高达 1842 亿元。在主战场中新广州知识城（以下简称“知识城”），66 个项目同日按下“启动键”。知识城科教创新城、大科学装置区、中试和应用推广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园）、医疗器械和中医药装备制造园等重大平台同时启动。

新引擎密集发动，新动能喷薄而出。

中新广州知识城预计两年内迎来项目建成投产爆发期，产值超过 3000 亿元，累计注册企业 1803 家，注册资本 1508.1 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421.5 亿元；在建 40 公里风雨连廊，在建 8 条轨道交通、5 条高速公路、7 条城市快速路，打造 30 分钟通达机场、火车站、港口，1 小时连接大湾区主要城市的交通圈……在疫情之下一季度经济依然实现逆势增长，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3%；1–5 月限上商贸业商品销售总额同比增长 11.49%，规上工业产值同比增长 30.71%；1–4 月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6.47%；1–4 月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 125%。

知识城地处广州市几何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湾顶”，距广州中心城区 35 公里。十年前的阡陌田舍，何以蝶变为如今的中新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创新载体、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核心创新平台？从 8.08 平方公里起步，如何撬动 178 平方公里规划范围的知识经济变革，开启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骐骥之跃”？就这些问题，本刊近日专访了广州市委常委、黄埔区委书记、广州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周亚伟。

位于广州知识城南起步区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广东中心（李剑锋 / 摄）

我们要以“知识经济”为创新模式，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主导，以“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为支撑，做出一个广东省经济转型的样板，一个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科技战略的重要平台。

肩负多重国家使命

《瞭望东方周刊》：中新广州知识城有许多定位：中国－新加坡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纲要》明确重点建设的“科技创新重大载体”、大湾区唯一国家级国际合作平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知识中心以及科研成果创新转化与知识创造示范区等等。怎样理解知识城的多重定位以及肩负的重要使命？

周亚伟：历经 10 年开发建设，知识城厚积薄发、破茧蝶变。2018 年，中新广州知识城上升为中国－新加坡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其多重定位实际上包含五方面意义：建设知识经济新高地，启动创新发展新引擎，共铸国际合作新典范，树立营商环境新标杆，打造城市治理新样板。

简而言之，我们要以“知识经济”为创新模式，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主导，以“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为支撑，做出一个广东省经济转型的样板，一个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科技战略的重要平台。

打好知识产权这张牌

《瞭望东方周刊》：知识城是全国唯一的经国务院批准的“知识产权改革试验田”。5 月 28 日动工的项目涵盖重大平台、产业及科技创新，民生、基础配套等多个类别，与这次集中动工的盛大、密集、多元相比，去年 9 月 27 日动工的项目更偏于知识产权“专业”性，尤其是能吸引集聚国内外优质产权服务资源的广东省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中心等。在知识城建设与项目布局中，涉及知识产权保护与综合运用的项目尤其多，除了基建与平台这些硬件，知识城怎样软硬结合，集中精力打好知识产权这张牌？

周亚伟：2016 年 7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中新广州知识城开展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综合改革试验。

4 年后的今天，知识城在知识产权体制机制创新、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创新、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以科技孵化器为支撑的知识产权创造、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合作创新等五方面重点领域已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中新广州知识城”模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列为第一批知识产权强省建设试点和典型案例。

比如，我们出台了全国首个知识产权专项政策，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创新载体和“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核心创新平台，知识城是全国唯一实现“专利、商标、版权”统一管理的园区和知识产权保护元素最集中的区域。

在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方面，出台《黄埔区广州开发区推进粤港澳知识产权互认互通办法（试行）》，首开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互认政策先河，实现港澳及新加坡奖励补贴及资格认定等享内地同等待遇。中新知识产权服务公司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认证，成为广州市仅有的两家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单位之一。

在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方面，“兴业圆融——广州开发区专利许可资产支持计划”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转让，标志着全国首支纯专利权的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成功发布。

我们还在努力打造知识产权保护样板区、知识产权运营业发展先行区、知识产权引领型产业高端发展示范区和知识产权制度创新实践探索区。

有一个数据很说明问题，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反映企业创新能力、市场覆盖率以及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进行全球专利布局的重要途径，开发区的“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756 件、“发明专利授权量”2803 件，指标排名处于领先地位。

呵护营商环境这双眼

《瞭望东方周刊》：知识城的发展要围绕知识产权建设各类服务机构，解决好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人才创新的关系。知识产权保护生态建设是知识城目前重点打造的营商环境品牌之一，我们知道新加坡有着世界领先的营商环境，知识城借助中新合作国家级平台，在营造营商环境方面有哪些特殊的作为？

周亚伟：2018 年，我区成为广东省首个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实验区，广东省政府下放 11 项省级行政职权、支持开展 17 项改革创新事项，并将下放给广东自贸试验区的省级授权事项全部下放给知识城。2019 年因引进 GE 荣获联合国“2019 年度全球杰出投资促进机构大奖”，成为唯一获此奖项的中国机构。

百济神州加速创新中国抗癌药

新加坡有着世界领先的综合竞争力和商业环境。知识城借助中新合作平台，从政策理念和技术支持两方面借鉴新加坡经验，探索和新加坡在仲裁机制、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率先对接高标准国际营商环境规则，打造全国最优、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成为企业和人才离成功最近的地方。

描绘创新经济图卷

《瞭望东方周刊》：2019 年 9 月 20 日，粤芯 12 英寸晶圆项目在中新广州知识城投产，标志着广州先进制造业“缺芯”成为历史。7 天后，百济神州广州生物药生产基地一期项目竣工。随着这两年大批重大项目相继动工和投试产，知识城的产业链变得更为丰富完整。在知识城的产业版图上，哪些项目是重中之重，知识城的产业链建设又将对大湾区发展发挥怎样的作用？

周亚伟：知识城处在产业链“微笑曲线”的左上端，也就是研发端，参与的是全球性竞争，知识城对湾区发展的引领正是通过产业链的区域合作来实现的。近年来引进落地创维、巨轮、诺诚健华等重大项目 165 个，目前在建企业投资项目 79 个，预计达产产值超过 3000 亿元。

最为引人瞩目的是生物医药的发展，百济神州等项目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带动了诺诚健华、赛默飞、绿叶、恒瑞、龙沙等 30 多个生物医药枢纽型项目在广州开发区聚集，总投资超 200 亿元，预计总营收近千亿元。

受到广泛关注的粤芯芯片项目是广东省唯一一条量产的 12 英寸晶圆生产线，也是知识城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的标志性项目。

龙头项目落地带来集聚效应，目前已有 80 家集成电路企业链企业前来考察，32 家企业注册落地，集“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终端应用”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生态圈已经形成。

如今，广州知识城正在高标准推进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价值创新园区建设，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园、高端装备制造创新园、国际生物医药创新园、新能源新材料及智能芯片园区。

打出人才政策2.0版

《瞭望东方周刊》：人才是第一资源，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集聚、培养一批高尖端产业人才队伍，是在产业竞争中获得主动权和占领制高点的重要保障。打造知识经济高地，知识城怎样吸引人才？

周亚伟：首先是在布局上集聚高端科研资源，打造科教创新区。

合作共建的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致力建成为集技术创新与研发、成果孵化与应用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

在知识城中部区域规划建设科教创新城，面积 2 平方公里，计划引入 13 所科研院所，成为高科技人才培育、高

校科技研发和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地。各科研院所将密集发力，在知识城打造集聚硕博研究生及博士后等高端人才逾7000名，科研人员、教职工逾2000名的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高地。

2017年以来，黄埔区、广州开发区相继推出促进产业发展的四个“黄金10条”扶持政策以及人才和知识产权两个“美玉10条”扶持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金镶玉”政策体系，覆盖引资引才引智的各个层面，形成领跑全国的制度优势。

2019年5月，黄埔区、广州开发区颁布了《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人才住房建设和使用办法》，配合“金镶玉”系列政策。

2020年5月，黄埔区重磅出台人才和知识产权两个“美玉10条”2.0版政策，政策覆盖面更广，扶持力度更大，兑现更为便利，有效激发区域创新创业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为知识城聚集人才大开方便之门。

构建知识驱动型创新城区

《瞭望东方周刊》：5月28日集中动工的项目中，位于知识城核心区的何棠下村旧改项目尤为引人瞩目。何棠下村将借鉴新加坡等世界领先的规划理念，设计中新知识城中央商务区的高端服务配套核心，通过多元业态综合开发，打造“城市更新项目标杆”。以产兴城，以城促产，知识经济驱动城区的转型升级，知识城走的是一条怎样的产城融合之路？

周亚伟：知识城已成为广州东部最耀眼的区域之一。我们的产城融合绝不仅仅是大拆大建、造地标高楼，而是要汇聚高端产业与人才，打造一座经济、人文与生态高度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的城市。高新产业的聚集，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带动了创业创新人才的涌入，进而推动城市基础建设的密集式提升。科技厂区鳞次栉比，商务大楼拔地而起，现代化小区密集亮相，教育医疗日益国际

通过“全球化融资”和“全球化融智”，知识城要成为全球化和国家战略互动的实践者和引领者，不仅是广州市高质量发展的典范，而且是整个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范，轨道连通大湾区，由此推动知识城格局全面提升。

同时，知识城走的是全新的绿色造城之路。我们在打造区域特色的海绵城市发展体系，以总年径流控制率83%问鼎华南最高标准。高标准谋划智慧城市顶层规划，目前已建的200余栋建筑均获得绿色建筑专业认证。

面向未来，知识城强化“新基建”国际基因，推进国家级区块链顶级节点等一批国际“新基建”项目，在全国率先建设国际数字枢纽运营中心，推动国际互联网根服务器镜像节点、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顶级节点落地。一个新的数字经济先行区、智慧城市样板呼之欲出。

一座生产、生态、生活深度融合的新城正在崛起。同时，知识城的建设是放在黄埔区、广州开发区的大棋大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将全力推动“四区四中心”联动发展和“一区一园”建设的“4+2”发展格局，即构建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城、黄埔港、广州国际生物岛“四区四中心”与穗港智造特别合作区、穗港科技合作园“一区一园”的建设，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当中。

打造高质量发展典范

《瞭望东方周刊》：穗港澳航线启用后，搭乘直升机，从黄埔区、广州开发区飞往香港、澳门只需半小时。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目前的硬联通与软联通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

周亚伟：穗港澳航线可谓知识城联通大湾区的一个缩影。未来在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将有直升机的机场和出入境口岸，可以直接在市区坐直升机到香港、澳门的市区。

凭借连接香港、澳门的水上航线和空中航线，以及日益完善的陆地交通，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将形成穗港澳“海陆空”全方位交通枢纽对接，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5小时经济圈”。

除了硬联通，软联通也在持续发力。知识城正在成为黄埔区、广州开发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核心枢纽的一个样本。

2019年下半年以来，多份政策文件落实了知识城未来发展的内容与方向，并提出知识城进一步对接港澳、扩大对外开放的要求。

在广东省《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提出支持和推动知识城建设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及智能芯片和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综合孵化园等价值创新园。

下一步我们将复制推广知识城腾飞科技园经验，高标准建设清华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基地等合作平台，设立国家知识产权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运营平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交易中心。

在上一轮总体规划基础上，知识城创新开展《中新广州知识城总体发展规划(2020–2035年)》编制工作。《规划》已通过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审议，上报国家商务部，争取国务院批复印发。

通过“全球化融资”和“全球化融智”，知识城要成为全球化和国家战略互动的实践者和引领者，不仅是广州市高质量发展的典范，而且是整个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2015 年 12 月 15 日凌晨，双子座流星雨划过北京故宫西北角楼的夜空

夜经济不是全城亮灯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万宏蕾　编辑顾佳赟

2000年前后，杭州用数以万计的灯把整个西湖北岸的宝石山都照亮了，灯光一打亮，鸟全飞走了。这项照明工程上马一个星期左右，当地市民就在附近看到虫子噼里啪啦从树上掉下来。

“可供游览的城市内江两岸往往有多年累积下来的照明设计，传统手法是高层民用建筑的顶部结构照亮，大多金黄色，即所谓‘戴帽工程’。”中国照明产业学院学术委员会、厦门市照明学会秘书长江海洋说，“如今，大家对这些略显沉重的色温已经审美疲劳，甚至觉得岸上建筑照明，那些线性灯勾勒以及点光源闪烁成了破坏环境美的杀手。”

2005 年，原建设部组织开展了《城市照明规划规范》的编制工作。受限于当时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规范》几经修改，未能颁布。2010 年后，中国城市照明建设逐步进入井喷式发展，

在丰富公众夜间生活、带动夜间经济增长、促进城市照明行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此同时，脱离实际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引发的过度建设、光污染、城市夜间风貌同质化等问题日益突显。

2020 年 6 月 1 日，旨在规范和加强城市照明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的全过程管控的中国《城市照明建设规划标准》CJJ/T307–2019（以下简称“标准”）正式颁布执行。这一标准将为城市照明建设规划带来什么新风向？未来如何引领城市照明健康发展？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照明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梁峥认为，如何以新理念下的照明修补城市夜生态、引导城市夜生活、促进城市夜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当下必须重视的问题。

“烧山”吓跑鸟

“2000 年前后，杭州用数以万计的灯把整个西湖北岸的宝石山都照亮了，灯光一打亮，鸟全飞走了。这项照明工程上马一个星期左右，当地市民就在附近看到虫子噼里啪啦从树上掉下来。”中辰照明集团设计总监齐洪海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大家才知道，这种照明方式有非常严重的生态问题，我们管这种照明叫‘烧山’”。

“烧山”设计在新世纪初期并不鲜见，“这一时期的城市照明追求视觉刺激，以亮为美，以艳丽、闪烁为美，可以说此后十几年间，城市照明一直处于粗放自由的高速扩展阶段，低端雷同过剩、高端价值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中国照明学会照明系统建设运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徐建平说。

2018 年底，中国照明学会在《关于通过积极引导和行业自律促进城市景观照明核心有序发展》的报告里指出了行业存在的“三大问题”：超水平建设、不注重生态环保、同质化严重。

江海洋说，之前许多城市在处理市政照明规划时讲究“宏观叙事”，甚至“权威叙事”，政府决策者考虑的是大气魄、大手笔、大投资，一次性以短平快手段解决城市夜景工程，可谓简单粗暴。

采取灯具影藏、避免眩光、去除无观看视点的照明等手段，实现“见光不见灯”“生态友好”“用光于人”，最终将“将星空还给城市”。

2019年12月2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整治“景观亮化工程”过度化等“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问题的通知》。这对习惯高能耗、光污染的旧城市照明理念造成重大冲击。

梁峥分析说，以往“亮化工程”背景下的城市照明建设，通常以景观照明为中心，忽视各类公共空间（如人行步道、地下通道、人行天桥、背街小巷、露天停车场等）的功能照明建设。事实上，不同城市空间、同一空间的不同时段都存在差异化的夜间活动需求，单一模式的城市照明状态，不利于分时段差异化的夜景氛围营造，也不利于城市照明的节能控制。

回归“理性”

“这两年，城市照明建设出现理性回归的趋向。”梁峥说。

最新发布的《标准》突破了原来单一规划层面的管控，转变为涵盖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各阶段的全过程管控，明确了城市照明建设规划的三个阶段，即城市照明总体设计、重点地区照明规划设计及城市照明建设实施，要求各阶段间保持一致性与延续性。

《标准》为城市照明建设规划带来了许多新风向。

首先，对城市进行“四区划定”（暗夜保护区、限制建设区、适度建设区及优先建设区），分区提出限制性要求。比如在生态保护区，要保持城市暗天空，而在具备较高景观价值或有大量公众活动需求，以商业、娱乐、文体等功能为主的城市空间，在保障功能照明基础上，优先安排景观照明建设。

以深圳为例，深圳湾不仅有大片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更是 10 万候鸟南迁过冬途中一个重要站点。这样的背景下，几年前梁峥团队就提出对深圳照明进行“局部改进”及“做减法”的设计，如灯具影藏、避免眩光、去除无观看视点照明等手段，实现“见光不见灯”“生态友好”“用光于人”，最终“将星空还给城市”。

“也就是说，这一区域除了必须的功能照明，其他景观照明一律不做。在后来 2018 年深圳新的大规模市政建设中，深圳还是保持下来没有进行过度照明，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梁峥说。

其次，城市照明回归功能需求。

梁峥分析，伴随城市照明建设由粗放向精细化发展转变，城市照明应在丰富夜间活动、提升公众夜间体验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文旅夜游经济”并非“夜游亮化经济”，“全域旅游”并非“全城亮灯”，上海现代建筑环境研究所所长杨赟认为，用光彩工程来开拓旅游线路是一种方法，但勿滥用。

比如，城市生活界面包含居民小区、菜市场、临街商业、社区公园等，小区内有微缩水系、景观植被、绿化廊道、慢步跑道等，生活界面的光应与公共界面的光作区分，后者热闹、故事性强、文化载体丰富，前者则要体现安静、温馨、归属感。

城市灯光还要做出自己的风格。比如，“上海北外滩景观照明改造的特别

之处在于，除了满足功能照明，还能配合黄浦江夜游和重大事件灯光演艺的需求。”杨赟说。

实现“共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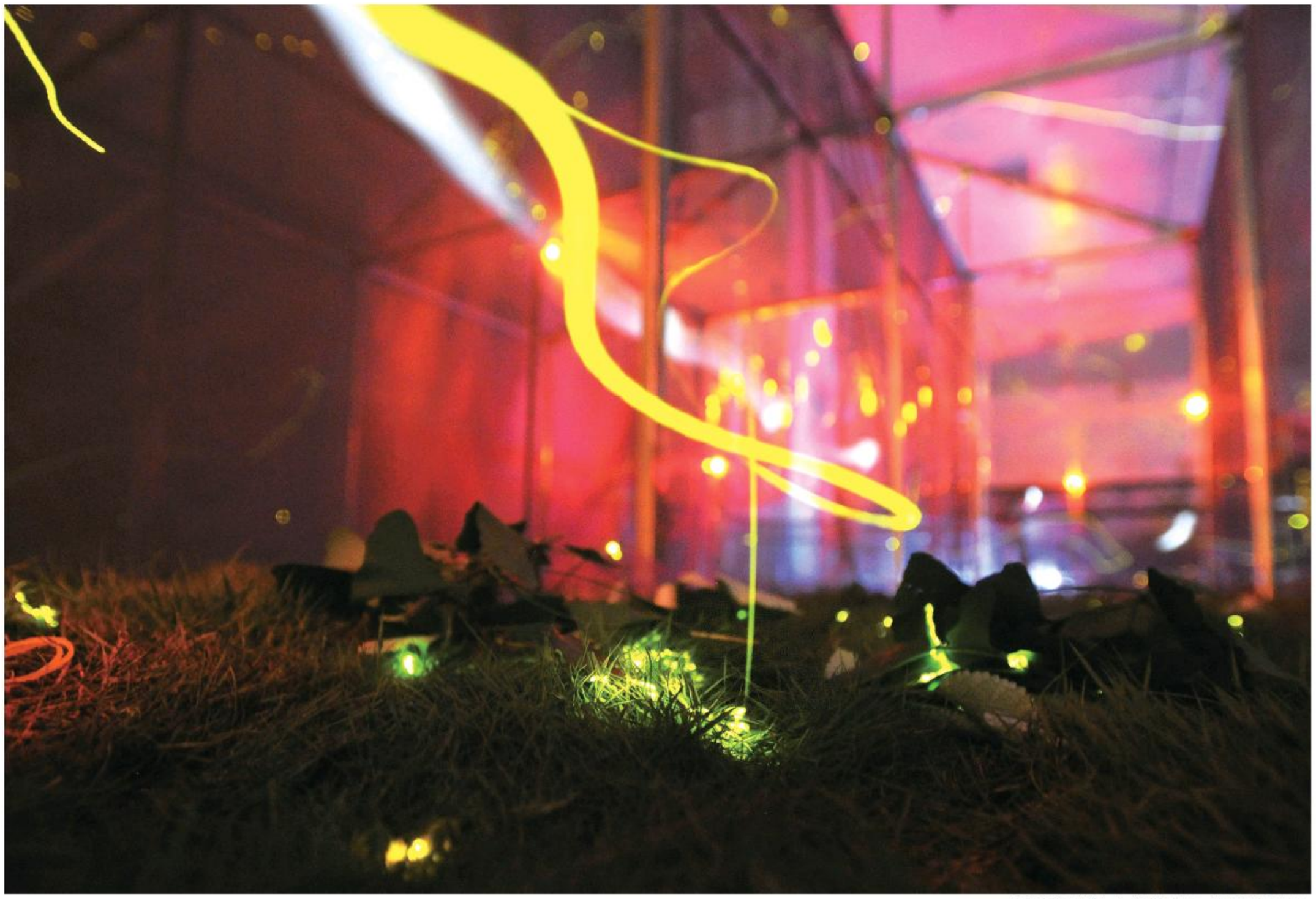
目前，照明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设备得到迅速的推广和应用，建筑多媒体的普遍流行、各种灯光秀的快速发展，激光、无人机等新颖的灯光表演方式，互动式、智慧型景观照明和智慧灯杆的爆发式增长等，不断刷新着人们对城市照明的传统认识。

“但无论采用何种新技术，城市照明规划的本质是对城市夜间环境形态做出的合理组织，是城市美学在夜晚中的体现，这就要求我们要把各种城市景观元素协调、有机地组合在一起，进行统一规划，形成功能合理、和谐优美的夜景画面。”梁峥说。

“一定要以人为本”，江海洋举例分析，比如车行和人行两种不同的观察视角：车行观察的主要视角为正前方的建筑纵深，建筑顶部是否连绵，侧重点为远距离照明景色，这样的视角重点要做好建筑的明暗过渡、重点商业的气氛打造，交通路口的导引标示灯光。人行视角观察的重点是街道两旁的景观灯具、道路照度均匀度、商业业态、主要建筑出入口、灯光雕塑、景墙、植被等，这样的视角重点要做好建筑底部、街道路面的照明质量，提升空间的局部趣味性和感召力，让城市细节更丰富、更生动。

许多城市的照明理念已经在悄然转变。杭州目前执行的《杭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办法》，既规定了哪些地方需要安装功能照明或景观照明，也明确要守住“黑天空保护区”。目前西湖西部群山地区和超山风景区，已经实现“无条件禁止亮灯”。

究竟什么样的城市照明是最好的？哈工大（深圳）建筑学院副教授杨彪认为，“好的照明就是感觉不到照明，但是我愿意带着孩子经常去那里玩儿。”也就是说，只有以每个城市特有的人文、地域特色为基础，统筹好夜景布局、亮度、色温、动态照明、彩光应用、光污染控制等涉及城市照明品质的全方位因素，才能建立行之有效的照明体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与城“共生”的城市照明。■



武汉室内萤火虫主题公园内拍摄的萤火虫

深圳（毛思倩/摄）

谁是资本活力最强城市？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融雪　编辑顾佳赟

上市公司是城市经济的风向标。

研究一个城市的竞争力，不妨先研究其拥有的上市公司情况。

“上市公司是城市经济的风向标。”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冯奎近日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一个城市上市公司的数据，信息价值高、透明度高、关注度高，这个小切口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城市的资本活力，进而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潜力。”

聚焦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上海交通大学课题组近期发布了《中国城市资本活力指数报告（2019）》。报告显示，北京、上海、深圳仍然是中国城市资本活力最强的城市，但杭州、苏州、泉州等地的发力赶超，使全国城市资本竞争力版图已有变局。

资本活力是关键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综合的、系统的概念，它是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能力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生产能力、居民生活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环境质量等。因此，单纯用一个指标很难反映城市的整体状态和水平，必须建构一个指标体系。”冯奎说。

据介绍，为科学评估城市竞争力，世界经济论坛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围绕政府、开放程度、法律制度、金融、技术、管理、劳动和基础设施等八大要素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以需求条件、生产要素、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表现、企业结构、战略和政府作用、竞争对手以及机遇等六大因素为核心对城市展开评估。

在国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也建立了一套体系，重点考察资本、人力、科技、政府管理、基础设施等要素。

“过于庞杂而又内生的评价指标体系没有侧重，难以体现出各城市发展潜力的独特之处。”活力指数报告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称，上海交通大学课题组的城市资

2018年全国城市资本活力前十强

	上市公司数量	上市公司总市值（万亿元）	城市MB	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家/每百万人）	人均上市公司市值（万元/人）
深圳	373	8.73	1.82	93.14	218.03
杭州	159	3.93	1.91	21.60	53.37
上海	416	6.02	1.47	28.69	41.49
苏州	119	0.79	1.89	17.55	11.71
北京	533	19.01	1.25	39.11	139.51
广州	145	1.53	1.64	16.66	17.61
无锡	101	0.58	1.82	20.77	11.86
武汉	69	0.61	1.86	8.27	7.27
南京	106	1.01	1.33	15.99	15.18
宁波	85	0.75	1.60	14.38	12.67

数据来源：Compustat、WIND、同花顺、交易所、统计年鉴等公开数据　　设计 / 开开

本活力评价体系基于资本的研究视角，在强调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时，构建了“三个分项指数、五个指标”的资本活力评估体系。

所谓三个分项指数、五个指标组，分别是规模指数，由上市公司数量和上市公司市值两个指标组成；效率指数，由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和人均上市公司市值两个指标组成；结构指数一个指标，为上市公司产业新兴度，由该城市各上市公司所在行业 MB（行业总市值除以行业净资产总和）的市值加权平均值衡量。

在具体的算法上，三个分项指数——规模指数、效率指数和结构指数的权重分别是 50%、25% 和 25%。其中，上市公司数量和上市公司市值在规模指数中各占 1/3 和 2/3 的权重，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和人均上市公司市值在效率指数中各占 1/3 和 2/3 的权重。最后，对规模指数、效率指数和结构指数的排名进行加权求和，产生各城市资本活力指数的总得分。

“我们采用重点突出的方式简化了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和其他指数相比，指标更简洁、数据更可靠。”课题组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夏立军说。

深圳综合第一

中国哪个城市最受资本青睐？

“北京、上海和深圳一直名列前茅。2001 年至 2018 年间，北上深的资本规模排名始终保持在前三名，资本效率的排名也始终保持在前四名。”夏立军说。

其中，北京作为央企“根据地”，2018 年末上市公司数量达 533 家，总市值突破 19 万亿元，在资本规模指标上排名第一。

上海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上市公司数量为 416 家，总市值超过 6 万亿元。

深圳作为创业创新城市的代表，上市公司数量亦近 400 家，总市值则超过上海，达到 8.7 万亿元。

在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和人均上市公司市值的两项排名中，深圳以“每百万人 93.14 家”和“每人 218.03 万元”均列全国第一，北京则以“每百万人 39.11 家”和“每人 139.51 万元”均居全国第二。

不过，在产业新兴度的计算排名中，深圳和北京拉开了差距。深圳的城市 MB 单项排名全国第六，北京单项排名全国第 20。

“MB 能反映资本市场对于企业未来发展潜力的看好程度。通常，国家重点发展的新兴行业 MB 值更高，如信息技术、医疗保健、消费类行业等。”陈宪表示，一个地区行业 MB 均值能够一定程度反映该地区的产业结构中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占比，也反映了地区经济的成长潜力，是判断地区未来经济增长是否有足够动力及营商环境是否能够吸引和培育朝阳产业的一个重要体现。

夏立军说：“在产业结构方面，深圳形成了估值较高的信息技术行业为主、金融行业为辅、其他行业多元发展的结构特点。北京形成了金融行业绝对主导、其他传统行业多元发展、估值较高的新兴行业占比较小的结构特点。而上海则形成了金融行业、消费类行业和传统工业齐头并进的产业结构特点。”

杭州、苏州、泉州等地的发力赶超，使全国城市资本竞争力版图已有变局。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Bank of China Investment Management
本栏目由中银基金协办

产业发展方向上的差异，导致了“深圳产业新兴度最高、上海居中”的局面。因此，深圳的资本活力综合排名反超北京，拿下了全国第一。

后来居上的不只是深圳，杭州和苏州的综合排名也十分亮眼。综合排名榜上，杭州超过了上海，位居第二，苏州则紧随上海，领先于北京。

冯奎分析认为：“杭州的资本活力发展虽晚于深圳，但阿里巴巴的上市为杭州的资本活力排名提升贡献了显著的力量。”截至2018年末，杭州有上市公司约160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达3.9万亿元。

而苏州，2001年至2018年，18年里上市公司数量增长了13倍，年均增速达17.2%。“源源不断的新上市公司为苏州晋级注入了强劲动力。”冯奎据此分析：城市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就是小气候与森林的关系，小气候是森林成长的环境，同时森林能促进与改善小气候。

“南强北弱”明显

按照上海交通大学课题组的评估，苏州的城市资本活力综合指数进步为全国第二，全国进步最快的城市是泉州。

“作为福建省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泉州不仅有安踏体育、达利食品、恒安国际等传统消费类行业，还发展出了火炬电子、南威软件等信息技术产业。”夏立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泉州的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增长达20.6%，排名全国第一，产业新兴度排名在经济总量前20位的城市中也位列首位。

有城市进步，就有城市落后。

根据活力指数报告，在经济总量前20位的城市中，南京、天津、重庆、青岛和西安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有所下降；副省级城市中，武汉、南京、沈阳、哈尔滨和长春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明显下降。

以南京为例，该城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在18年间增长为2.4倍，尤其是近年来的增长速度落后于领先城市，上市公司总市值增长也相对较慢，致使南京的资本规模排名有所下降。

排除掉副省级城市后，从地级市层面看，城市资本活力综合指标排名前十强中，南方的地级市占据了九个席位，分别是苏州、泉州、佛山、无锡、珠海、绍兴、福州、长沙和湖州，北方城市只有呼和浩特。

从产业结构来看，南京虽然金融行业发展迅猛，但估值较高的信息技术等产业发展不快，这亦导致该城市的产业新兴度排名有所下降。

“上市后备力量缺乏和已上市公司发展较慢，是排名下降城市共同面临的瓶颈；新兴行业发展空间有限，也限制着它们产业新兴度指标排名的提升。”夏立军指出，除此之外，城市资本活力“南强北弱”的形势也值得关注。

排除掉副省级城市后，从地级市层面看，城市资本活力综合指标排名前十强中，南方的地级市占据了九个席位，分别是苏州、泉州、佛山、无锡、珠海、绍兴、福州、长沙和湖州，北方城市只有呼和浩特。

县域经济层面，“南强北弱”的现象依然存在。

无论是上市公司资本规模、资本效率、产业结构三个分指标排名，还是综合指标排名，福建省、浙江省和江苏省的县域皆占据了前30名的大部分席位。

尤其是在综合指标排名前十中，南方沿海占据了九个席位，分别是晋江、余姚、德清、新昌、江阴、新兴、惠安、仁怀和昆山，北方仍然只有一个，土默特左旗。

冯奎对本刊记者表示，这本报告所讲的资本，概念用得是比较“窄”的。他认为，城市应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统统考虑在内，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主动促进金融业开放，用资本的力量推动城市活力提升。

冯奎认为，更加体系化、科学化的城市资本活力指数，不仅可为城市管理者提供竞争力分析工具，也可为投资者了解城市发展现状提供重要参考。■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遗爱湖公园，苏东坡纪念馆前的苏东坡塑像

黄冈有诗

文 | 罗米　编辑覃柳笛

黄州的地理条件并不优越，多山多丘陵，所以能在这里安顿生息的人们，向来都有一点苦中作乐的洒脱，连被贬到此的文人，都沾染了这样的气息。

提到黄冈，大家一想到它的“特产”——将军和练习册，往往会敬畏有加，倒是很难把它与文化联系起来。

但一唤它的旧称“黄州”，关于它的文化记忆或许在一瞬间就复苏了。

其实，黄州不仅是苏东坡留下传世诗词之地，早在唐代就是荆楚科举鼎盛之地，这里还是黄梅戏的家乡、共和国将军的摇篮。这片能文能武的土地，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

不止盛产将军和考题

提到黄冈，不同时代的人大概会有不同的反应。

上世纪 60 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会想到这里在共和国革命史上的辉煌——黄冈是威名赫赫的将军摇篮，仅红安一县便产生了 223 名将军。

“70 后”“80 后”则多半会想到鼎盛一时的黄冈中学，在他们求学的年代，黄冈中学无论在高考状元榜还是国际奥赛的金牌榜上都风头无两，成为全国教学考试的权威标杆和“胜地”。

再往后的人，对黄冈的感受就变

得愈加直观了——书包里总有一个“黄冈”在等候——总是难逃《黄冈小状元练习册》或者《黄冈秘卷》的“困扰”。这当然是黄冈中学名气爆响之后的“余韵”。

不过，在人们通常的印象里，一个盛产将军的革命老区往往意味着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文化多半也相对贫瘠，而教辅则容易让人联想到题海战术，这种机械重复的训练方式与充满创造性的文化似乎也沾不上边。

其实，在刻板印象之下，黄冈是一个真正留名于文学史上的地方。故事要从北宋讲起。

东坡化茧之地

大约 1000 年前的北宋，由于一个倒霉的官员被贬于此，黄州从此就成为中华文化里一个重要的地标——这个落难的倒霉人是苏轼。

在弟弟苏辙和朋友们不惜代价的解救下，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一个毫无实权的职务，相当于被软禁。对于苏轼来说，这是他仕途生涯受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

黄州环境比较艰苦，加上俸禄微薄，所以他不得不亲自在城东开荒躬耕，“东坡”这个名号正源于此。更大的打击来自精神上——因言获罪又被严密监视的他，起初几乎不能出声。

但神奇的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打击并没有让他委顿下去，反而促使他实现了脱胎换骨的转变：他的文字和思想，都最终成熟、定型，来时忧闷压抑，走时却达观豪迈。这固然取决于他的性格，但外部的环境不可能不发挥作用。黄州到底有什么样的玄机？

来黄州的第三年，是个关键时刻。

这一年的寒食节，苏轼面对冷锅冷灶和凄风苦雨，留下了《黄州寒食帖》。

这一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当然是因为书法潇洒恣肆，但帖子的内容却让人不忍卒读：“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

明代的吴承恩曾在黄州的荆王府供职，此间他的《西游记》陆续成文，真不知唐僧师徒历经的九九八十一难里，有多少黄州的影子。

对于生性豪迈的苏轼来说，这几乎是他留下的最抑郁的文字。

不过，黄州就在那里，一直为他默默地提供着滚滚江水，巍巍赤壁，朗朗明月，徐徐清风。终于，在这一年秋天，苏东坡登临赤壁，留下了三篇传颂千古的诗文——一篇《念奴娇·赤壁怀古》，两篇《赤壁赋》。

从此，前半生的苏轼，蝶变成了苏东坡。

在赤壁，他悟透了人生、世界、宇宙，过去、现在、将来；接下来，他留给黄州的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何等超脱、机智又充满深情。

这何尝不是黄州的精神气质？

黄州的地理条件并不优越，多山多丘陵，所以能在这里安顿生息的人们，向来都有一点苦中作乐的洒脱，连被贬到此的文人，都沾染了这样的气息，留下的作品竟然都乐观放达。

在苏轼之前，宋代的大文人王禹偁也曾被贬于此，他在名篇《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记述了自己如何从雨打竹楼中听出了瀑布、碎玉之声，在竹楼里送夕阳、迎素月，甚至赞之为“谪居之胜概”；在苏轼之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同样被贬黄州，仿佛这里倒是个胜地了。

特别的人和事

人们总以为黄州是沾了苏东坡的光，才得以声名鹊起，这其实是更大的误会。

自唐代起，黄州就是荆楚科甲鼎盛之地，每到考期，这里便会聚集数以万计的考生、送考家人和书童，甚至还形成了一条“考棚街”，街上有客栈、饭馆、文房日杂店铺，完全是一条龙的完备服务。

据统计，科举时代，黄州共产生过文武进士 953 人，难怪苏轼初到黄州时，大家对如此闻名天下的大才子有点见惯不怪。不过，这里的人们到底是爱才惜才的，所以大家对他有了诚挚的尊敬和周到的保护，让他在这里过得很平顺。

如果搜索一下黄州名人，估计你会被那长长的名单惊到，这里历代名人辈出，声名如雷贯耳。不过，这些生于黄州的人似乎倒不如客居于此的人，留下的传奇更多。

只需略举几例，黄州的风采便生动具体起来。唐代禅宗的六祖慧能，当年便是在黄州留下那一首顿悟的偈子，并从这里传承了禅宗的衣钵。明代的吴承恩曾在黄州的荆王府供职，此间他的《西游记》陆续成文，真不知唐僧师徒历经的九九八十一难里，有多少黄州的影子；小说家冯梦龙的《三言》里，那些市井故事里自然少不了取材自黄州的日常。

还有更接地气的。

黄冈境内一直流行着多种地方传统剧种，汉剧、楚剧、采茶戏、被窝戏、花鼓戏等等，当然还有最著名的黄梅戏，这些咿咿呀呀的唱腔从古传到今，这里始终闪动着美妙的身段，萦回着美妙的声音。■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艺术推广人）

开封铁塔夕照

水城开封

文丨荆方　编辑黄琳

开封老辈人认为，如果想要孩子强壮、有护佑，就要认午朝门的石狮子为干亲。

如今说开封是一座水城，恐怕会有很多人反对。但从历史看，开封城蚀骨的爱恨情仇，都是随波而来、逐浪而去。

河南境内有天然湖泊八个，开封市占了四个。隋唐之际打通了贯穿五大水系的大运河，更是开启了汴梁城的绝世繁华。

四通八达的水系，不但形成温润的气候环境和丰富的生态、物产，水流还带来充足的商品和顺畅的信息，这是开封被历代帝王选为都城的重要原因。

龙亭湖：照见开封五千年

开封湖泊、河汊虽多，但是四十年前开封市区能称得上湖的地方，只有龙亭湖。那时候市区其他水源不是叫“坑”，就是叫河，“湖”这个风景意味浓郁的称号，只有龙亭湖担当得起。

龙亭湖是一个综合的风景区，约定俗成的入口是从午朝门广场开始，也就是现在的龙亭景区售票处。四十年前那里并没有售票处和围墙，只有一对石狮子镇守街口。

石狮子虽然暴眼巨头、脚爪粗壮，却并不威严，肥胖的脚爪被摸得溜光水滑，大圆脑袋顶也被顽皮的孩子攀摸过无数遍，泛着青光，远看好似一个谢顶的中年大叔。据考证，这对石狮子是宋代留下的文物。它们是一公一母，除了镇守龙亭湖，石狮子夫妇俩还是很多开封孩子的干爹和干娘。开封老辈人认为，如果想要孩子强壮、有护佑，就要认午朝门的石狮子为干亲。

过了石狮子是一条直通龙亭的甬道，甬道的两边就是著名的潘杨二湖，合称龙亭湖。沿岸两侧是两排垂柳，一

直延伸到龙亭下。

三十年前的龙亭非常突兀，在一片荒地上拔地而起一座七八层楼高的建筑，顺着十五级青石台阶到真武殿，再顺着四十多级青石台阶到达顶层的黄色琉璃瓦的宽阔大殿。大殿周围环绕着宽阔的游廊和成排的朱漆大柱，颇似皇帝指点江山、俯瞰子民的地点。不过那时候龙亭四周十分荒凉，只有青草地和荡漾的湖水。现在围绕龙亭主体建筑，复建了大门、偏殿和花园，恢复了它明清初建的功能——庆典台。

三十年前每个春天的周末，龙亭和潘杨湖周围是市民们踏青放风筝的首选，开封人习惯称这两个湖为潘杨湖而不是龙亭湖，因为开封盛行一个传说：潘杨湖分别是北宋大臣潘美和杨继业的府邸，而高高在上的龙亭，则是天子的金銮宝殿，它被左右二位大臣拱卫。

这个听上去子虚乌有的传说，在上世纪 80 年代却被从一个侧面神奇佐证了。80 年代一次清淤工程里，潘家湖的湖底发现了大量屋脊，经考证，是明代周王府所在地。随着挖掘深入，又发现龙亭大殿和潘杨二湖的地下，有着不同朝代的建筑遗址，按顺序分别是唐宣武军衙署、五代后梁的建昌宫、后晋后汉和后周的大宁宫，直到北宋皇宫、金代皇宫和明代的周王府。

一片小小的湖泊，竟然像一个显微镜，照见了开封上下五千年。

开封城下有七层

开封的历史几乎就是中华民族的缩影，历经灾难和重建。从春秋魏惠王建都城开始，先后有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等八个王朝都城的荣耀和繁华，却又忍受了每个王朝覆灭的血雨腥风，除此之外，黄河水患造成的天灾，也一直是开封城的黑暗故事。

开封一带的黄河，落差小，水流慢，沉积的泥沙不断抬高河床，慢慢形成“悬河”——河底比开封城的地面高出十几米。这就像悬在开封头顶的利剑，时刻闪着凌厉的寒光。史料记载，仅仅从 1194 年到 1938 年七百多年间，黄河在开封境内决口三百多次，开封城四次遭受灭顶之灾，最凶猛的一次大水淹没全城，只有铁塔塔尖露出水面。

从 1194 年到 1938 年七百多年间，黄河在开封境内决口三百多次，开封城四次遭受灭顶之灾，最凶猛的一次大水淹没全城。

每次大水退去，留下半城淤泥，将往日生活悉数埋葬。

开封城的考古数据显示，战国时期魏国建筑距离今天地表 12 ~ 14 米，隋唐距今天地表 10 ~ 12 米，北宋距今天地表 8 ~ 10 米，元距今天地表 7 米，明距地表 5 ~ 6 米，清距地表 3 ~ 4 米。开封至今流传一个民谣：开封城，城摞城，开封城下有七层。

一层层的黄土下是毁灭和黑暗，一层层的黄土上是重建和辉煌。而几乎每一次重建都在同样地址，同样位置，上千年的光阴里，这座城市不断湮灭又不断被复刻，沉默的倔强里蕴藏着惊人的爆发力和抗争精神。

州桥：真的有过一座桥

以龙亭也就是北宋皇宫遗址为中心，一路向南，这条街就是御街，它是古代开封城的南北中轴线。如今这条街依然健在，依然是开封的主干道，叫中山路。沿着中山路往南走一公里，就到了另一个著名所在——州桥。

州桥始建于唐代，那时候叫汴州桥，因为它横跨汴河而建。当时，开封城市内有包括汴河在内的四条大河纵横穿过，州桥是汴河上的十三座桥之一，也是最精致的桥。

它北连御街，东邻相国寺，地处繁华，位置显赫。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州桥“其柱皆青石为之，石梁石笋楯栏，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镌海马水兽飞云之状。桥下密排石柱，盖车驾御路也。州桥之北岸御路，东西两阙，楼观对耸。”

位于当时世界最繁华商业区的州桥，它在史料里留下很多影子。《水浒传》里，落魄好汉杨志出卖自家宝刀，就在州桥上。

北宋诗人梅尧臣的《十三日雷后晚过天汉桥堤上行》，这样吟咏州桥：“堤上残风雪，桥边盛酒楼。据鞍衰意尽，倚槛艳歌留。海月开金鉴，河冰卧玉虬。当年洛阳醉，偏忆董糟丘”。天汉桥就是州桥。在冬夜的冷月清辉中，诗人对这座城市的忘情和迷醉，围绕州桥缓缓流淌。

这座优雅的盛世之桥，曾是故国失地的锥心之桥。南宋诗人范成大诗云：“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直白的叙述隐藏着对家园的热爱和伤感、对君王的期盼和失望。

而现在的州桥，只是坐落于中山路上的一块石碑，石碑所辖的一片地方，叫州桥。开封城如今早已没有了发达的河流，也没有了风光旖旎的几十座古桥。州桥仅仅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存在于开封市民的心里。

现在跟州桥所链接的关键词，是一家卖胡辣汤的小馆子——州桥胡辣汤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它是开封一景。胡辣汤馆的位置就在州桥石碑的正对面。

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封城市改造，在州桥胡辣汤馆一带挖出一条暗河，也发现了青石砌成的桥体。这时候大部分开封人才知道，这里真的有过一座桥。在暗河的周围还挖掘出洗衣服的铜盆，以及捶衣服的木制棒槌。

水滋养了古老汴州的生灵，塑造这个城市雍容的底色。历史已逐浪而去，未来仍将踏浪而来。■

考试季三大“法宝”

每一次重大考试，也是对家庭关系的一次检验。

张驰
北京交通大学心理素质教育中心副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科普专家，中央电视台《心理访谈》科普心理专家。

临近暑假，意味着又一次考试季节来临。近期收到很多考生和家长咨询如何调整状态应对考试等问题。

家长和孩子其实是一个共同体，考生的状态其实和家庭状态有很大关系。以高考为例，我们不妨先思考几个问题：高考是什么？它对自己、对自己的父母意味着什么？简单地讲，它就是一场考试，是一次对自己学习成果的检验。

它更是一次对心理的考验，因此我们从心理上做好应对之策，这不只是针对高考而言，也是应对我们将来各种大考的“法宝”。

首先我们要“矫正”自己对重大考试的认知。

有三种“偏见”，即对重大考试的不合理认知，可能会对我们产生负面影响。第一种是绝对化心理——“必须考好”，这种认知心理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压力。第二种是以偏概全——“考差就会完蛋”的心理，这会预先引发许多焦虑情绪。第三是将问题灾难化——“考试失败会引发一系列人生难题”。

压力并不是一件坏事，它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压力会使人的状态松散懈怠，适当的压力催人进步，使人紧张，会让我们用更好的状态面对工作学习。因此家长和孩子们在考前有压力是很正常的，但是要学会衡量自己的压力值。

太过紧张太过松散都不是好的状态，压力过大的时候，要释放压力，调整自己的状态，转移注意力，调整呼吸。

第二大法宝是情绪、情感状态的调整。举个例子，当大家在复习过程中，碰到不会的题时，千万不要紧张，一定要有“加分原则”，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此刻碰到不会做的题，把它搞懂是让自己进步的很好的方式，而不是快考试前发现不会的题目从而产生焦虑情绪。学习的时候，如果感觉到情绪或者状态不好，就暂停一会儿，活动一下身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考试的时候如果紧张，同样可以调整呼吸。

第三大法宝是意志。包括高考在内的任何一次重大考试都是对意志品质的一次检验，我们要学会用意志力，应对生活中出现的不确定性因素。

对孩子们来说，可以试试以下这个小技巧：考试之前，建议用手在桌子上写四个字——“稳操胜券”。这个准备活动既可以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同时可以转移注意力，让自己快速平静下来，专注面对考试。

每一次重大的考试，也是对家庭关系的一次检验。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良好关系是关键所在。孩子面临的每一次重大考试，家长都需要自己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在考试前，家长一定要提醒自己：不添乱，不去打乱孩子的节奏，要意识到自己和孩子是统一战线，而不是对立面。

关注、力量和希望，这是家长们需要掌握的三个“武器”，这不仅适用于应对孩子的每一次重大考试，也是维护家庭关系和家庭教育的长久之计，是守望孩子成长的三大原则。

关注，即家长要对孩子无条件积极关注，给予孩子支持，而不是“考得好我才爱你”的错误方式。

力量，指的是家长要给予孩子力量。家长心理是否有力量？家长给予孩子的信心和支持，是否足以支撑孩子面对挑战，是否能让孩子对未来充满希望？

希望，家长对孩子要满怀信心，让孩子对未来有希望，有期待，这样孩子才有力量前行，有力量成长。

在我们的一生中，面临着大大小小无数次考试，对孩子更是如此，但恒定不变的认知只有一点：任何一次考试都不是结束，而是一次新起点。用平常心去面对、去体会考试，一定会收获好的结果。■（编辑黄琳）

说塔

唐宋以后，塔作为各地的地标，是冶游的必去之所。

龚巨平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宋、明考古学研究及江苏区域文明。

塔是从古印度传入中国的一种建筑形式，在历史长河中，逐渐与中国传统木构楼阁相结合，得以创新发展，并遍及华夏各地。

在古印度佛教中，塔被称作“窣堵波”，或作“窣堵坡”，是梵文 Stupa 的音译，简称为“兜婆”或“塔婆”，主要用于供奉和安置佛祖及圣僧的遗骨、经文和法物。

根据佛教经典的记载，塔的样式在释迦牟尼传法的时代已有固定形制，一般下为方形塔基，上起覆钵圆丘，圆丘的顶部安置槃盖和相轮，周围还设有栏楯。作为佛教的一种建筑形式，塔是佛教意识形态的一种物质体现，是佛教文化的纪念碑。

我国古代常称佛塔为“浮屠”“浮图”“浮屠祠”。“浮屠”是梵语佛陀的音译。史载东汉明帝夜梦身高丈六、通体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以为佛，遂派人往西域求法，请来摄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于是在洛阳建造浮图精舍，供僧人居住。

三国时西域康居国沙门康僧会于东吴赤乌十年（公元 247 年）由交趾到南京弘传佛法，吴主孙权为其立塔建寺，因为是江南第一座寺院，称为“建初寺”，并以“佛陀里”作为塔寺所在里巷的名称。

汉代和三国时期佛塔的形制，已无地面实物可考，但在出土文物中依然可以窥见当时的面貌。

2008 年在湖北襄阳一处汉代至三国时期的墓地中出土了一件黄褐釉陶楼。陶楼由门楼、墙院和两层楼阁组成，形成长方形单进院落。与一般陶楼不同的是，陶楼顶上设有七重相轮和新月形塔刹。研究表明这座陶楼是一件受到古印度佛塔建筑影响，具有特殊功能的明器，体现出佛教初传时期古印度文化因素与汉文化传统杂揉的特点。

在孙吴统治区域内，孙吴—西晋时期常见一种特殊堆塑罐，罐体上部亦层叠堆塑楼阁，罐体腹部和口沿贴塑佛像，这种堆塑罐从功能上被称为魂瓶，亦被视为佛教初传时的糅合佛教文化的重要见证物。

2006 年在南京胡村发掘了一座南朝砖室墓，墓室后壁用花纹砖砌筑出三座凸出的、呈品字形排列的塔形结构。这是南朝时期建康地区佛教文化因素在墓葬中的反映。

楼阁式塔的出现，改变了古印度实心塔身的结构，内部中空，由此可借楼梯登上塔顶，俯瞰周边山川形胜。洛阳著名的北魏永宁寺塔，刚一建好，建塔大功德主胡太后亲自登上九层浮图，宣示皇家威仪。

唐宋以后，塔作为各地的地标，是冶游的必去之所，凡有登临，必加咏颂。唐代长安大慈恩寺的大雁塔，是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当时参加科举的学子，都要到大雁塔游览，登高极目，畅意抒怀，考中进士的学子塔下题名纪念。“雁塔题名”也成为著名的关中八景之一。

供奉和安置在佛塔内的佛祖及圣僧的遗骨（舍利）、经文和法物，在佛教经典中都可称为舍利，故佛塔一般有多被称为舍利塔。舍利一般埋藏在地下专门砌筑的地宫内。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发现、并得到不同程度清理的舍利塔地宫已达 80 余座。其建造年代上自北魏，下迄明清，涵盖了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按照佛教仪轨，地宫内一般以多重箱函和金棺银椁、琉璃瓶来密藏舍利。2008 年在南京发掘的北宋长干寺塔塔基地宫内出土有佛顶骨舍利、诸圣舍利、感应舍利以及大量供奉的遗物。舍利的安置，“内用金棺，周以银椁，并七宝造成阿育王塔”，外用铁函、石函层层套装，深埋于地下。其中七宝阿育王塔，通高 117 厘米、最大边长 45 厘米。塔体以檀香木制作骨架，表面为银皮，通体鎏金，并凿有 452 个圆孔以镶嵌宝石。

长干寺七宝阿育王塔是国内地宫内出土的最大佛塔，被誉为“塔王”，其造型精美丰赡的，是宋代手工制造的集大成之作；塔内发现的文物，种类之繁多，保存之完好，堪称是 20 世纪 80 年代陕西法门寺地宫之后又一座震惊世界的佛教艺术宝库。■（编辑黄琳）

疫情让西方人爱上播客

文｜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　　编辑｜戴闻名　　插画｜刘俊

居家隔离期间，“全家一起听播客”成为了新的西方家庭娱乐方式。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暴发导致新闻业面临新的困境，特别是广告投放的延后和放缓，使得新闻机构的广告收入出现明显下滑。不过，处在动荡和不安中的新闻业，却也不乏新的增长亮点。

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在今年 6 月发布了《2020 数字新闻报告》，全面调查了疫情之中全球数字新闻的发展和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西方国家听“播客”（即可以在线收听、下载和付费订阅的音频节目）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年轻人。

在路透新闻研究院自 2018 年开始跟踪调研的 20 个主要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大部分欧洲国家）中，习惯收听播客的人在受访者中所占的平均比例已经增加到了 31%。居家隔离期间，“全家一起听播客”成为了新的西方家庭娱乐方式。

更重要的是，播客听众进一步趋于年轻化——年轻人越来越习惯于通过手机或戴着耳机收听播客节目。

在英国，收听播客的人有一半在 35 岁以下，而收听传统电台节目的人，年龄大多在 50 岁以上。这个趋势已经引起西方新闻业运营者的关注，传统新闻渠道想要影响 35 岁以下的年轻族群现在已经非常困难。

从节目内容来看，新闻类和政治类播客节目最受欢迎。在美国，约有一半的播客听众经常收听新闻类播客节目，因为播客可以帮助他们“更深入理解复杂问题”，“拥有更广泛的视角”。

新闻类播客节目最受 25–34 岁人群（即西方所说的“千禧一代”）的欢迎，更年轻的 18–24 岁人群则是生活方式类播客、名人播客和罪案类播客的重度消费者。

播客的运营生态也在发生变化。在西方国家，最早运营播客的是苹果平台。但在过去的 18 个月里，另一家平台 Spotify 上升势头明显。他们投资了 5 亿多美元，一方面制作高质量的原创播客节目，一方面与人气播主签下独家协议，目前节目数量和听众人数都在大幅增长。

电视业和广播业巨头也砸下大量投资制作自己的播客平台。英国广播公司（BBC）推出了原创播客平台 BBC Sounds，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播客平台叫 ABC Listen，美国最大的广播网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也做出了 NPR One。

过去数年中，播客也日益成为平面媒体打造品牌影响力的重要战场。

《纽约时报》的日更新闻类播客“The Daily”每天有 200 万人收听，广告收入可观而且还在不断增长。英国《卫报》、挪威《晚邮报》（Aftenposten）和法国《回声报》（Les Echos）也成功地推出了自己的日更新闻播客。

除了获取广告收入以外，播客节目还可以为平面媒体吸引新的读者，并提高其忠诚度和参与度，可谓一举多得。■

读懂“中国式收入”

文丨关田刚司（日本）　编辑丨戴闻名　插画丨刘俊

中国人有一样日本和西方没有的“隐形收入”——就是家庭和社会纽带的互助。

我在上世纪 90 年代来到中国工作生活，30 多年来，几乎走遍了中国的东西南北，从一二线大城市到刚脱贫和未脱贫的边远地区。在共享住宿还未出现的年代里，我就睡过老乡家的床，和他们喝过酒，被他们纯朴乐观的心态所打动。

这些旅行中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我得以亲眼见证了普通中国人因为国家的崛起发展，收入和生活质量不断增长的“小确幸”。

数年前，我的一位上海籍女同事嫁给了来自贵州安顺的大学同学。一开始，女方的父母是不赞成这门亲事的，后来虽然因为女儿坚持勉强答应，但心里始终还是不太乐意。

小两口回安顺摆酒的时候，我作为证婚人也去凑了个热闹。没想到，却碰上了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热闹场面。新郎是村子里第一个考到上海的大学生，又娶回了一个上海媳妇，村支书于是亲自带着乡亲们前来道贺。我印象中，至少来了好几百人，灯笼高挂，酒菜丰盛，觥筹交错。

席间我跟村民们聊了聊。安顺曾经是贫困地区，现在不但脱了贫，而且是“黔中经济区”的新兴工业城市，还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著名的黄果树瀑布，所以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经相当不错，而且跟发达大城市相比，发展潜力巨大。

女方父母此行之后也改变了看法。他们告诉我，之前小看了贵州——虽然发展程度与上海还有很大差距，但由于生活成本相对较低，日子又有“奔头”，当地人的可支配收入和幸福感其实并不输上海。

同样是乡村，日本农民至少在生活成本上就要远超过中国。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日本政府发放给每位国民 10 万日元补贴，约合 6500 元人民币。这听起来不错，但在日本其实也只够买 100 斤好大米（新潟的越光米一斤要65元人民币）而已。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还有一样日本和西方没有的“隐形收入”——就是家庭和社会纽带的互助。

我的另一位朋友来自重庆郊区，在上海打工，家里距离重庆市区有 100 多公里，不算是富裕地区。去年她回老家结婚时，每月退休金不到 1000 元的外公，居然给了她一个 2 万元的大红包。

她很吃惊，问外公，钱是哪里来的？外公笑着说，一是平时小辈们给的零花钱没舍得用存起来的，二是平时在外面帮朋友做零工攒的。

这样感人的故事在中国比比皆是，在日本和西方却很难想象——发达西方社会里，就算父母能这样做的也不多，更别说除了基本退休金并无收入的外公了。

中国社会仍然保有整个家庭团结一致赡养老人和扶助子女的东方优良传统，这是中国独特的国情，也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保持稳定的“压舱石”。在我看来，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式收入”和中国社会。■

（作者为企业高管，现居上海）

母亲怀孕让父亲变了

文 | 张燕　编辑黄琳

既当爹，又当妈，哪有那么容易？

刚刚过去的父亲节像是单纯为了平衡而设立的“工具节”：没有太多预热、没朋友圈的刷屏，甚至商家都没有推出鲜花或者蛋糕之类的促销。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有人认为父亲角色的消费价值较低，不值得商家兴师动众去造节，还有人认为，从怀孕到成长，父亲的投入度和存在感都不如母亲，因此父亲节的热度不如母亲节是理所应当的。

为了生孩子，女性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明显的生理变化，而最新的研究表明，父亲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不小的改变。

变化的不只是体重

说起孩子出生给男性带来的最大变化，那一定是体重增加。不少男性会和怀孕生产的妻子一起变胖，之后又和孩子一起增重，而且膨胀的步伐很坚定。女性在生孩子之后腰围会变大，男性同样如此，而缺席产后恢复班的男性，其变胖的过程几乎是不可逆的。

体重秤直观地揭示男性在生孩子前后的变化，但内在的变化影响更大。比如男性升级为爹后，其大脑会发生变化。研究显示，大脑中，专注计划和解决问题的区域活动会增加，同时提供照护和躲避危险的区域活动也更活跃。

这些大脑区域活动增加，表明男性在成为父亲后，行为更加小心谨慎了，这一变化会让父亲更称职。比如，父亲带着孩子出门的时候，走在路上会随时注意车辆，警惕万一有车冲上人行道等意外情况发生，他们把以前用来打量异性的注意力，用在了更好地保护孩子上。除了随时警惕危险之外，这些大脑区域活动增加还让男性更敏感，更容易产生移情作用。一个之前情感较冷漠的人，在成为父亲之后，会变得柔软甚至敏感，比如受不了看到其他孩子遭受不幸的新闻。

除了大脑活动外，孩子的孕育还会改变男性的荷尔蒙分泌。睾酮在男性寻找伴侣的时候发挥作用，提高了竞争的欲望。但是当他们和孩子在一起后，研究发现，其体内的睾酮分泌减少，这让男性从身体上做好了父亲角色的准备。睾酮少的男性对孩子感受更灵敏，让他们变得更有耐心，能够更好地照顾孩子。实验发现，如果一群男性听到婴儿的哭声，睾酮高的男人很快会觉得烦躁，而睾酮含量低的男人则开始担心孩子，后者会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

高量的睾酮会阻挡多巴胺的正面效应，而多巴胺对提升亲子关系有帮助，使得在拥抱孩子、和孩子玩耍的时候心里会萌生愉悦的感觉。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做了父亲之后，男性更享受和孩子一起玩耍的过程，因为他们的睾酮减少，反而激发多巴胺发挥更大的作用。

产假调节心态

当爹给男性留下的健康印记，除了更专注、更有同情心和责任感外，荷尔蒙的变化也导致一些意料之外的负面影响，比如容易沮丧。

一般来说，睾酮能保护情绪低落，所以

睾酮减少，父亲们有可能产生沮丧的感觉。这种心理不适的情况容易发生在新手爸爸身上，而针对这种情况，有个简单易行的应对方式：休产假。

虽说产假几乎是女性的专属假期，母亲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可以在这个时间里得到较好的恢复。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让父亲休产假也能改善男性的生理和心理情况，同时对母亲的康复也更有利。

英国的研究发现，父亲享受的男性陪产假与母亲生产后 3 个月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而在法国，研究表明男性陪产假意味着父亲可以抽出更多时间照料婴儿，大大降低母亲患上产后抑郁症的风险。

瑞典的研究则表明，父亲每休一个月的陪产假，母亲未来的年收入就会增加近 7%。两性收入差距的缩小已经帮助瑞典成为全世界两性公平度第四高的国家，这一标准的主要考量指标包括劳动参与度、教育、健康和政治权利等。

英国和美国的研究都表明，父亲在新生儿出生期间获得的假期，和他们对育儿活动的参与度有着极大的相关性。例如获得正式假期的英国父亲换尿布的比例增加 25%，半夜起来喂食 8 至 12 个月婴儿的比例也增加 19%。与通常认为的这些琐事会让父亲抓狂不同，更高的参与度让父亲存在感更强，从而有效消弭其沮丧的情绪。■

为了生孩子，女性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明显的生理变化，而最新的研究表明，父亲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不小的改变。

水石清华朱家角

文 | 钟惠娟　编辑黄琳

每日清晨5点，茶楼最先拉开古镇的晨幕。

江南水乡，水为生命之源。流过晨曦、落日、乡间、田野、街坊、城市，淌过乡音、柴米油盐，始终无法忘却的是水石清华——朱家角。

千年古镇朱家角，为上海首推的江南水乡名镇，地处江、浙、沪交界处，是长三角一体化重要市镇。

历史的河

据史料记载，早在 1700 年前的三国，朱家角原是一个小村落,叫朱家村。先民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捕鱼而生。

这里属于吴越地带。在宋朝时它还是一个小集镇，水路便捷；至明代万历年间，正式建镇，名珠街阁又称珠溪；清嘉庆年间将珠里定为镇名，俗称角里；明清以来，这里已商贾云集、灯火万家，为繁华集镇。

如今沿着古镇市河漕港河行走，漕港穿镇而过，流经青浦城区，北上汇入苏州河。漕港河把镇分成两片，北岸井亭港，南岸北大街，犹如此岸与彼岸。两岸有老街、旧弄堂，曲径通幽，石板路逶迤不断。街长三里多,挂着匾额的酒肆、茶楼、店铺，千余家。

古镇茶楼尤其多，每日清晨 5 点，茶楼最先拉开古镇的晨幕。

南岸的“江南第一茶楼”，清时建造，全部采用木结构，有“百口衙门”的俗称。茶楼临河的百米长廊上，常有评弹演出。

北岸的“阿婆茶楼”距今已有 150 多年的历史，为明清建筑。登楼远眺，三面环水，东眺放生桥，西望小淀山；又同时是上海翰林匾额博物馆的展馆，藏有明清状元匾、民国要员匾、家族堂号匾，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匾额。

出门过石桥往南走是“水乐堂”，水乐堂是由作曲家、指挥家谭盾等设计改建明清老宅而成的音乐建筑，在这里，音乐是看得见的，而建筑也是可以演奏的乐器。

水乐堂的南岸是圆津禅院，演奏时融入禅院清华阁上的钟声还有晚课声。禅院为名刹，院内藏有文徵明手书的“多心经”，董其昌等三十二人合写的“金刚经”，赵孟頫、董其昌的匾额，刘墉、梁同书、郑板桥、吴梅村等人写的对联。

南岸北大街上的明清建筑，白墙黛瓦，鳞次栉比，街且悠长，又称一线街，上二楼传一只竹篮，可递到对面的窗口。若石板路上有一撑伞的穿旗袍女子孑孑孓而行，雨淅沥沥地落下，石板湿漉漉的，便是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

地古风清

古镇以水为脉，以石为骨，以桥为魂。这里的桥历代建造有 36 座，明清古桥有 20 多座。

最有特色便是“沪上第一桥”四百多年的五孔放生桥，横跨漕港河。拾阶而上，站在桥头，犹如凌空而起；平波玉带连接天虹，一片湖光与四月的石榴树的颜色相同；回首，笑声已经过了桥东；五孔桥两岸，行人穿梭，古镇风烟有接天涯之感。

此桥是华东地区最大的五孔石拱桥，也是包括周庄、乌镇、同里等在内的“江南十大名镇”中唯一的大型古桥。

家家临水，户户同舟，桥下行舟，靠石埠，缆船石镶嵌其内。不同的缆石能看出住户人家的门第，五步一个，十步一双：平（瓶）升三级（箭）、万事如意、吉祥（象）如意、必（笔）定（锭）如意、居家福禄（葫芦）等等,镂刻精细、寓意美好。

从放生桥下桥左拐往前 50 余米，右拐过

一路行走，兴许会听到在课植园内有悠长平平仄仄的唱词：“……赏心悦目，谁家院？”

上海朱家角

桥便是镇北首的西井街。往北再一路行走，兴许会听到在课植园内有悠长平平仄仄的唱词：“……赏心悦目，谁家院？”这是十多年来，由昆曲王子张军领衔演绎的《牡丹亭》，每年会选一个时段在课植园实景演出，吸引世界各地的昆曲爱好者前来观赏。

课植园为庄园式的园林，其内一亭一阁、一山一水、一石一木都令人玩味。整个庄园由厅堂、假山区、园林区三大部分构成。院内有共四进的厅堂建筑。在迎贵厅南侧有一条约 20 多米的碑廊，镶嵌明代江南四大才子的三位的诗文：文徵明的题咏“游西山寺”十二首、祝枝山的“梅花诗”、唐寅的手札。

名人印痕

名镇，自有名人、雅士、趣事、文儒辈出。就明清两代共出进士 16 人（坊间流传进士 18 人，有待进一步考证）、举人 40 人。

明嘉庆年间有刚直尚书——陆树声；乾隆时期出现“吴中七子”之一的学者——王昶；清末民初的上海城市预言家——陆士谔；清光绪时的御医——陈莲舫；热心教育的蔡氏望族；南社才女——陆灵素；创办并主持南社的柳亚子，其别墅……

高耸的风火墙、幽深的庭院，有着许多待考证的故事。就现今在东湖街的一处落魄的席家弄——席氏厅堂，就已引发不少人关注。

这是一座明代民宅，高墙深院，古朴精致，席氏厅堂仪门为砖雕，至今有四百五十年的历史，与放生桥相等的年岁。

席氏原籍苏州洞庭东山，明嘉靖礼部尚书席永培告老还乡，避战乱，迁此。祖上“资累巨万”，所建宅邸坐南朝北，气势宏伟，前后不止五进。解放前一场大火，使得宅邸毁掉大半，现仅剩前厅集两个天井。仪门上方，有“乐且有仪”四字，仅存砖雕纹饰有走兽、飞禽、花鸟植物、云纹。砖雕工艺融细刻、高浮雕、透雕与一体，从栩栩如生的砖雕画中，隐约可以看到秉承读书业儒与经商行贾不悖的家训。

从这面走出了不少商业巨子，诸如：民间书坊的翘楚——扫叶山房开办人席世臣，朱家角商务分会第一任会长席裕寿，清末数学家席淦，再是报业巨子席裕祺、席裕福兄弟。

席裕福是申报的创始人，字子佩，清末买办。1872 年，英国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申报》，其兄席裕祺任经理，病故后由其任经理。1909 年，美查回国，席裕福出资收买了申报馆，成为中国人自己办报第一人。1912 年，《申报》转让。席裕福返回朱家角后，创办轮船公司衔接京沪铁路，便利商贾往返。

前往探访席氏厅堂，游客寻幽，街景深静。老远望去，电线从白墙的屋檐下伸出，一截一截连接着，街窄显得有些交错，居民的棉被衣服晾在路边，有耄耋老人拿着古铜色的被拍慢慢拍着被子，不远处有几位弄堂里的老人靠在藤椅里晒太阳。旁边挂着鲜艳的衣服，想必是年轻的外地租客。

老镇的居民，坐在自家的屋里，推门临水、枕桥而眠、看行舟、听流水，一览古镇千年清风……■

无锡太湖鼋头渚风景区内的野生杨梅

杨梅“夏”苏南

文｜于锋　编辑黄琳

苏东坡到江南，尝过酸甜可口的杨梅后，他就“移情别恋”了。

夏至上市，小暑落市，每年的初夏是杨梅成熟的时节。走近杨梅树，只见一棵棵硕大的果实压低了枝头，一堆堆一簇簇，美不胜收。摘下杨梅，果香扑鼻，没开口就齿颊生香。轻轻一咬，果汁喷涌而出，果肉铺展开来……酸甜混合的神奇滋味迅速从嘴巴传递到心间，实在美妙。

杨梅发源于江南，是典型的江南水果之一。“折来鹤顶红犹湿，剜破龙睛血未干。若使太真知此味，荔枝焉得到长安。”这是明代诗人徐阶赞美杨梅的诗。徐阶是松江府华亭县人，他这个江南人自然对吴越地区的丰富物产无比熟悉，因此写杨梅格外形象准确。

宋代文豪苏东坡和杨贵妃一样，酷爱吃荔枝，写过“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句子，但苏东坡到江南，尝过酸甜可口的杨梅后，他就“移情别恋”了，得出“闽广荔枝，西凉葡萄，未及吴越杨梅”的论断，可见江南杨梅的魅力之大。

如今，太湖之滨的苏州，无锡两地，还有多处杨梅的著名产地。

明代无锡人强仕在外做官，写“十想诗”遥想家乡土产，其中一首是写杨梅的：“五月熟杨梅，匀圆如火齐。说似西江人，口角流清泚。”

无锡杨梅历来有两个著名产区，一个是位于太湖北岸的大浮山区，一个是与大浮隔湖相望的马山。这两处产地的杨梅各有特色，也都拥有“粉丝群”，常常会为哪处的杨梅更胜一筹争论不休。

大浮杨梅历史相对悠久一些，以原种杨梅居多，滋味偏酸，产量很大。民国年间，如果有人到大浮做客，淳朴的山里人会请他们敞开吃杨梅，分文不收，因此当地有大浮杨梅“只吃不带”的谚语。

马山土质松软，气候温和，极其适宜杨梅生长。马山杨梅的个头比大浮杨梅要大一些，肉厚核小，汁液更浓，口味更甜，有“乌梅”“潭东”“雪桃”等名品种。

苏州的杨梅也有名。明代苏州人、大画家唐伯虎有诗曰：“四月清和雨乍晴，满树杨梅火珠明”，写的是光福杨梅。

和无锡一样，苏州杨梅产地也大都环绕着太湖，有洞庭东山、太湖西山、光福镇、常熟宝岩等处。

每年东山枇杷一下市，东山杨梅就登场。东山杨梅有紫、红、白三种颜色，紫色杨梅为最上品，称之为“乌梅”，个大、肉厚、汁多、味甜、核小。

杨梅不易储存运输，想吃地道的，要到江南来。坐在杨梅树下，随摘随吃，那叫一个畅快！■

中国邮政 CHINA POST

我要上邮票
童心未泯，一切皆甜

今天一起回到小时候 定格时光、留住记忆

（一）爱心呵护 幸福成长 38元/版

（建议上传不多于8张照片，双胞胎可双人照）

（男孩版）

（女孩版）

（二）童星童趣 42元/版

（建议上传不多于11张照片）

（三）快乐成长 28元/版

（建议上传不多于4张照片）

（儿童版）

（男生版）

（女生版）

（四）情满家园 48元/版

（建议上传不多于9张照片）

（五）加油，你很棒 48元/版

（建议上传不多于9张照片）

广告

中国邮政 CHINA POST

为什么来邮政储蓄代发工资？

业务优势

及 时 在个人网银上传的代发文件通过系统实时处理，工资入账速度快

私 密 减少了交接环节，提升了工资信息的私密性

安 全 避免领取、运送、保管现金所带来的安全问题

灵 活 全年7*24小时受理代发工资业务

费 用 开通功能免费，批量代发0手续费

不想跑银行

邮政推出足不出户发工资

及时 安全 私密

灵活

广告

中国邮政 CHINA POST | EMS

美好轻松寄 更快更安全

【邮政服务】 【银行保险】 【快递物流】 【证券基金 【电子商务】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 11183
www.ems.com.cn

广告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孤儿圆梦红包

扫码参与捐赠

有一件礼物，孩子心心念念，梦寐以求。但失去了父母，小小心愿向谁诉说？
送孤儿圆梦红包，帮孩子达成心愿。以爱童行，孤儿不孤！

广告

瞭望

OUTLOOK WEEKLY 新华通讯社主办

我们不是“天河二号”，但可以给你

思考问题的脑力

微信扫码关注
《瞭望》新闻周刊公众号

微信扫码订阅
《瞭望》新闻周刊

全年52期　订阅价：353.6元
邮发代号：2-512
订阅电话：010-63076379

广告